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界古代后期文学史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一部研究世界古代后期文学史的著作。全书分六部分，在探讨各国文学的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上，着重介绍评价了众多文学家的重要作品及其在文学发展史中的地位。内容翔实，可读性强，具有较高的学术与欣赏价值。可供中外文学史教学研究人员、文史爱好者参考。

一、概述

当欧洲大地还被冰雪覆盖的时候，亚洲的古代居民已经进入了早期的文明生活，成为世界文化的摇篮。当欧洲绝大部分地区还处在野蛮状态的时候，古希腊、罗马已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当世界古代历史发展到后期（约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5世纪）时，古老的文学策源地源流滚滚，东西方文化交相媲美，呈现出绚丽多姿、辉煌灿烂的繁荣景象。其代表国家和地区，主要是古代罗马、古代希伯来、古代中国的秦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及古代印度。

古代希腊、罗马是欧洲文学的发源地。正如恩格斯所讲：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古罗马文学是在学习希腊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又有它独特的贡献，因而也是欧洲古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公元前3世纪中叶到公元前1世纪中叶为罗马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时期，主要成就表现为戏剧、散文和哲理诗。戏剧是罗马文学的最早形式。在希腊戏剧的影响下，罗马戏剧迅速发展，主要作家有普劳图斯和泰伦提乌斯。罗马文学在诗歌和散文方面曾取得了较高的成就。散文家、演说家西塞罗草创了罗马式的艺术散文；诗人、哲学家卢克莱修的《物性论》蕴藏着深刻的哲理。

公元前1世纪中期，屋大维当权，号称“奥古斯都”。奥古斯都时期，社会繁荣，罗马文学进入“黄金时代”。最重要的作家是维吉尔、贺拉斯和奥维德3位诗人。维吉尔是罗马最有声誉的诗人，他创造了世界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史诗《埃涅阿斯记》，这是全部罗马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品。史诗讴歌了罗马祖先建国创业的丰功伟绩，具有强烈的艺术个性和高超的语言技巧，成为后来文人史诗的典范。

屋大维死后，罗马文学渐趋衰落，史学家称之为罗马文学史的“白银时期”。这一时期，以悲剧、讽刺诗和传记文学以及小说成就较为突出。塞内加是罗马最重要的悲剧作家。他上承希腊悲剧的传统，下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悲剧艺术家。社会讽刺诗在这一时期有较大的发展，最重要的讽刺诗人是尤维纳利斯。传记文学作家主要是塔西佗和普鲁塔克。阿普列尤斯的《金驴记》（又名《变形记》）是欧洲最早的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公元3世纪以后，古罗马文学随着奴隶制度的衰落而衰落了。

罗马的奴隶制国家，实行贵族专制政体，对外进行大规模征战，对内实行专制统治，这就使罗马文学没能象希腊文学那样自然地发展。在内容上，希腊文学具有强烈的民主倾向，罗马文学则具有更多的贵族色彩。在艺术上，希腊文学有生动活泼的特点和首创精神，罗马文学却具有对希腊文化的继承和模仿的特征。但罗马文化毕竟是罗马社会的产物，并非希腊文化的简单重复。罗马文学在某些方面发展了古希腊文学，在有些方面还有所独创。如维吉尔的史诗有罗马文学的独特风格；卢克莱修的哲理诗在欧洲古代文学中是全新的品种；西塞罗的演说技巧也超出于古希腊的十大演说家。讽刺诗在罗马文学中比较发达，传记文学的成就也高于古希腊文学。

古罗马文学是古希腊和后世欧洲文学的桥梁，在欧洲文学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文艺复兴时期和17世纪的欧洲人，主要是通过罗马文学认识了希腊文学的。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史诗、悲剧、喜剧和抒情诗中，处处可以看出罗马文学的影响。17世纪的古典主义作家受罗马文学的影响更远远大

于受希腊文学的影响。

这个时期的中东，古希伯来人创立了希伯来文学。大约在公元前 2 千纪中叶，游牧于幼发拉底河岸的古希伯来人进入了迦南地区，即后来的巴勒斯坦地区。迦南处于埃及、亚述、波斯之间，深入此地的希伯来人受周围各国的影响，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史称迦南文化。到了公元前 11 世纪前后，希伯来人建立了以色列——犹太王国。大卫继位后，定都耶路撒冷。所罗门统治时期达到鼎盛，经济异常繁荣，希伯来文学开始发展。后来南北又分裂为犹太王国和以色列王国两部分。双方长期的内战，导致力量削弱和国势衰微。公元前 722 年，北方以色列为亚述王所灭。公元前 586 年，新巴比伦王国占领南方犹太国，耶路撒冷被付之一炬，包括王公贵族在内的五万多人被虏去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从此，希伯来人挣扎在死亡线上。以后又经过波斯、马其顿、塞琉西、罗马的多次占领，希伯来人终于被逐出家园，流落到世界各地，古希伯来民族的历史也从此结束。

犹太人在被俘期间，不堪忍受侮辱和虐待，在一部分人中逐渐产生了有“救世主”可以拯救自己的宗教观念。他们通过秘密传教，鼓动建立重返故土的信心。公元前 538 年，新巴比伦王国被波斯战败，波斯王释放了犹太囚虏。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后，很快创立了犹太教，尊奉耶和华神为天地万物的最高主宰。犹太教创建后，由宗教祭司把自公元前 13 世纪流传下来的各种古文献和作品进行加工、整理，编成了犹太教的经典——《旧约》。

《旧约》是希伯来文学的精华总汇，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这部经书后来被基督教所接受，成为《圣经》（《新旧约全书》）的组成部分。《旧约》集中地体现了希伯来文学的重大成就。它包括不同时期、不同人写作的文献和作品，形式多种多样，反映的是古代希伯来人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其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都是很高的。

《旧约》不仅是希伯来人的宝贵文学遗产，也是世界人民共同的文化财富。包括《旧约》和《新约》在内的《圣经》和古希腊、罗马文学一样，成为欧洲书面文学的两大源头之一。《圣经》中的宗教观念，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内，构成欧洲文学的一大特点。欧洲中世纪的诗歌、戏剧、小说，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雕塑，大都以《圣经》为主要题材。其中《旧约》文学的清新艺术风格和高超的艺术技巧，尤为后世作家所赞赏和效仿。《旧约》文学中的珍品，至今仍然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

希伯来文学和罗马文学有着很大的差异。罗马文学政治色彩浓郁，希伯来文学则具有鲜明的宗教色彩。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完成了中国的统一，结束了二百年七国纷争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秦的统一为后世文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秦帝国只维持了十几年，公元前 202 年，刘邦建立了汉帝国，经西汉、东汉两个阶段，前后统治中国约四百余年。中国的秦汉时期对应于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帝国时期。中国古代史书上通称罗马帝国为大秦。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 97 年），西域都护班超曾派甘英出使大秦，至条支（今伊拉克境内）临海而止。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 166 年），大秦皇帝安敦曾派遣使臣来中国。可见，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已有交往了。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大的封建王朝，中国当时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之一。汉代的文学艺术是在继承先秦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代

文学的主要成就是散文和辞赋。汉初的作家在全国一统的局面下，既保持了战国诸子关心现实的传统，又受到南方楚辞文体的影响，知名的政论散文作家，往往又是颇有成就的辞赋作家。因而，他们的散文在内容上具有密切结合政治的特点，在艺术上则是词采华茂，情感真挚，句法有辞赋化的倾向。汉初杰出的散文家是贾谊和晁错。

汉武帝统治时期，西汉进入了全盛时期。帝国的兴隆强盛，使好大喜功的汉武帝需要洋洋洒洒的文学作品来歌颂丰功伟绩，宣扬统一帝国的强大声威。由于“润色鸿业”的需要，武帝时代的辞赋有了很大的发展。司马相如是这个时期最伟大的辞赋家。正当汉代帝王招揽文学之士，运用铺张扬厉的文字歌颂其统治的时候，也是奥古斯都统治下的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之时。当司马相如创作出《子虚赋》、《上林赋》，扬雄创作出《长杨赋》、《甘泉赋》，班固创作出《两都赋》、张衡创作出《二京赋》来歌颂汉帝国的富强昌盛时，罗马的维吉尔也创作出《埃涅阿斯记》、贺拉斯创作出《歌集》、奥维德创作出《变形记》来歌颂罗马帝国和奥古斯都的圣德。东西两大帝国的文学发展轨迹如此相同，说明了古代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在文学艺术的发展上，也是和国家政权主宰者的爱好和提倡分不开的。

汉代史传散文在先秦史传作品的基础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伟大的、不朽的历史和文学著作，两千多年来，一直是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学习的典范。在《史记》的影响下，东汉产生了不少历史著作，班固的《汉书》是它们的杰出代表，对后代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较之《史记》，《汉书》缺乏司马迁那样的深刻的见识和批判精神。此时的罗马，塔西陀的《编年史》、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等著作也都是西方史学和传记文学典籍中的名篇。东西方出现的这种史学著作和文学名著的同步发展现象，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人对自身的认识也必然向着深层结构发展。

东汉一代整个学术文化领域充满着愚妄和迷信。文学批评家王充首先冲破这个沉闷的时代，并给以深刻有力的批判。他的《论衡》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也是值得十分重视的文学理论遗产。另外，汉代的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和高度的思想性，对后代诗歌影响巨大。东汉出现了五言诗发展的局面，从此五言一体便成为中国诗歌的一种重要的传统形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文学，最有成就的方面是诗歌。建安时期（公元196—220年）文坛上涌现出大量的作家，“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王粲、陈琳等）和蔡琰是其中的代表。他们都曾卷入汉末动乱的漩涡，生活和思想都有较大的变化，因此能够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建安文学反映了社会动乱和民生的疾苦，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具有慷慨悲凉的独特风格，形成了“建安风骨”的优良传统，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到了正始年间（公元240—249年），兴起了玄学，道家思想风行。正始文学的代表作家阮籍、嵇康，他们的作品带有老庄思想的色彩，但基本精神还是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

两晋时期，垄断了政治和经济的士族阶级，也垄断了文化。士族清谈玄理的风气日盛，玄言文学占了文坛的主要地位，以陆机、潘岳为代表的太康文坛，作品内容贫乏，形式主义严重。直到东晋末年田园诗人陶渊明出现，才给文坛带来富有现实内容的创作。他的诗歌平淡自然，生活气息浓郁，

并能创造出很高的意境。陶渊明开创的田园诗文体，为古典诗歌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境界。南北朝时代，诗歌的面貌和魏晋时代颇有不同。宋齐时代的山水诗代替了东晋以来的玄言诗，是南朝诗歌发展上的第一个重要变化。宋谢灵运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确立了山水诗在士族诗坛上的优势地位。宋鲍照继承和发扬了汉乐府的传统精神，成为当时代表进步倾向的优秀诗人。他对七言诗的发展有重要贡献，是南北朝时代最杰出的诗人。南齐诗人谢朓的新体诗，词采华丽，对仗工整，对唐代律诗、绝句的形成是有影响的。到了梁陈时代，诗歌的内容愈来愈空虚堕落，导向了宫体诗的道路。北朝的文人诗坛一直比较荒凉，直到庾信由南入北，才给北朝诗坛带来了转机。庾信的诗作初步融合了南北诗风，是南北朝最后一个优秀的诗人。北方文学最有成就的部分是乐府民歌，其中《木兰诗》是杰出的代表作。

南北朝时代，由于社会政治的原因以及文学思潮的影响，形成了骈文畸形繁荣的局面。但在历史、地理等学术著作里，还可以看到一些比较质朴的散文作品。范晔的《后汉书》和郦道元的《水经注》都颇有文学价值。小说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繁盛。志怪小说中，东晋干宝的《搜神记》成就最高。刘宋初年出现的《世说新语》，是魏晋轶事小说集大成之作，对后世文学有深远影响。当中国文学进入丰富多彩的魏晋南北朝阶段的时候，欧洲文学已越过了希腊、罗马文学的高峰而趋于衰落。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希腊、罗马文学的影响并没有消失。正是在这种影响下，罗马帝国晚期的作家阿普列尤斯写出了罗马文学中第一部散文体小说《金驴记》。小说文学的兴起，标志着文学样式、体裁、题材多样化发展的趋向，这是文学发展中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表现。当然，各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学，既有其共同的发展规律，也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获得了空前的成就。曹丕、陆机都著有比较系统的文学批评论著。刘勰创作了《文心雕龙》这部文学批评巨著，其理论对唐以后的批评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钟嵘的《诗品》是一部品评诗歌的文学批评名著，对后代的文学批评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萧统的《文选》中选录了自先秦到齐梁时期的许多诗文作品，是一部代表当时文学观点的优秀文学选本。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在继承先秦、两汉文学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和成就，文学品种之丰富、艺术水平之高超，都达到了当时世界文学发展的高峰。

这个时期，亚洲南部的印度，正是贵霜帝国从兴盛到衰落的时期。大约公元4世纪，摩揭陀国重新兴起，建立了笈多王朝。笈多王朝全盛时，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印度的梵语古典文学得到空前发展。印度著名的佛教诗人和戏剧家马鸣的作品，是现存最早的梵语古典文学作品。公元前后产生的戏剧学专著《舞论》，是印度现存的第一部文艺理论著作。印度的戏剧文学特别发达。跋娑的13部戏剧代表了梵语古典戏剧的早期成就。印度著名的剧作家首陀罗迦的《小泥车》是驰名世界剧坛的一部经典之作，有着卓越的艺术成就。最杰出的戏剧家是迦梨陀娑，他的戏剧作品《沙恭达罗》，代表着梵语古典戏剧的最高成就。他的抒情诗《云使》是人类所能创造的美好情歌的一部分，具有永不衰竭的艺术魅力。蜚声世界的印度梵文寓言故事集《五卷书》，以内容丰富著称于世，表现出古代印度民族卓越的艺术创造才能，在世界寓言故事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印度古代文学是世界古代文学中最完整、最丰富的文学之一，它成就辉煌，灿烂夺目，可与古希腊文学并肩媲美，二者是分别矗立于世界东西方的两大文化高峰。古印度文学与宗教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也是东方文学的共同特点。

综上所述，世界古代后期文学的发展是趋向于繁荣的，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既有其共同点，也有其不同之处。中国和罗马都是由于政治的作用而使文学得到发展的，而希伯来、印度的文学则是由宗教的因素才得以发展繁荣的。

二、古罗马文学

1. 古罗马文学的土壤

古罗马是稍晚于希腊而兴起的一个奴隶制国家。古罗马文学是在学习希腊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又有它自己的独特贡献，因而也是欧洲古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古罗马地处意大利半岛中部。大约在公元前 2000 年，拉丁人部落定居意大利半岛的台伯河畔，建立了罗马城。公元前 8 至 6 世纪，罗马氏族公社制解体，奴隶制关系形成，居民分为贵族和平民两个集团。公元前 6 世纪末，罗马建立起了奴隶制的贵族共和政体。平民为反对债务奴役制，争取政治权利，和贵族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平民和贵族经过两个多世纪的角逐，导致社会进一步分化，贵族与富裕平民联合，形成了新贵族共和政体。为了这两个阶级的利益，罗马从公元前 4 世纪开始向外扩张，经过长期征战，统一了意大利半岛。公元前 3 世纪中期以后，罗马又征服了地中海沿岸和其他一些地方。到了公元前 2 世纪中叶，终于建立了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强大国家。在向外扩张过程中，罗马人更多地接触到比较先进的希腊文化。由于社会条件基本相同，罗马的奴隶主阶级很容易地就接受了希腊文化。约在公元前 3 世纪中叶，随着国力的强大和经济的繁荣，并在希腊文学的影响下，罗马文学也开始形成。

古罗马文学的历史从公元前 3 世纪到公元 5 世纪中叶结束，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共和国时期的罗马文学；共和国晚期和“奥古斯都”时期的罗马文学；帝国时期的罗马文学。

共和国时期（公元前 3 世纪—前 2 世纪）是罗马文学的开创时期，主要成就是戏剧。在希腊戏剧的影响下，罗马戏剧迅速发展，主要作家是普劳图斯和泰伦提乌斯。他们的作品比起希腊的新喜剧更注意情节的戏剧性，被后世视为典范。

共和国晚期，罗马的奴隶制已经趋向繁荣。贵族奴隶主占有大片土地和大量奴隶，建立了大庄园，奴隶主对奴隶进行极其残酷的剥削，这就导致了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从公元前 2 世纪后半期起，奴隶起义不断爆发，其中著名的有西西里岛奴隶起义和斯巴达克起义。与此同时，小土地所有者受到大庄园奴隶主的倾轧而大量破产，平民派与贵族派的斗争也相当激烈。社会矛盾的激化促使意识形态各个领域变得异常活跃。文学方面也有新的发展，而且逐渐摆脱希腊的影响而形成自己的民族特色。西塞罗是罗马最重要的散文家，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哲学家，他草创了罗马式的散文。军事冒险家凯撒也是一位杰出的散文作家。诗人、哲学家卢克莱修的《物性论》歌颂了罗马精神，蕴寓着深刻的哲理。卡图鲁斯是罗马第一位重要的抒情诗人，对罗马抒情诗的发展影响重大，也很受后世欧洲诗人的推崇。

随着社会矛盾尖锐、政治斗争的激烈，奴隶起义不断发生，旧的共和政体已无能为力。由于共和政体不适合奴隶主缓和社会矛盾、镇压奴隶起义的需要，政权落到少数拥有军权的将军手中，他们实行军事独裁。经过凯撒、克拉苏、庞培和安东尼、屋大维、雷必达前后“三雄”间几十年的内战，最后屋大维于公元前 31 年统一全国，建立起为时 40 多年的“元首制”。屋大维保留民主制的外衣，实行军事独裁。这一时期，内战停止了，屋大维实行

了某些改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奴隶制经济的发展，使罗马奴隶制社会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罗马元老院因此尊他为“奥古斯都”（即“神圣”）。屋大维为了笼络人心巩固自己的统治，特别注重舆论的作用。他意识到文化对维护政权的作用，力图控制文化艺术，他的亲信麦凯纳斯竭力为他笼络文人，当时罗马一些著名作家云集在麦凯纳斯的周围，组成所谓“麦凯纳斯文学集团”，为屋大维政权服务。

奥古斯都时期，社会繁荣，诗歌发展达到顶峰，罗马文学进入“黄金时代”，最重要作家是维吉尔、贺拉斯和奥维德三位诗人。维吉尔是罗马最有声誉的诗人，创造了世界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诗史《埃涅阿斯记》。贺拉斯的《诗简》以漫谈文艺问题见长，其中的《诗艺》是一部重要的文艺理论著作。奥维德的《变形记》有“神化辞典”之称。

帝国时期（公元1世纪——5世纪中叶），罗马的奴隶制处于衰落时期，社会矛盾极其尖锐，从公元1世纪起，罗马不再进行大规模的扩张，奴隶来源大减，奴隶生产积极性降低，奴隶制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宫廷、官僚机构和军队大量扩充，支出庞大，只有加重剥削，因而更加深了统治者与平民、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尖锐矛盾。统治者不断加强专制手段和官僚机构，然而并不能维持摇摇欲坠的奴隶制度。公元3世纪以后，帝国陷于危机，奴隶起义不断发生。与此同时，外族相继入侵。公元330年，罗马帝国迁都君士坦丁堡。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终于在内部人民起义和外族入侵的情况下灭亡。欧洲古代史就此结束。

罗马在屋大维死后的200年间，即罗马帝国初期，文学史上称为“白银时代”，文学渐趋衰落，宫廷趣味占统治地位，到2世纪前半叶达到高潮。贵族青年以公开朗诵空洞无物的诗歌为时髦，内容贫乏，形式雕琢的文学作品成为宫廷和上层人物的玩物，因而丧失了生气。这时，一部分贵族作家仍然向往共和国时代，但在专制淫威箝制言论自由的情况下，他们的思想多倾向于斯多噶派的内心宁静和坚忍，有时悲观绝望，倾向宗教迷信，有时则阿谀奉承。这一时期，罗马文学以悲剧、讽刺文学、传记文学和小说的成就较为突出。塞内加是罗马的重要悲剧作家。尤维纳利斯是罗马最著名的讽刺诗人。塔西陀、阿普列尤斯等作家的传记文学、小说都比较有影响。罗马古代文学中最后一位重要作家是希腊语讽刺散文家琉善，他的作品反映了2世纪奴隶制社会开始瓦解时期奴隶主思想意识的崩溃。

罗马帝国后期（公元3—5世纪），社会危机重重，世风糜烂。基督教立为国教后，破坏了古代文化，宗教文学成为统治文学。

罗马文学缺少古希腊文学那种原始的、旺盛的生命力，在内容上不如希腊文学那样具有民主性和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在艺术上则缺乏古希腊文学的那种生动活泼的特点和首创性，它的成就总的说来不如希腊文学。但它产生在专制时代，也有其民族特色，有自己独特的成就。最重要的是作为古希腊和后世欧洲文学的桥梁，古罗马文学在文学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是希腊文学与近代文学之间的桥梁。文艺复兴后欧洲文化对古代的继承，主要是面向罗马文学，是通过罗马文学认识希腊文学的。在文艺复兴时的史诗、悲剧、喜剧、抒情诗中，处处可以看出罗马文学的影响。17世纪的古典主义作家受罗马文学的影响更远远大于受希腊文学的影响。

2. 共和国时期的罗马文学

（公元前 3 世纪—前 2 世纪）

共和国时期是罗马文学的开创时期，主要成就是戏剧。罗马戏剧萌芽于远古时期对农神萨图尔努斯的祭祀。农人庆贺丰收时，常和着菲斯克尼曲调互相嘲弄，这种曲调具有戏剧对话的雏形。公元前 364 年，埃特鲁里亚人到罗马表演舞蹈，以祛除瘟疫。这种舞蹈发展成为集音乐、歌舞、戏谑于一体的杂剧，促进了罗马戏剧的形成。最早的罗马戏剧是阿拉特即兴笑剧，于公元前 300 年左右在罗马出现。这种笑剧嘲笑意大利农村生活，演员戴假面具。公元前 3 世纪，罗马人接触到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戏剧。他们利用这一现成形式使自己的戏剧很快繁荣起来。公元前 240 年，第一次布匿战争刚刚结束，罗马取得海上胜利，西西里岛成为第一个罗马行省。为了庆祝神的节日和战争的胜利，罗马人第一次上演了希腊获释奴隶李维乌斯·安得罗尼库斯（约公元前 280 年—前 204 年）根据希腊剧本改编的悲剧和喜剧。他还把荷马的《奥德修记》译成拉丁文，作为教科书，供学生读书。他的作品虽然粗糙，但对罗马人了解希腊文化和罗马戏剧的发展过程有着促进作用。他是古罗马文学史上第一个作家。

李维乌斯的继承人是奈维乌斯（公元前 270？—前 204 年？），他使罗马戏剧民族化。除改编希腊剧本外，他还以罗马事件为题材编写历史剧。

公元前 3 世纪末到公元前 2 世纪中叶，出现了戏剧的繁荣。由于当时罗马当权的贵族不容许抨击国政，这一时期的罗马戏剧缺乏早期希腊戏剧的战斗性和民主倾向，而主要继承了新喜剧以描写爱情和家庭生活为主的世态喜剧传统。这一时期的喜剧代表作家是普劳图斯和泰伦提乌斯。他们的作品从题材到写法都模仿希腊的新喜剧，但是取消了合唱队，而是更注意情节的戏剧性。他们对欧洲文艺复兴和以后的戏剧很有影响。

（1）普劳图斯

普劳图斯（约公元前 254 年—前 184 年）出生于意大利中北部平民阶层，最初到罗马，在剧院当过木工和演员。后来他经商失败，在磨坊工作，并写作剧本。他一生创作了 100 多部喜剧，但基本完整的流传至今的剧本只有 20 部。这些喜剧剧本都是根据希腊新喜剧改编的。普劳图斯一方面保留了这些新喜剧传统的情节结构，另一方面也把罗马生活和罗马环境的一些成分加入到这些喜剧里去；用的是希腊的题材，反映的却是罗马的生活。普劳图斯的喜剧有罗马的民族特征和民间色彩。他削减喜剧的严肃气氛，增加滑稽的成分和热闹场面。他采用生动的民族语言，风格幽默诙谐，剧中有俏皮话、双关语、文字游戏，对话充满戏谑的成分，喜剧效果颇为强烈。他的喜剧近似阿里斯托芬的旧喜剧，而不太象希腊的新喜剧，他关心的是演出效果，艺术上欠缺的是不大注意剧情结构的严密和完整。他在作品中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些问题，利用滑稽可笑的情节，揭露、讽刺了当时罗马上层阶级生活的腐化和道德的败坏，妇女地位的卑下和婚姻的不自由，同情争取婚姻自由的男女青年和奴隶，具有民主的倾向。著名作品有《一坛黄金》、《孪生兄弟》、《吹牛的军人》等。

《一坛黄金》是普劳图斯根据米南德的新喜剧改编的，叙述了老人欧克利奥发现藏金、失而复得的故事。作品在开场诗中由家神介绍了一坛黄金的来历及欧克利奥怎样得到它：“我是这户人家的家神，你们刚才也看见我从

这屋里出来。我就住在这里，多少年来一直充当现今房主人的父亲和祖父的保护神。他祖父曾经瞒着家人把一批金子委托给我，把金子埋在灶下，请我为他保管。他这个人的本性贪婪，直到临死，也一直没把这事告诉儿子，他宁愿让儿子贫困，也不想把金子遗留给他。他只给儿子留下一小块土地。他儿子就靠那块土地，艰苦地度过了一生。

“在那个把金子委托给我的人死后，我便注意观察，他的儿子是否比他更虔敬一些。可是实际上，他对我却是越来越怠慢，礼数越来越不周。我也就同样回报了他，他已经死了。他留下一个儿子，现在就住在这间屋里。儿子的性格同他的父亲和祖父完全一样。这个人有个女儿，每天向我奠酒，敬乳香和其他祭品，还经常给我戴上花环。为了感谢她对我的敬意，我让他的父亲欧克利奥在炉灶底下找到了金子。这样，当他嫁她的时候就不会太为难了。……你听，这个老头又在里边嚷嚷了。他要把老女仆从屋里赶出来，不让她知道屋里的秘密。我想他又要检查一下金子，看是不是被人偷走了。”接着，在下面的5幕剧中，写了欧克利奥发现金子疑神疑鬼的种种表现。

第1幕第一场一开始，就把欧克利奥疑神疑鬼的心理刻画出来。他对老女仆嚷道：“鬼东西，我真想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好让你没有办法去偷看我在干什么。你快走开，走，向前走，向前——对。就站在那里。你当心，只要你敢从现在站的地方挪动一下，哪怕只挪动一个指头那么远，只移动一个指甲尖；或者你未经允许哪怕只回过头来瞧一眼，我就立即让你尝尝十字架的滋味。（旁白）我从来没见过比这个婆子更坏的女人，我对她真不放心，不要让她乘我不备用话试探我，不能让她看出埋藏金子的地方。这个坏婆子连后脑勺上都长着眼睛。现在我去看看金子是不是还在那地方，它真使我放心不下。”

当欧克利奥富有的邻居梅格多洛斯向他致以问候并愿意帮助他时，他心里想：“一个有钱人和颜悦色的问候穷人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他大概已经知道我有了金子，所以如此亲热地问候我的。”并且认为，“事情很清楚，老婆子一定向他泄露了关于金子的秘密。我要立刻回去割掉她的舌头，挖出她的眼珠！”于是怀疑道：“他现在说要帮助我，其实是要捞一把。他张着大嘴，想一口把金子吞下去。他是一只手拿着饼作饵，另一只手拿着石头！我才不相信那些向穷人大献殷勤的有钱人哩。他们表面上同你友好地握手，内心却在对你使坏！我很了解这种乌贼，他们不管碰到什么东西都紧紧抓住不放。”当梅格多洛斯向他女儿求婚时，他说：“我不给她任何嫁妆。”这里，梅格多洛斯的慷慨和欧克利奥的患得患失相对照，把一个吝啬鬼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普劳伦斯善于利用人物的旁白、独白揭示人物心理。当欧克利奥发现丢失金子后叫道：“啊！这可糟了，坏了，完了！我往哪儿跑？我不往哪儿跑？抓住！抓住！抓住谁？他是谁？我不知道，我什么也看不见，我两眼发黑！我去哪儿？我在哪儿？我是谁？我全弄不清了……我真倒霉，我完了，我这样苦命！今天这个日子给我带来了多少悲伤、灾难、痛苦、饥饿和贫困！我是世上最可怜的人！生命对我还有什么意义呢？我精心守护的那么多金子都丢掉了。我对不起我自己，对不起我的心灵，对不起我的天性。现在别人都在为我的不幸和灾难幸灾乐祸。我真受不了啊。”作者把欧克利奥丢失金子

之后的形态、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形象生动。后来，欧克利奥失金复得，他终于把金子拿出来给女儿做嫁妆，这才恢复了内心的平静。此剧把一个吝啬鬼拾得一坛金子后那种东猜西疑、坐卧不宁的心理状态刻画得十分入微。后来莫里哀根据它写出了名作《悭吝人》。

《孪生兄弟》通过写幼年失散的一对兄弟被人错认，引起种种误会终于重逢的经过，反映了罗马上层社会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喜剧的主人公对妻子不忠，偷窃她的衣服首饰赠给妓女。作者通过一个为阔人帮腔帮闲的食客的形象，说明这种人是真正的奴隶。奴隶可以打断锁链，而食客却被饮食的链条永远牢牢锁住。它是后来莎士比亚的《错误的喜剧》的题材来源。

《吹牛的军人》写一个雅典青年所结识的妓女被一个军官霸占，年轻的奴隶运用机智和勇敢，不仅自己摆脱了一个军人的奴役，还帮助妓女重新回到她心爱的青年身边。在剧中军官受到奚落，奴隶调兵遣将，是主要角色。

普劳图斯的喜剧以其情节巧妙、富于动作，对话生动自然、充满戏谑成份、接近民间喜剧风格，而深受一般观众的欢迎。

（2）泰伦提乌斯

泰伦提乌斯（约公元前 190—前 159 年），是罗马著名的喜剧作家。他是出生在北非的奴隶，随主人到罗马受贵族教育，后来获释，生活在贵族社会中，从事戏剧创作。他写的 6 部喜剧，全是根据米南德和阿波洛多罗斯的新喜剧改编的，并且全部留传下来。内容主要通过父子、兄弟等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反映老少两代人之间的矛盾。老的一代企图维护古老的贵族道德，年轻的一代则生活放荡。作者不同意墨守成规，也不同意放纵无度，主张以宽容互谅的原则来解决家庭内部的矛盾。他的作品保存了新喜剧的特色，剧情严肃，结构严谨，人物性格鲜明，心理描写相当深刻。他采用上流社会的语言，风格优雅、精致。其代表作有《婆母》、《两兄弟》和《福尔弥昂》等。

《婆母》是泰伦提乌斯喜剧的代表作。剧情围绕着青年潘菲路斯夫妇间的一段婚姻纠葛而展开。潘菲路斯生活荒唐，勉强从父命与一女子结婚，婚后不久得一子。夫妻都不能肯定婴儿的父亲是谁，最后发现父亲正是潘菲路斯自己。剧中两家父母都对青年的妻子表示爱护和同情。作者认为，要维护正常的家庭生活，家庭成员应互相体谅，尽管青年行为不检点，也是可以原谅的。

《两兄弟》重在表现米丘和狄米亚兄弟二人。兄无子，过继了弟弟一子。兄教子从宽，弟从严。兄子行为不羁，抢劫奴隶商的一个女奴。后来发现他是为了弟弟而抢的。最后狄米亚悔悟。兄弟俩分别以宽容和严峻的教育方式管教子女，出现了不同的结果，以宽容方式教育远比以严峻的方式收效大得多。作者认为，宽容可以防止子弟欺骗父母。他认为青年人沉湎酒色，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穷人所以不干荒唐事，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富人有钱，就不免要干荒唐事，应予原谅。这种看法正反映出罗马贵族奴隶主的观点。后来莫里哀运用《两兄弟》的题材创作了《丈夫学堂》。

《福尔弥昂》不及泰伦提乌斯的其他剧本严肃。剧情中有计谋成份和闹剧气氛，所以比较生动活泼。福尔弥昂是剧中的一个门客。一般门客靠施舍为生，受人鄙视。福尔弥昂却是一个聪明机智、能保持自己尊严的侠义之士。剧情写雅典人得米福和他的哥哥克瑞墨斯各自出远门去了，克瑞墨斯的儿子费德里来亚爱上了一个名叫潘菲拉的弹琴女子。得米福的儿子安提福娶了一

个名叫法尼乌姆的穷家女子。得米福归来，对这门婚事很生气。他质问福尔弥昂为何强迫他儿子娶这样的一个女子。福尔弥昂假充这个女子的保护人，迫使得米福承认这门婚事。他提出这女子的父亲名叫斯提尔福（克瑞墨斯的假名子），得米福听了心虚，勉强承认了这个儿媳。奴隶贩子多里奥前来索取赔身钱，如果不给他就要把潘菲拉卖给另一个买主。福尔弥昂弄到钱交给奴隶商，把姑娘赎出来。克瑞墨斯归来，他告诉得米福，他的外室带着女儿到雅典来了。福尔弥昂愿意娶这个女子，但要求给一笔钱以弥补他退掉一个富家女子的婚姻所受的损失。克瑞墨斯答应给钱，钱是借用她的老婆的，他自己没有产业。《福尔弥昂》剧情曲折紧凑，人物性格鲜明，互相衬托。莫里哀曾仿照此剧编写了《司卡班的诡计》。

泰伦提乌斯的喜剧以其严肃、文雅的风格，更受贵族文人的欢迎。它们对欧洲文艺复兴和以后的戏剧很有影响。

古罗马悲剧的建立者是恩尼乌斯（公元前 239—前 169 年），他的悲剧是根据希腊作品改编的，以《伊菲革涅亚》最为著名，可以和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媲美。其特色在于心理描写的深刻、细致。阿克齐乌斯（约公元前 170—前 85 年）摹仿希腊的“三部曲”结构，编写出一系列情节彼此衔接的悲剧，反对独裁专制的历史剧《布鲁图斯》是其代表作。他的作品富于激情，人物形象生动，风格庄严，对话巧妙，带有修辞色彩。他的创作代表着罗马悲剧的最高水平。可惜的是除了塞内加的作品外，共和国时期的罗马悲剧都没有传下来。

戏剧之外，诗歌和散文也为罗马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罗马特有的社会讽刺诗也已出现。

3. 共和国末期和“奥古斯都”时期的罗马文学

（公元前 1 世纪——公元 1 世纪）

共和国末期和“奥古斯都”时期是罗马文学的全盛时期，主要成就是散文、诗歌和文艺理论。产生了散文家西塞罗、凯撒，诗人卢克莱修、卡图鲁斯以及罗马最著名的三大诗人维吉尔、贺拉斯和奥维德，他们将罗马诗歌发展到最高峰，也使罗马文学步入“黄金时代”。

（1）西塞罗

西塞罗（公元前 106—前 43 年），是罗马最著名的演说家和散文作家，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哲学家。他出身于骑士家庭，曾在罗马、雅典等地学习法律、修辞、文学和哲学。他于公元前 63 年被选为执政官，主张共和制，曾支持屋大维。安东尼同屋大维和解后，将他杀害。

在政治上，西塞罗认为，公元前 3 世纪至前 2 世纪的罗马共和国才是理想的国家形式，这种政体具有君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的特点。在哲学上，他折衷希腊学院派、斯多噶派和伊壁鸠鲁派的伦理学，把这些思想介绍到罗马，成为中古和近代欧洲哲学思想同希腊哲学思想之间的桥梁。他著有《论国家》、《论法律》、《论老年》、《图斯库卢姆谈话录》、《斯多噶派哲学》等 12 部政治哲学著作。《论老年》虽属哲学著作，但书中主要不是谈论抽象的哲理问题，而是从斯多噶哲学的恬淡寡欲的伦理观点出发，以安度老年为题，进行道德劝说，风格轻松愉快，富于文学趣味。

西塞罗还写有多种修辞学著作，如《论演说术》、《演说家》等。他强调修辞必须从哲学方面获得启示，吸取灵感。同时，又强调哲学必须同修辞学结合起来，否则哲学便没有实际意义。

西塞罗在散文写作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主要散文成就，在于演说辞和书信。他遗下书信 900 封，其中，主要有《致阿提库斯书》16 卷，《致友人书》16 卷，反映了共和国末期的社会政治生活，描绘了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风格接近口语。他的演说辞共存 58 篇，一部分是法庭演说，另一部分是政治演说。其中最著名的是《控告维勒斯辞》、《控告卡提利那辞》、《为弥洛辩护辞》以及摹仿狄摩西尼反腓力的演说辞而作的反安东尼的演说辞（通称《反腓力辞》）。

《控告卡提利那辞》由四篇政治演说所组成。卡提利那（公元前 108—前 62 年）是一个家道中落的贵族。公元前 63 年，他因竞选执政官失败而组织暴乱，并在意大利各地进行鼓动，秘密聚集力量。当时，罗马大法官科尼利阿斯和司法长官林都拉斯都参加了阴谋活动。卡提利那原决定 10 月起事，但因计划不周没有行动起来。11 月 7 日深夜，阴谋分子秘密开会，决定第二天在拜会西塞罗时将他刺死。西塞罗得知阴谋分子准备举事，便以执政官身份于 11 月 8 日召开元老紧急会议，发表第一篇演说，对卡提利那进行猛烈抨击，接着，西塞罗连续发表 3 篇演说，揭露卡提利那的阴谋。随后，西塞罗被宣布为“国父”，阴谋分子被宣布为“国敌”，为首 5 人被杀死。卡提利那死于公元前 62 年 1 月 5 日叛军与元老院军队的决战中。四篇演说辞中，以第一篇最为动人，其中写道：

“卡提利那，你恣意地滥用我们的耐心还要多久？你疯狂地嘲笑我们何时才了？你肆无忌惮地炫耀自己的无耻行径有无止境？难道无论是帕拉提乌姆山冈的夜间警戒，无论是罗马城里频繁的巡逻，无论是全体人民的惊恐，无论是所有高尚的人的集会，无论是选择这一受到严密保卫的地方作元老会场，无论是元老们的脸色和表情，都未能使你有所感触？你难道不知道你的计划已经败落？你难道看不出你的阴谋已被在座的人识破而难以施展？你认为我们当中谁还不知道昨天夜里你干了什么？前天夜里你干了什么？这两夜你待在哪里？召集哪些人开过会？作过什么决定？啊，时代！啊，世风！元老院全知道，执政官也了如指掌，可是这个人还活着。岂止活着，不，而且还来出席元老会议，参与国事讨论，用眼神暗示、指定我们中谁该被杀害。而我们这些自诩为勇敢的人，却以为只要能避过他的疯狂，躲过他的武器，便算尽了对国家的责任。卡提利那，执政官早就应该下令把你处死，让你自己领受你为我们准备的死亡。当提·格拉古只是企图稍许改变国家现行制度的时候，大祭司、无比高贵的斯奇皮奥便以个人名义把他杀死了，而我们，身为执政官，难道竟要容忍卡提利那用死亡和火焰毁灭整个的国家？……

“事实上，卡提利那，既然夜晚昏暗都掩盖不了你们的罪恶活动，私人宅邸的院墙都封锁不住你的同谋者们的声音，既然一切都已公开，都已暴露无遗，你还想期待什么呢？相信我吧，是改变主意的时候了；忘掉杀戮，忘掉纵火吧！你已经被紧紧束缚住了，你的全部计划对我们来说如同白日的阳光一样明显。你现在不妨同我一起来回忆回忆！你还记得我在 10 月 21 日曾经在元老院说过，你的罪恶计划的同谋和助手盖·曼利乌斯将在某一天，亦即 10 月 27 日举事？难道我的活动没有应验？我不仅知道会发生如此重大、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更令人惊异的是，我并且知道举事的确切日期！

我在元老院里还说过，你计划在 10 月 28 日杀戮贵族，当时许多对国家有影响的要人已逃离罗马，他们逃离与其说是为了自身的安全，不如说是为了使你的阴谋不能得逞。难道你敢否认，那天由于我布置了守卫，由于我高度警觉，你被困住了，无法危害国家？尽管你曾经声称，在别的人都已纷纷逃离的情况下，只要把我们这些留下来的人杀掉，也就心满意足了。还有，当你认为 11 月 1 日夜间一发动进攻，便可夺取普赖涅特城的时候，你曾否发现该城已经根据我的命令，由我派去的军队、哨兵和巡逻队设防？无论你想什么，无论你想什么，绝不会不为我所听闻，不为我所看见，不为我所觉察！……

“现在，卡利提那，你沿着你已经开始走的路继续走下去，离开罗马吧！城门开着，你走吧！曼利乌斯为你建立的那些营寨等待你这位统帅已经很久了。把你的人也一起带走，即使不是全部，也是越多越好，让罗马变干净吧！只要你在你我之间隔着一道城墙，你便可以立即把我从巨大的恐惧之中解脱出来。你想继续留在我们中间，那是不可能的，我不同意，我不答应，我不允许！”

这篇演说辞情感充沛，修辞技巧很高，攻击有力、有理，胁迫卡提利那当夜就离开了罗马。

西塞罗的文体具有独特的风格。他利用希腊人在文化上的成就，结合自己的演说需要，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他能把讽刺、比喻、比较以及同义语等，用简练、明快、优美、动人的词汇巧妙地结合起来，使其演讲迭宕紧凑，犹如高山流水，欢畅清澈，雄壮有力。因此，他在法庭上、元老院和公共场所演讲时，常常获得听众一次又一次喝彩。另外，他的演说辞都是按一定的修辞程式组织起来的，经过细心加工，结构匀称，词汇丰富，句法讲究，音韵和谐，读来抑扬顿挫，铿锵有力，称为西塞罗式的句法。他向听众呼吁热情友好，对政敌攻击尖锐、粗鲁，用语流畅轻快，形式虽略嫌娇柔，但对于激化听众的情绪显然是有效的。他认为演说主要是打动听者的感情，而不是诉诸理性判断，因此，他不惜用诬蔑或歪曲事实的手段。他的演说风格被后代一些作家奉为榜样。他把演说辞这种散文体发展到了完善的地步，对于拉丁散文和拉丁语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西塞罗的作品不仅在意大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英法等国也广为流传，出现了许多信仰者和爱好者。如 15 世纪英国人文主义者约翰·弗利，他的图书馆里经常拥挤着许多西塞罗著作的读者，他以此引为光荣和骄傲。其中，最受欢迎的是西塞罗作品的爱好和崇拜者，他们被当时的人们称为西塞罗派。西塞罗的作品被翻译成各种文体，并多次重印，成为世界人民喜爱的读物。

与西塞罗同时代的散文家还有凯撒（公元前 100—前 44 年），他是共和国末期贵族和平民的复杂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一位军事冒险家，也是一个杰出的散文作家，他的历史著作《高卢战记》7 卷，记述了罗马人征服高卢人和日尔曼人的过程。《内战记》5 卷，回忆他和庞培的战争。他的散文不用修饰的藻饰，风格质朴而流畅，平易而感人，与西塞罗的散文风格形成对照，反映了罗马人讲求实用的特点，成为拉丁散文的另一种典范。

（2）卢克莱修

卢克莱修（约公元前 98—前 55 年），生于共和国末年，是古罗马一位

有独特见解的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诗人。他留给后世的唯一著作是哲理诗《物性论》，共6卷，每卷1千多行，是献给他的朋友、罗马诗人、政治家伊壁鸠鲁派信徒明米佑的一部哲理长诗，主要阐述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哲学。他认为，“无不能生有”，宇宙的一切皆由原子组成；宇宙的最高主宰不是神，而是“自然规律”。他反对灵魂不灭的说法，否认来世的存在。他说，灵魂也是物质的，随躯体而死亡，人死后失去感觉，死后的恐怖和神罚都是迷信。他用大量篇幅解释雷、地震、瘟疫等最易引起迷信的现象。他描写了万物和人类的起源，歌颂人类文明，对人类前途充满信心。

卢克莱修在《物性论》中写道：

……死亡

对于我们会更不算什么一回事，
如果还有一种东西比无本身还更少：

因为在人死亡的时候立刻就发生
汹涌的物质群的更大的分散，
并且对于生命的冰冷的中止

已一度落在其身上的人，
没有一个能再苏醒站起来。

还有，多少次人们从心中说出这种话，
当他们斜躺在榻上手里拿着酒杯，
脸孔为新鲜的花冠遮去一半的时候；

“对于我们这些可怜虫欢乐是短促的，
很快很快它就会成为过去，此后
我们就不能够再把它唤回来。”——

仿佛在死后他们的最大灾祸
就是去受焦渴的苦，没水喝的苦，
或者受别种需要不能满足的苦。

还有，如果自然突然发出一声音，
亲身这样来谴责我们：

“凡人！你究竟有什么严重的不幸
值得你这样浸沉在过度悲哀的怨诉中？

为什么要这样为死亡而哭泣号啕？

因为如果你过去的旧时的生活

对于你是可喜的，而你的所有幸福
并不是像倒在破漏的瓶子里那样流掉，
未享受就丧失，为什么不离开厅堂，
像一个饱尝了生命的客人一样？

为什么不带着满足的心情

现在就接受这无痛苦的安息，你这蠢汉？

如果你所得到的已经被浪费和失去，

而现在生命已成为一种讨厌的事情，

那么为什么还企图多加些上去，——

它同样会可怜地失掉，未享用就消灭？

为什么不宁可让生命结束，让痛苦告终？

因为我能够再想出来，或者

找来叫你快乐的，一点也没有；
所有的东西都永远是一样。
如果你的身体还没有因岁月而枯残，
或者你的四肢还未曾衰耗，
事情也仍将永远不变，甚至即使你
继续活下去而赛过许多世代的人，
——不，甚至即使你永远活着不死。”
我们还能有什么回答，除了说
自然在这里提出一个公正的谴责，
用她的话说明了案件的真相？
但如果一个年纪更大更老迈的人在埋怨，
并且为他的死而悲苦超过适当的限度，
那她岂不更有权利来对他大喝一声，
用更严峻的声音来加以谴责：
“省点眼泪吧，丑东西，别再号啕大哭！
你皮也皱了，也享受生命的一切赏赐；
你总渴望没有的东西，蔑视现成的幸福，
以致对于你生命不完满而无用地过去了，
而现在出乎你意料之外地死神已站在你的头旁边
——并且是在你能吃饱盛筵
而心满意足地回家去之前。
你就把不适合你年纪的东西放下，
大大方方地让位给你的儿孙们吧，
因为你不能不这样做。”
她这话说得很公正，我想，
谴责和鞭笞都很对；因为旧的东西
被新的东西排挤，总得让开来。
一物永远从牺牲他物而获得补充。
也没有一个人是命定要坠入深渊，
或者黑暗的地狱。因为物质必须有，
以便后代的人们能够借它生长，——
虽然这些世代也将跟着你死去，
当他们的生命完结了的时候。
因此，像你自己一样，在这之前
许多世代曾经过去了，将来也将要过去。
这样，一物永远从他物产生出来，
生命并不无条件地给予任何一个人，
给予所有的人的，只是它的用益权。

在这一段诗中，诗人设想打官司的双方就生与死的问题展开争论：一些及时行乐的可怜虫贪生怕死，甚至害怕死后有饥渴之苦；一些养尊处优的青年人追求长寿，他们对死亡的恐怖超过了适当的限度。对于这种愚蠢的想法，诗人将自然拟人化，让她站出来作为审判官给予义正辞严的谴责。拟人化的自

然，当然是诗人的喉舌，诗人自己站出来直陈己见：旧的东西被新的东西排挤，总得让开来。一物永远从牺牲他物而获得补充，没有死亡就没有新生，这是一个朴素的真理。在一则古罗马神话中，诸神赐给凡人一个长生不死的命运，朱诺听说以后，赶忙请求诸神收回成命，因为她懂得没有终结的生命是不会有真正幸福的，智慧的罗马人大都懂得这个朴素的真理。

卢克莱修的诗坦率、乐观，字里行间洋溢着热情。他还继承了古希腊、罗马教诲诗的传统，十分注意发挥诗歌的教育作用。

《物性论》以它的对世界的通俗、具体、生动、形象、富于诗情画意的描写，在欧洲古代文学中占有独特的地位。诗人有意识地借助各种艺术手段来恰当地表现抽象难懂的道理。如用阳光投射黑暗的地方所见到的微粒运动的情形来说明肉眼看不到的原子运动的情况，用瓶破水流这一具体形象来说明人一死就不复存在的道理。诗人用有形的东西来说明无形的东西，用看得见的东西来说明看不见的东西，以感性形象打动人心，收到了深入浅出、浅显易懂的效果。诗人信手拈来的比喻贴切生动，解决了表达概念的困难。例如用远山放牧的羊群来比喻静止的物体，其中组成它的原子像单只的羊却是在运动着的。他又用字母与词的关系比喻原子与万物的关系。森林里的鸟类，水里的鱼儿，玩着旋转游戏的孩童等等都入了诗，把哲理与诗意融合在一起。长诗充满了哲理，使科学道理通俗易懂。

卢克莱修的《物性论》作为欧洲古代唯物主义最出色的纪念碑和有高度艺术的文学作品至今还被人们研究、传诵。全诗规模宏大，文笔优美，富于幻想，风格崇高。马克思称他为“朝气蓬勃，叱咤世界的大胆的诗人”。

（3）卡图鲁斯

卡图鲁斯（公元前 84—54 年），出生于富有的骑士家庭。他传下 116 首抒情诗，包括时评诗、爱情诗、赠友诗、悼亡诗以及各种内容的幽默小诗。

罗马抒情诗歌萌发于悼亡诗歌和颂神诗，这些诗歌很粗糙。直到后来，在希腊抒情诗的影响下，罗马抒情诗才成为文学作品，第一个写抒情诗的人是罗马诗人莱维乌斯，它生活于公元前 1 世纪中叶，写了 6 卷爱情诗，只传下片断。他首先把亚历山大时期的希腊抒情诗介绍到罗马，模仿希腊诗的语言和格律。他的文学成就不高，但在罗马抒情诗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内战时期，一部分贵族青年对现实表示不满，沉湎于爱情生活，追求个人幸福。贵族阶层的旧道德和伦理也濒于破产。此外，罗马诗人又受到希腊新时期侧重内心感受、雕琢辞藻的诗风的影响，这些因素促成了罗马抒情诗歌的繁荣。卡图鲁斯是第一个重要的抒情诗人。他的时评诗笔锋尖锐，指向飞扬跋扈的凯撒；他的赠友诗笔触细腻，情感真挚；他的爱情诗使他享誉诗坛。他在罗马和贵族交往，爱上了一位容貌美丽、名叫克洛狄亚（诗中为勒斯比亚）的贵族出身的有夫之妇，他把自己从热恋到分离的炽热、复杂的强烈感受融合在简洁、优美的诗行里。他在《歌》中写道：

他幸福如神明，不，但愿这话
不读神，我看他比神明更有福分，
他就坐在你对面凝神注视，

倾听你笑语绵绵。

你可知道啊，亲爱的勒斯比亚，
你那甜蜜的笑容顿时使我麻木，
我只要一看见你，便口干舌燥，
发不出一丝声音。

一股纤细的热流周身传遍，
耳内只觉嗡嗡嗡不断响鸣，
两只眼睛也像被东西蒙住，
如暗夜朦胧不清。

卡图鲁斯啊，闲逸使你烦闷，
闲逸使你欢娱放纵无拘束。
你可知，闲逸曾使繁盛之都
宫垣崩塌遭覆灭！

当勒斯比亚派朋友伴送卡图鲁斯远行时，卡图鲁斯写下了《致友人》：

孚里乌斯，还有你，奥勒利乌斯，
你们愿意陪伴苦命的卡图鲁斯，
无论他去遥远的印度，拍岸惊涛
回响着隆隆轰鸣，

或是去希尔卡尼亚，奢华的阿拉伯，
茫茫的萨卡草原，有射手的帕提亚，
或是去七条支流汇集的尼罗河
灌溉的无际旷野，

或是翻越险峻的阿尔卑斯山，
目睹凯撒在那里建立的标记，
高卢的莱茵河风光，不列颠的
令人恐怖的海峡，

命运注定我忍受的一切，
你们都愿和我一起承担，
请转告她几句临别赠言，
恕我用语不太友善：

让她和那些浪子厮混，
伸开双臂一次拥抱数百人，
她对他们一点情意都没有，
却惹得他们魂消魄散。

但愿她忘却我对她的旧情，

她使我像一朵掉落荒原的野花，
凄楚地被经过的犁铧碰得
瓣折叶损枝断残。

诗中充满着炽热的爱恋，文字优美。卡图鲁斯的诗对罗马抒情诗的发展有影响，也很受后世欧洲诗人的推崇。

奥古斯都时期，在共和国时期成就的基础上，罗马诗歌达到了它的高峰，文艺理论也取得了新的成就。代表作家是维吉尔、贺拉斯和奥维德。这一部分后面将单独介绍。

4. 帝国时期的罗马文学

（公元1世纪—5世纪中叶）

帝国时期是罗马文学的衰落时期。比较有成就的是塞内加的悲剧，菲德鲁斯、马尔提阿利斯和尤维那利斯的讽刺诗，塔西佗和普鲁塔克的传记文学，阿普列尤斯的小说，小普林尼和鲁齐阿努斯的散文等。

（1）塞内加

塞内加（公元4？—65年），是罗马最重要的悲剧作家，骑士阶级出身，学习过修辞和哲学。他在克劳狄乌斯和尼禄统治时期参与朝政，后因谋杀尼禄事件受牵连，奉命自杀。他宣扬人必须服从命运，以内心宁静克服生活中的痛苦，表现了这一时期罗马贵族的软弱、悲观。他宣传同情、仁爱、鼓吹平等和人道的思想，主张对奴隶不能太残忍了，以调和阶级矛盾。恩格斯称他为“基督教的叔父”。他写了一篇讽刺文《神圣的克劳狄乌斯变瓜记》和9部悲剧。《变瓜记》嘲笑克劳狄乌斯生前作恶，死后变不成神而变成南瓜。他的悲剧代表作是《特洛亚妇女》、《美狄亚》、《俄狄浦斯》等，大多取材于希腊神话。

《特洛亚妇女》反映了命运的残酷。特洛亚城陷落后，作为战利品的女俘正在等待着摇签分配给获胜的希腊人。第一幕写老王后赫枯巴和女俘悲叹亡国的命运。第2幕写阿喀琉斯的鬼魂要求把他生前喜爱的特洛亚公主波吕克塞那杀来祭他，气氛阴森恐怖。阿喀琉斯的儿子皮洛斯为献杀一事同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发生激烈争吵，这是罗马悲剧中最富于戏剧性的对话。神巫宣布必须献杀，还须把赫克托耳的幼子处死，以绝后患。第3幕写安德洛玛刻保护儿子时的混乱心理。安德洛玛刻说道：

“哎呀，什么地方不会泄露我的秘密呢？把你藏在哪儿好呢？那座一度充满了珠宝的堡垒，神造的墙壁，名闻列国，为人所羡慕、所妒忌，如今变成一堆焦土，全部被战火烧平，这么大一座城池竟没有一块地方可以藏我孩子。怎样才瞒得过敌人呢？那边就是我亲爱的丈夫的圣墓，高大雄伟，敌人见了就害怕，他父王虽然伤心，却毫不吝惜，费去大量资财才把它造好。我最好的孩子托付给他父亲。我浑身流着冷汗，死人的坟墓是个不祥的朕兆，我这可怜的人哪，不禁发抖。

“孩子啊，我是多么盼望你还在母亲眼前啊，我多么盼望知道你抛弃母亲之后遭到了怎样的际遇，在什么地方。纵使我的胸膛让敌人的长枪刺透，双手戴上了割破皮肉的手铐，前后有炙人的烈火把我围住，我也决不会摆脱作母亲的关心。孩子啊，你现在在哪儿啊？你现在的命运又是怎样呢？你是

否在那没有路的田野里乱撞呢？是否祖国的无边火焰把你的躯体烧毁了呢？还是有些残忍的敌人在兴高采烈地看你流血呢？还是被野兽咬死了，尸首被伊得山的鹰隼吃掉了呢？”这样的心理描写十分精彩，是塞内加悲剧的最高成就。第4幕写海伦诱骗波吕克塞娜扮作新娘去赴死。第5幕写公主和幼童悲壮赴死，连希腊人也为他们流泪。剧情直线发展，没有曲折和转变，气氛越来越悲惨，反映了作者悲观绝望和罗马人的颓废消沉的心情。此剧摹仿欧里庇得斯的《特洛亚妇女》和《赫卡柏》（赫枯巴），但立意不同。

塞内加的悲剧以希腊悲剧为蓝本，影射罗马的社会现实，内容是讨论生死、情欲、自由意志、罪恶，反映了当时贵族反对派对暴虐皇帝和专制制度的不满情绪。他的剧本不为演出而写，主要供少数人阅读和朗诵。剧中充满凶杀、恐怖、出卖、复仇、鬼魂、巫术，过分地渲染悲剧气氛，而且长于心理刻画和紧张对白。语言夸张，言辞雄辩，富有哲理。他的人物性格单纯，没有发展。他把剧情限制在一昼夜，把动作限制在一个地点。塞内加的悲剧继承了希腊悲剧的传统，对文艺复兴时期和17世纪古典主义悲剧产生过影响。

（2）讽刺文学

这一时期，和塞内加的倾向相反，具有民主倾向的社会讽刺诗有了较大的发展。著名讽刺诗人有菲德鲁斯、马尔提阿里斯和尤维那利斯。

菲德鲁斯（公元1世纪前半期），是罗马唯一重要的寓言诗人。他是希腊北部出生的奴隶，在屋大维宫廷服役获释。著有《寓言集》5卷，大都摹仿伊索的动物寓言。他站在罗马受压迫阶层的立场上，借寓言讽刺罗马社会政治。最著名的有狼和羊的故事，揭露告密者“捏造理由陷害无辜的人”。青蛙因为缺水反对太阳结婚，如果“它生出小太阳来，未来不堪设想”。用以讽刺权臣想娶皇帝的亲族，争夺皇权。菲德鲁斯在欧洲寓言的发展中占一定地位。

马尔提阿里斯（公元40？—104年？），通称马希尔，是一位卓越的讽刺诗大师。主要诗作是《碑铭体诗集》12卷，1500余首，大都为讽刺短诗。他说：“生活中可以议论的，就是我创作的内容。”他的诗揭露了罗马社会种种荒诞的现象和弊端，勾勒出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为读者绘出一幅1世纪罗马帝国时期的生活图景。诗人出生于西班牙，终生贫困，在诗中对一些社会下层人们表示了深切同情和关怀。例如：

讽刺诗（一）

你独居，富有，生于布鲁图斯执政之年，
你以为你的知心好友无数？
你有过真诚的旧谊，当时你年轻、贫寒，
一切新交都更希望你早死。

讽刺诗（二）

朋友不分彼此，康狄多斯，这是你的格言；
难道这就是你时刻宣扬的不分彼此？
你身着斯巴达人用伽勒苏河水涤过的长袍，
或是帕尔马的礼赠，用精选的羊毛织成；

“生于布鲁图斯执政之年”，意为“业已老朽”。

而我的长袍，甚至没有一个草人承认
是他的披挂，穿上去忍受狂牛的尖角。
卡德摩斯的土地给你送来阿格诺式披肩，
你自己用的是利比亚圆桌，印度象牙作腿，
而我这里则山毛榉板搭在破砖台上。
你面前镶金的大盘里盛满了名贵的鲑鱼，
螃蟹啊，只有你在我的小碟里泛红润。
你有成群的奴仆同特洛亚美少年竞争，
而我这里替代伽倪墨得斯的则是我自己。
你如此富有，一点也不让你的好友分享，
却还在不断地宣称：“朋友不分彼此。”

（王焕生根据《马尔提阿利斯诗集》拉丁文译出）

马尔提阿利斯的诗歌风格简短生动，含蓄突兀，富于机智和讽刺。

尤维纳利斯（公元 60？—127 年），又译朱文纳尔，也是著名的讽刺诗人。他的父亲可能是一个获释奴隶。他终生贫困，40 多岁才开始写作。他因得罪朝廷被迁往外地，死于他乡。他一共留下了 5 卷诗集，其中有 16 首史诗体讽刺诗。

尤维纳利斯的作品讽刺性强，他用托古喻今的手法讽刺皇帝的专制、朝廷的谄媚、贵族的荒淫。他认为在罗马皇帝宰割下的世界已是半死了。渔人打了一条 6 斤重的大鱼，没有人敢买，因为这种大鱼只配献给皇帝。大臣们附和着说：“这条大鱼是皇朝的祥瑞，它是自愿投入渔网的。”他揭露帝国的言论不自由，皇帝的密探布满罗马，人人噤若寒蝉，如果谁敢操刀在手忿然大吼，那就会引起统治者的恼怒和批评者的悲痛。他特别同情文人食客，说他们是在意大利只有在死时才穿得上一件“拖累”的人。他最感痛心的是“尊严”的丧失，不幸的穷人受人嘲笑。他的作品表现出宿命论的观点，把对恶人的惩罚寄托在恶人的良心谴责上，歌颂仁慈是人类最高的感情。例如：

讽刺诗（一）（节译）

我怎能不回答？我胸中怎么不燃起怒火？
有些人随从成群，欺压黎民，其实这位
是玷辱男童的坏蛋，那位逃脱了法庭的惩罚，
在全能的金钱面前还有什么羞耻可言？
被放逐的马里乌斯午后便开始纵酒行乐，
可你行省啊，虽是胜利者，却在悲嗟哭泣！
难道我不认为这些更适合维努西亚的灯光？
难道我会放过这些绝妙的好题材而热衷于
赫刺克勒斯和狄俄墨得斯的征战 谜宫的
牛鸣，代达洛斯的飞翔，伊卡罗斯的坠海？

阿格诺是腓尼基国王，卡德摩斯是他的儿子。

伽倪墨得斯是特洛亚王子，俊美无比，被宙斯掳到天庭作酒童。

维努西亚是贺拉斯的故乡。

赫刺克勒斯和狄俄墨得斯是古希腊的英雄。

“牛”指弥诺陶洛斯，是人头牛身的怪物，住在克里特岛上的谜宫里。代达洛斯因为建筑谜宫的事，被克里特岛的国王弥诺斯囚禁，他用鸟翼粘在他自己和他儿子伊卡洛斯身上，父子逃离克利特。伊卡洛斯因

当妓馆老板攫取荡汉的钱财，妻子没有任何继承权而使贪禁的老板无所顾忌，练就了鼻子对着酒杯警觉地打鼾的本领；当有人认为寄希望于入伍从军无可非议，在他把钱财花在骑术上，家产荡无之后，年轻的车手奥托墨冬为他赶车疾驶在弗拉弥尼乌斯大道上，他也常常亲勒马缰，好在身着披肩的轻浮女郎面前炫耀显扬。难道你能不伫立街头片刻写满几块蜡板。当你看见伪造文件的人由六个人抬着，在大庭广众之下，坐在无顶盖的圈椅里，从危笃仰卧的墨克那斯那里把钱财抢走，用一纸短短的遗书，拎着油墨未干的印记，弹指一样使自己声名显赫，财富无量。一位富有的贵妇给味道温和的卡勒斯酒兑上蟾蜍的毒汁，准备递给口渴的丈夫，指导没有经验的亲属如何欺骗社会舆论，把变黑的尸体弄走，机巧胜于卢库斯塔。放胆去干能赴古阿鲁斯河或进监狱的事情吧，如果你想成名。正义受称赞，但她瑟缩发颤；犯罪可以为自己挣得佳肴、府第、花园、古老的银器、精制的杯盏、成群的山羊。诱惑贪婪的少妇的人能让谁安稳地睡眠？轻薄的妻子、着童袍的淫棍能让谁安静？即使没有天才，愤怒出诗句，或如我的，或如克鲁维埃努斯的，什么样的都可以。自从当年狂风暴雨给大地带来洪水滔滔，丢卡利昂驾着一叶小舟航行在高山之上，他呼请命运，用徐缓的呼吸使石头和暖，皮拉给男人们创造出自然装束的女人，人类的一切行为、愿望、忧惧、愤懑、爱欲、欢乐、纷争，都将是拙作的食粮。

诗人目睹腐败堕落的现实一吐为快：“即使没有天才，愤怒出诗句。”这句诗早已成为名言。马克思曾将这句诗改写成“愤怒出诗人”，用以赞扬诗人的战斗激情。

尤维纳利斯忿恨不平，笔锋尖锐，讽刺辛辣，风格夸张，热情洋溢，生动地再现了罗马的社会生活。

（3）传记文学

帝国时期的传记文学，是罗马文学对后世的另一贡献。传记文学在希腊

为飞得太高，靠近太阳，以致粘胶融化了，自己坠海而死。

丢卡利昂和皮拉夫妇二人在洪水之后，往身后扔石头，石头变成了人。

王焕生根据洛布古典丛书《尤维那利斯诗集》拉丁文译出。

时期已颇发达，但传世甚少。罗马早期传记大都失传，有幸留传下来的塔西陀和普鲁塔克的作品对后世最有影响。

塔西陀（公元 55？—118 年？）出身旧贵族，被称为贵族共和国派最后一个代表。有《日尔曼志》1 卷，记载日尔曼各部落的地理、社会、宗教、军事、政治、风习等。他认为，各部落虽然野蛮，但有朝气，帝国的罗马虽有高度文明，但已腐败衰朽。他的主要著作有《历史》，残存 4 卷余，写 69 年到 96 年间的事，《编年史》残存约 12 卷，写 14 年到 68 年间的事。两部作品文学性很强，是帝国时期政治生活的最生动记载。作者从人物之间的勾心斗角的关系、人物行为的动机来刻画人物，因而形象鲜明，富有戏剧性，常为后世戏剧家、小说家所引用。他的散文风格以简练著称。

普鲁塔克（公元 46？—120 年？）是希腊语作家。他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共 50 篇，记载从半神话人物一直到 1 世纪的罗马皇帝的生平。作者把一个希腊名人和一个罗马名人的传并列，大多数附以“合论”，加以对比，以折衷派的道德标准衡量人物，宣扬节制、人道以及对神的恐惧来反对罪恶和暴政。书中保存了许多故事，后来作家研究古代思想、吸取素材时多所征引。莎士比亚写希腊、罗马人物的悲剧都取材于此书的英译本。

与普鲁塔克同时的罗马传记作家还有绥通纽斯，他著有《名人传》，已散失或残阙。《十二凯撒传》是他的主要作品，包括从凯撒起到多密善 12 个皇帝的传记。他曾任哈德里安皇帝的秘书，因而他的传记采用了许多文献档案。他接受帝国制度，只是不赞成皇帝的残暴，对皇帝政治上和私生活上的腐败有所贬抑。关于灾异、妖兆等迷信记载尤多，对人物的状貌和性格的描写比较生动。

小普林尼（公元 61？—114 年？），是罗马著名作家。他出身贵族，过继给舅父老普林尼。他于公元 100 年任执政官，身居高位，却对政务很不热忱，而向往恬静的生活，潜心写作。他的政治演说辞和诉讼演说风格庄严、华丽，作品已失传。使他成名的是他的 10 卷书信，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学各方面。

维苏威火山在长久沉寂之后，于公元 79 年 8 月 24 日突然爆发，大量的灰烬和熔岩把附近地区完全埋没。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有人对庞培城遗址进行了系统的发掘，再现了该城被火山灰埋没的悲惨景象。小普林尼对当时的情景作了真实的描写，在现存的有关维苏威火山爆发情况的史料中，小普林尼的两封《致塔西陀》书信是唯一的 firsthand 文字材料。他写道：

“ 那块云是从哪座山升起来的，远处观看的人分辨不清楚——它是从维苏威山升起的，那是后来才知道的，——论形状，与松树的树冠最相像。它像是被一株无比高大的树干举向天空，无数的枝条向四方伸展，我想那是因为它被新聚集的气流托起，在空气力乏之后无所依赖，或者甚至是因为被自身的重量所制服，因而向四面消散，有时呈白色，有时乌黑混浊，好象是把泥土和尘埃一起裹挟而上。……维苏威山到处大火熊熊，光照天际，在漆黑的夜空显得格外明亮。……浓雾终于减退，消散，像烟，又像云。真正的白天出现了，还有太阳照射，不过光线是那样的昏黄，像日蚀时常见的那样。人们用惊恐的眼神扫视着面前的一切，一切都变了，全都覆盖着一层灰，厚厚的、灰白如雪。 ”

小普林尼的这些书信经过文学加工，风格简练，语言流畅，写人、叙事、描景都流露出清新的气息，具有浓厚的生活情趣，显得活泼可亲，为同代人

所称赞，为后世所摹仿。

尼禄的亲信彼特隆纽斯出身贵族，贪图享乐，赢得“风流总裁”的称号。后因与共和派反尼禄的阴谋有牵连，受命自杀而死。小说《萨蒂里卡》一般认为是他的作品。全书可能有 20 卷，现在仅存一些片断。采用诗文间杂的体裁。

小说通过主人公恩柯尔皮乌斯的自述，广泛描写了 1 世纪意大利南部半希腊化城市的生活。这个人出身富裕家庭，后来因为杀人成了流浪汉，和两个同伴到处行窃，干了许多荒唐勾当。全书现存部分中最长、最完整的部分是主人公到暴发户、获释奴隶特里玛尔奇奥家参加的一次宴会。当时获释奴隶数量日增，靠投机、放高利贷、买卖奴隶致富。这些人粗鄙、愚昧，又好故作姿态，炫耀风雅。作者站在贵族立场，讽刺这些人的庸俗趣味。特里玛尔奇奥的田地大得“连乌鸦都飞不到头”，奴隶多得“分了四十个等级”，在他的田庄里，一天出生 70 个小奴隶。作者大力描写了宴会的奢侈。当时不少获释奴隶经济上暴发，政治上擢升，担任国家或行省的重要职务，有的甚至成为皇帝近臣，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势力。作者流露出对这种人的无限憎恨。小说中穿插了一些民间流传的故事和文学批评，最著名的故事是讽刺以弗地方一个寡妇在丈夫陵墓里和看守犯人尸体的兵士恋爱的故事。小说里的猥亵成份反映了当时贵族堕落的精神面貌。

《萨蒂里卡》可以说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部流浪汉小说，手法夸张，描写生动，讽刺尖锐，人物性格鲜明，对阿普列尤斯的《金驴记》和欧洲 17、18 世纪的小说有影响。

阿普列尤斯（公元 124？—175 年？），出身于北非一个官吏家庭。起初在迦太基求学，后来赴雅典深造，主要研究修辞和哲学。也曾赴希腊各地游历，体察风土人情。当时各种魔法、占卜、宗教秘仪广泛流行，他在游历期间对这些东西有不少接触，并入了埃及的伊希斯教门。后来在罗马作过律师，几年后又回到故乡。阿普列尤斯在世时以演说家、哲学家驰名，传下哲学著作 3 篇，答辩辞 1 篇。但使他在后世闻名的是他的长篇小说《金驴记》。

《金驴记》又名《变形记》，全书 11 卷。这是罗马文学中最完整的一部小说。前 10 卷叙述主人公卢基乌斯恢复人形的故事。青年卢基乌斯经商到达希腊中部帖萨利地方，这是有名的魔法之乡，他住在友人弥洛努斯家中，得知弥洛努斯的妻子潘菲拉会玩魔法，便要求女仆福提斯帮助他接触魔法的秘密。一天福提斯找卢基乌斯观看女主人怎样变成鸟。卢基乌斯看后，立即请求福提斯试试魔法，福提斯却帮他变成了一头驴。

“我失去了得救的希望，环顾周身，发现自己不是变成鸟，而是变成驴。我想责备福提斯干的好事，然而我已经失去了人类的动作和我常有的声音。我只好搭拉着下唇，眼睛含着泪花，斜视着她，默默地向她请求。她看见我成了这个样子，也一面拍打着脸，一面大声叹道：‘匆忙和慌乱欺骗了我，那些盒子样子完全一样，使我上了当。不过还好，救治这种变形的药物很容易找到。你只要啃一些蔷薇，就可以脱离驴的形象，重新成为我的卢基乌斯。啊，要是昨天晚上我也像通常那样，为我们准备了花冠，那该多好啊，那样你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延误，甚至等上一晚上。不过天一亮，我会立即给你找来解救的药的。

“福提斯这样叹息着，而我尽管已经变成了驴，由卢基乌斯变成了一头驮兽，却仍然保持着人的意识，我久久地反复思考，要不要用脚跟踢她，用

嘴狠狠地咬她，把这个不中用的坏女人置于死地。但是，较为理智的想法使我放弃了上述这种冒失的考虑，因为我要是杀死福提斯，就等于杀死使我恢复原状的帮手。就这样，我只好晃动着下垂的脑袋，默默地忍受着暂时的屈辱，听命于自己的不幸遭遇，走向厩棚，走向我的马——我的忠实的驮运者。”

卢基乌斯变驴后，被一群强盗劫去，后来落到奴隶主庄园，又辗转卖给磨坊主和菜农，又为军人劫去，卖给贵族厨奴，最后伊希斯女神把他救了，他恢复了人形，就皈依伊希斯教门。

卢基乌斯虽然变成了驴，但仍保持着人的思维。小说以主人公变驴后的见闻为线索，真实而广泛地描绘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人物的生活。如贵族地主纵犬咬死小农三个儿子，强占土地；罗马军官强夺人民财产；富人豢养野兽，举办斗兽会等。小说还叙述了不少由于贪图金钱、遗产，或由于情欲而引起的凶杀。书中插入不少各种类型的民间故事。作者利用主人公变驴后的遭遇和感受，刻画了穷人和奴隶受奴役和虐待的处境。主人公变成驴子，不能说话，但保持了好奇的性格，仍是一个能思考、有意识的观察者。由于人们不怀疑他，他能听到看到最卑鄙的思想和行为。同时，小说还描写了不少巫术、怪异，贯穿着埃及宗教的神秘精神。主人公历尽苦难，最后达到和平仁爱的彼岸。

《金驴记》构思巧妙，叙述生动，风格华丽，富有一定的诗意，情节动人，滑稽可笑。不过作者叙述时往往态度冷漠，不表露自己的好恶。

鲁齐阿努斯（公元 125？—200 年？），也称琉善，是希腊语讽刺散文家，也是古罗马文学中最后一位重要作家。他出生于叙利亚贫苦家庭，遍游小亚细亚、希腊、意大利等地，曾任律师、修辞教师、官吏。他的著作有 80 种，讽刺古代社会瓦解时期各种宗教、哲学流派、修辞、文学等方面。他最主要的作品有《诸神的对话》，以生动活泼的语言，剥掉了神的尊严。《死者的对话》讽刺社会上的虚荣、欺骗、追求暴利的风气。讽刺故事《柏利格林努斯之死》写流氓利用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仰进行欺骗。《一个真实的故事》以荒诞不经的航海游记形式，讽刺当时的历史、游记、诗歌、哲学、考据等著作。恩格斯称他为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伏尔泰，对任何一切种宗教迷信一律持怀疑态度。琉善的作品反映了公元 2 世纪奴隶制社会开始瓦解时期奴隶主思想意识的崩溃。他的散文风格轻快，富于机智，爱引用古希腊文学、历史、哲学中的辞句，也染上修辞的习尚。

5. “奥古斯都”时期的三大诗人

（1）维吉尔

维吉尔（公元前 70—前 19 年），是古罗马最杰出的诗人，出生于意大利北部曼图亚城附近农村的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里。他幼年在农村度过，熟悉农村和农业劳动，热爱自然。后来，他去克雷莫纳、罗马和意大利南部学习哲学、修辞，受到良好的教育，进而专心写作。他的早期诗作大都散失，只有少数短诗流传了下来。内战时期，屋大维为了分配土地给复员老兵，曾没收过他家的田地。后来，他向屋大维申诉，在麦凯纳斯帮助下重获地产。从此维吉尔成了麦凯纳斯文学集团的成员，屋大维的拥护者，主要作品有《牧歌》、《农事诗》和史诗《埃涅阿斯记》。

《牧歌》是在希腊诗人忒俄克里托斯的田园诗影响下写成的。包括 10

首短歌，采用牧羊人对歌或独歌的形式，内容有爱情诗、哀歌、哲理诗、酬友诗等，还有一些诗是描写农村凋敝景象的。这些短歌中有些诗行就是希腊诗的改写或集句。但同忒俄克里托斯单纯描写田园景色和牧人爱情不同，维吉尔在歌唱牧人的生活和爱情的同时，还抒发了对当时政治和社会情况的真实感受，反映了小土地所有者厌恶内战，对大奴隶主消极抗议的情绪。在第九歌中，诗人借牧羊人的口说道：

我们今生居然经历到了未曾梦想过的事，
一个陌生人变成了我们的土地的占有者，
他居然说：“这是我的地，你们老农户，搬走。”

在这样颠三倒四的世界，我们认输，我们悲痛。
我们现在正在把这群羔羊给他送去，愿他倒霉。
这样的诗句，显现出战争期间人民被迫离乡的痛苦和对统治者的消极抗议。当屋大维归还了维吉尔的土地后，他很感激，欣然写道：

老头真好运，这样你的土地可以保持，
对你就很够了，即使那不毛的沙石和沼泽的泥蒲都向一切田地侵扰，
怀胎的母羊总不必吃异乡的牧草，
也不会接近别人的羊而传染疫病。
老头真好运，这里是熟悉的水滨，
在圣洁的泉水旁边，你可以乘凉；
在这里，丛榛上的繁花跟从前一样，
有希伯罗的蜜蜂来采花上的蜜水，
并且经常以营营的柔声催人入睡；
高高的岩石下修葡萄的人临风高吟，
你宠爱的鸽子也咕咕地叫个不停，
榆树上的斑鸠也不断地互相呼应。

在诗中，他还歌颂黄金时代的重新到来，庆祝罪恶与恐怖的结束：

但当坚实的年代使你长大成人的时候，
航海的人将离开海，那松木的船艘将不再运货，土地将供应一切东西，
葡萄将不需镰刀，田畴将不需锄犁，
那时健壮的农夫将从耕牛上把轭拿开，
羊毛也不要染上种种假造的色彩。
草原上的羊群自己就会把颜色更改，
或者变成柔和的深紫，或鲜艳的黄兰，
吃草的幼羔也会自己带上朱斑。
现在司命神女根据命运的不变意志，
对她们的织梭说：“奔驰吗，伟大的日子。”

在这里，维吉尔抒发出久经战乱的人民渴望享受幸福生活的心情，希望毒蛇、毒草不再伤害羊群。但是诗人同时怀疑黄金时代是否能实现，目前的和平能否持续。这给作品蒙上一层感伤的色调，成为作者独特的风格特点。《牧歌》文字优美，结构严密，内容与形式新颖，出版后传诵一时，是维吉尔的成名作。

《农事诗》4卷，共2188行，是维吉尔的第二部重要作品。这是一篇关

于古罗马农民的工作与生活的诗歌，每一卷讲述一个主题。4卷分别写农业、园艺（葡萄与橄榄）、畜牧、养蜂。与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类似，但在创作意图和材料处理上，却有它自己的特色。赫西俄德的弟弟强占了他的土地，他写诗劝告其弟走诚实劳动的道路，属于个人规劝性质。维吉尔此诗是应屋大维的亲信麦凯纳斯之约而写的，目的在于配合屋大维振兴农业的政策，吸引农民返回农村。当时罗马经过内战的破坏，农村凋敝，屋大维实行了一项恢复农业的政策。维吉尔自幼生活在农村，熟悉农村的情况，他知道只有农村的繁荣，才能导致整个国家的强大。但他并不是枯燥地介绍农业技术和阐述农业政策，而是歌颂农村的快乐生活，把有关农业的一些专门知识同对祖国山河、自然景色、历史事件甚至神话传说的描写结合起来，歌颂农村快乐生活，把枯燥的农事写得生动有趣。他在第1卷中讲述了凯撒之死和内战引起的社会混乱，指出屋大维农业政策的重要性。在第2卷中描绘了意大利的美丽河山和丰收景象，说明这是实行新政策的结果，他对罗马的前途抱有乐观的态度。这部作品的风格特点在于诗人对大自然种种现象的敏感，赋予生产劳动以诗意，表达了独立小农的情趣。

《埃涅阿斯记》（一译《伊尼德》），是维吉尔的代表作，写于诗人一生中的最后11年，原准备再用3年时间修改，因病逝而不能如愿，只完成了初稿。遗嘱令友人将诗稿焚毁，经屋大维下令得以保存。全诗12卷，近万行，叙述希腊联军攻陷伊利昂城后，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率众来到意大利，成为罗马开国之君的种种经历，追述了罗马建国的光荣历史。

史诗前6卷摹仿荷马史诗《奥德修斯》，写主人公埃涅阿斯的漂泊生活。后6卷摹仿《伊利亚特》，写主人公征服意大利拉丁姆的经过。

第1至3卷写埃涅阿斯是特洛亚的王子，爱神维纳斯之子。特洛亚城陷落后，他率家人和部分队伍离开家乡在海上漂流7年，经历千辛万苦，来到了北非迦太基，受到狄多女王的热情接待。他向狄多讲述了特洛亚城陷落和自己漂泊7年的悲惨经历，狄多女王深深陶醉在爱情之中。

第4卷是全诗的精彩部分，以描写狄多的性格和心理著称于世。如写狄多爱上了埃涅阿斯：

“但是狄多早已被一股怜爱之情深深刺伤，用自己的生命之血在调养创伤，无名的孽火在侵蚀着她。埃涅阿斯英武的气概和高贵的出身一再萦回于她的脑际；他的相貌和言谈牢牢地印在她心上，她的爱慕之情使她手足无措，不得安宁。当阿波罗的明灯照亮了大地，黎明女神把潮湿的阴影从地平线上驱散，爱得要发疯的狄多对她贴心的妹妹安娜说道：‘安娜妹妹，我担心害怕，一夜没睡好觉！你觉得到我们家来做客的那个人怎么样？他的相貌如何？他的相貌和膂力有多雄壮阿！的确，我相信——并且不是毫无根据地相信——他是天神的后代。卑劣的性格一定表现为胆怯。唉，他受命运的折磨好苦啊！他讲的那场战争结束得多惨啊！如果我不是在死亡把我第一个爱人夺走之后，下了坚定不移的决心不再和任何人结婚，如果我不是对婚姻之事感到万分厌倦，我很可能屈服于诱惑。安娜，我坦白对你说，自从我可怜的丈夫希凯斯遭难，自从我的哥哥血溅了我的家园，只有他一个人触动了我的心思，使我神魂游移。我有一种死灰复燃、古井生波之感’……”

“在神庙里许愿对一个爱得发狂的人有什么用处呢？爱火一直在侵蚀着

她温柔的心，她心里的创伤还在暗中活动。不幸的狄多心如火焚，她如痴如狂满城徘徊，就像一头麋鹿，在克里特岛的树林里徜徉，不提防被一个携带武器的牧羊人从远处一箭射中，而牧羊人自己也不曾理会他的羽箭已经留在它的身上了；这头鹿穿过树林和狄克特山间小径奔逃，那致命的箭杆一直扎在它的腰间。”

这里，作者把狄多如痴如狂的爱和她的矛盾交织的心态表现了出来。终于，狄多勇敢地与埃涅阿斯结婚了。“狄多和埃涅阿斯来到了同一个山洞，万物之母的大地和赞助婚配的尤诺发出信号；电光闪耀，上苍做了婚礼的见证人，仙女们在高山之巅欢呼。就是这一天导致了苦难，导致了死亡；从这天起狄多就慵整梳妆，不顾名声，更没有想到保持爱情的秘密；她说这就是结婚，她用这名义来掩盖她的罪愆。”

埃涅阿斯和狄多结合后，天神尤皮特提醒他，上天的旨意是他必须离开狄多到意大利去建邦国。狄多感觉到埃涅阿斯要走，便带着绝望责备和悲怜之心加以挽留。然而埃涅阿斯因有尤皮特的命令，只有挣扎着把眷恋之情埋在心底，冷冷地告诉她自己得奉神意前往直意大利。狄多愤恨交加，晕厥过去。她再三挽留埃涅阿斯，但无济于事，不幸的狄多被命运捉弄得如痴如癫：

“她心情悲痛，无法入睡，尽管夜深了，她还是合不上眼，安不下心。她倍感痛苦，爱念一再涌上心头，刺痛着她，阵阵愤懑象巨浪一样使她辗转反侧，她独自在心里这样盘算道：‘啊，我怎么办呢？我还回到从前那些求婚者那里受他们奚落吗？从前我曾多次表示不屑和那些蛮族结婚，难道现在又去低声下气地乞求他们要我吗？不行，那么就去追随特洛亚人的船队，听从他们的颐指气使吗？难道因为我以前拯救过他们，他们就会帮助我吗？他们是否还会牢记我从前对他们的好处而感谢我呢？假定我自己愿意，谁又会接受我——一个他们所憎恨的人，把我带上他们傲慢的船上去呢？唉，被抛弃的人啊，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你还没有感觉到特洛亚人是背信弃义的吗？如果他们愿意带我走，又该怎么办呢？是我独自一个跟着这些欢呼雀跃一心想离开此地的航海人走呢，还是带着我的全体推罗亲友簇拥着去参加特洛亚人的行列呢？从前我是好不容易把他们从他们土生土长的西顿城带到这里来，现在我怎能又一次叫他们扬起风帆，漂洋过海呢？不行，你只有一死，这是你应得的。用宝剑斩断你的愁绪吧。我的妹妹啊，我固然爱得发疯，但是，是你不忍得看我伤心落泪，首先让我去面对那冤家，害得我承担起这痛苦的重担。为什么不准我象林中麋鹿那样生活，不必举行婚礼，不受人责骂，又尝不到这些痛苦呢？而我现在却破坏了对已故的希凯斯的誓约了。’”

埃涅阿斯上船走了，狄多在绝望中自杀而死。在这里，诗人对狄多表示无限同情和惋惜，这个浪漫故事可能影射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与罗马将军安东尼的爱情悲剧。

第5、6卷写特洛亚人从迦太基启程，在海上遇到风暴袭击，来到了西西里岛。适逢埃涅阿斯之父安奇塞斯逝世一周年，为他举行祭奠赛会。特洛亚妇女不愿继续前进，焚火烧船。埃涅阿斯只好让一部分留在西西里，在当地建立城邦，埃涅阿斯终于抵达意大利西海岸。女先知西比尔带他游历地府会见他的父亲，亡父指点他看他的后裔即罗马的一系列统治者，从罗慕路斯到凯撒与奥古斯都，并说罗马将由屋大维建立盛世。埃涅阿斯找到船队，向北驶去。

后6卷写埃涅阿斯来到拉丁姆地区，深得国王拉提努斯的器重。国王钦

佩他英勇，听从神意愿把女儿拉维尼亚嫁给他，引起了另一求婚者鲁图利亚王图尔努斯和埃涅阿斯的长期战争。埃涅阿斯来到居住在罗马城址的阿尔卡底亚王厄凡德尔处，请求他看在共同祖先的份上给自己以援助。厄凡德尔对埃涅阿斯讲述了拉丁姆早期的历史，又领他游览城市，看未来罗马的胜迹，并派儿子帕拉斯率军援助。维纳斯恳求丈夫伏尔坎为他造一面盾牌，上面雕的塑像是罗马的全部历史。埃涅阿斯把这面反映子孙后代光荣和命运的盾牌背在肩上。埃涅阿斯外出期间，特洛亚人阵前失利。天神尤皮特召集众神开会，号召大家停止特洛亚人与意大利人之间的战争。鲁图利亚人继续攻打特洛亚营寨，埃涅阿斯被困在城堡之内，毫无逃跑的希望。埃涅阿斯率一批厄特鲁里亚部队从海路归来，他驶近营地，高举盾牌，特洛亚人一片欢呼。战斗开始，埃涅阿斯旗开得胜，可图尔努斯杀死了他的盟友帕拉斯。埃涅阿斯为友报仇，拉丁阵营派人来要求停战，以便埋葬阵亡将士，埃涅阿斯完全同意，协议停战 12 天。双方会晤，宣誓埃涅阿斯与图尔努斯单独决斗，以定胜负。决斗开始，鲁图利亚人毁约，埃涅阿斯被暗箭所伤，众人把他护送回营，用仙药治愈。他又重返疆场，率部围攻拉丁都城。图尔努斯闻风命部下停止战斗，由他单独与埃涅阿斯交手，埃涅阿斯英勇无比：

“……图尔努斯正在踌躇，埃涅阿斯举起致命的长矛对准了他，看准时机，用尽全身力气，从老远向他投去。从弩弓上射出来的攻城石弹也没有它的声音响亮，霹雳的爆裂也没有它那样震耳。这矛带着可怕的死亡就象黑旋风一样飞去，穿透了图尔努斯铠甲的下摆和七层的盾牌的边缘，嘶地一声扎进了大腿的中段。在冲击下，图尔努斯双膝一弯，巨大的身躯倒在地上。鲁图利亚人都跳了起来，发出痛苦的呻吟，周围的群山呼应着，远近高处的林木也回应着他的呻吟……埃涅阿斯看着这些战利品，使他又想起了仇恨，心中重新燃起了可怕的怒火。他对图尔努斯说：‘你身上带着从我的人那儿夺去的战利品，还想逃脱我的掌握吗？这是帕拉斯在刺伤你，帕拉斯在杀你，是他在用你罪恶的血，给你惩罚。’他说着，满腔热血沸腾，一刀刺进了图尔努斯的胸膛。图尔努斯四肢瘫软，僵冷，在呻吟中，他的生命消失了，忿忿地地下到了阴曹。”全诗以图尔努斯被杀死而告结束。

史诗借用罗马传说来歌颂罗马祖先建国创业的丰功伟绩，而且把罗马历史与神话连接起来，证明罗马王族是神的后裔，非同凡俗。诗人通过主人公的遭遇，颂扬了罗马帝国的神圣传统和先王建国的艰辛。游历地府的所见所闻，歌颂了凯撒与屋大维的功绩，并肯定了罗马帝国的扩张政策及统治世界的使命。这些，都说明诗作有鲜明的政治倾向，表现了作者的奴隶主爱国意识。诗中塑造的埃涅阿斯的形象也体现了罗马人理想的道德品质，即敬神、忠诚、勇敢、克制、大度和仁爱，符合屋大维的政治需要。全诗是颂扬屋大维并为其政策服务的。史诗虽然写罗马的光荣，但作者也不时流露出哀伤情绪。当埃涅阿斯在迦太基看见尤诺神庙上刻着特洛亚的故事时，叹息道：“人间的一切都引我伤心落泪。”诗中比较生动的悲剧人物狄多和图尔努斯，虽是失败者，但作者对他们寄予很大的同情，这就使史诗带上了淡淡的哀伤情绪，使人感到作者对“罗马和平”、帝国光荣能否维持抱有一定的怀疑。

在艺术手法上，维吉尔有意摹仿荷马史诗，在情节安排上和形象比喻上也摹仿荷马，但他又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成就。荷马史诗是口头文学，歌颂战争，塑造了英雄个性鲜明，乐观直率，勇武凶猛。其风格单纯质朴，自然轻快。维吉尔的史诗则是文人文学，否定战争，歌颂罗马祖先的建国业

绩，表彰屋大维的功勋，证明“君权神授”。主人公缺乏个性，忧郁、公正、虔诚、仁慈，具有坚韧的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成了屋大维的化身。其风格严肃而又哀婉，华丽精致，有些夸张。同是大将，荷马笔下的阿喀琉斯为了争夺一个女俘的私事而放弃责任，埃涅阿斯却克制了自己对狄多的感情，服从使命。维吉尔还长于运用幻景、梦境、预言、暗示、讽喻等手法，来塑造人物和抒发感情，如地府遇到亡魂的情节，就非常典型。在描写技巧上维吉尔不善写战争，而长于爱情心理刻画，如狄多的爱情悲剧，既肯定了埃涅阿斯远行的必要性，又写出了狄多殉情的细腻心理过程，这是荷马史诗所缺乏的。

维吉尔一直享有盛誉。中世纪时，他是少数未被基督教会排斥的古代作家之一。但丁很崇敬他，认为他最有智慧，最了解人类，在《神曲》中让他作为地狱和炼狱的向导。维吉尔的史诗倍受后人推崇，成为后来史诗的典范，对后世欧洲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贺拉斯

贺拉斯（公元前65—前8年）。是古罗马著名的讽刺诗人、抒情诗人和文艺理论家。出身于意大利南部韦努西亚城一个获释奴隶的家庭。他的父亲当税务员，略具资财，送他去罗马接受贵族教育。其后，又到雅典深造。内战时期曾参加共和派军队，任军团司令。公元前42年，共和派军队被屋大维和安东尼击败，贺拉斯弃盾而逃，家产被没收。他后来遇大赦回到罗马，谋得一个文学职位。在失意中，他开始写诗，引起了维吉尔和瓦里乌斯的注意，经他们介绍，贺拉斯于公元前39年加入麦凯纳斯文学集团。他的思想倾向也从共和派转为拥护“奥古斯都”屋大维的元首制，得到了奥古斯都的赏识。公元前19年，维吉尔去世后，他成为古罗马最享盛誉的诗人。他的早期作品有《讽刺诗集》和《长短句集》。他的重要作品是《歌集》和《诗简》。

贺拉斯的早期作品《讽刺诗集》（又称《闲谈集》）2卷18首，《长短句集》1卷17首。其中最早的诗歌表现了共和派的倾向，但不久就转为歌颂屋大维。他和维吉尔一样，反对内战，要求宁静和平的生活。他的根本思想是亚里士多德的中庸、小康和伊壁鸠鲁的享乐主义，反映了奴隶主中的小土地所有者的理想。他在这些早期作品里主要讽刺罗马社会的风俗，如暴发户的炫耀，寄生阶层的追逐遗产和金钱，社会的淫靡，投机讹诈、生活腐朽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但缺乏足够的政治热情和尖锐性。

《歌集》又称《颂歌集》，是贺拉斯的成名之作，4卷100多首诗，主要是抒情诗。这些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有爱国主义的颂歌，有对奥古斯都的赞扬，赞美统治者新提倡的道德，如淳朴、坚毅、正直、尚武、虔诚等。宣扬奴隶主的爱国精神，赞颂屋大维。这一类的代表作是《世纪之歌》，那是典型的庙堂文学，为适应屋大维的需要而写的。但更多的是写爱情与友谊，写恬静的田园，宣扬一种知足常乐的思想。他成功地把希腊抒情诗的多种格律运用于拉丁语的诗歌创作，创立了自己富有特色的抒情诗歌，节奏、音韵都很完美。他的抒情诗的特点是议论胜过激情，气魄大，意境深，如《纪念碑》：

我建造了一座纪念碑，它比青铜
更坚牢，比王家的金字塔更巍峨，

无论是风雨的侵蚀，北风的肆虐，
或是光阴的不尽流逝，岁月的
滚滚轮回都不能把它摧毁。
我不会完全死去，我的许多部分
将会逃脱死亡的浩劫而继续存在，
人们的称誉使我永远充满生机，
只要卡皮托利的祭司和贞尼
仍去献祭。我将会一直被人怀念，
在狂暴的奥菲杜斯河喧闹的地方，
在惜水的道努斯统治的乡人中间。
出身低微的我首先给意大利音韵，
引来伊奥尼亚格律，诗歌女神啊，
请接受由你襄助而得来的这一荣誉，
慈祥地给我戴上得尔福月桂花冠。

这首诗的立意曾被许多欧洲诗人摹仿。作者对罗马抒情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贺拉斯的《诗简》共两卷，内容驳杂。第1卷的中心内容是谈论生活哲理；第2卷以文学评论为主，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是写给皮索父子3人的信，通称《诗艺》。

《诗艺》原是一封诗体信简，无题，发表不及百年，即被罗马修辞学家、演说家昆提利安称之为《诗艺》，其后遂以此名著称。

《诗艺》分三部分，首先讲作诗的一般原则，其次讲诗歌的形式和技巧，最后讲诗人的修养和任务。他根据自己以及同时代作家（如维吉尔）的创作实践，吸收亚里士多德和“希腊化”时期的文艺理论，对写诗的艺术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和规律。他说：

“一首诗仅仅具有美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魅力，必须能按作者愿望左右读者的心灵。你自己先要笑，才能引起别人脸上的笑，同样，你自己得哭，才能在别人脸上引起哭的反应。你要我哭，首先你自己得感觉悲痛，这样，忒勒福斯啊，珀琉斯啊，你的不幸才能使我伤心，如果你说的话不称，你只能使我瞌睡，使我发笑。忧愁的面容要用悲哀的词句配合，盛怒要配威吓的词句，戏谑配嬉笑，庄重词句配严肃的表情。”

在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上，贺拉斯继承亚里士多德的传统，重申文学应该模仿自然的现实主义观点。他主张以古希腊悲剧为典范，借用其中的题材，但在细节上面要有创新。他说：

“用自己独特的办法处理普通题材是件难事；你与其别出心裁写些人所不知、人所不曾用过的题材，不如把特洛亚的诗篇改编成戏剧。从公共的产业里，你是可以得到私人的权益的，只要你不沿着众人走俗了的道路前进，不把精力花在逐字逐句的死搬硬译上，不在模仿的时候作茧自缚，既怕人耻

卡皮托利山岗是古罗马七山岗之一，古罗马城始建于此，这里后来成为罗马国家的政治、经济、宗教活动中心。

奥菲杜斯河是意大利南部一条河流。

此处是指贺拉斯故乡的人民。

《诗艺》引文均据杨周翰译《贺拉斯·诗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笑又怕犯了写作规则，不敢越出雷池一步。”

他认为诗人应该熟悉生活，劝诗人到生活和风俗习惯中寻找模型，从中汲取活生生的语言。他说：

“要写作成功，判断力是开端和源泉。苏格拉底的文章能够给你提供材料；有了材料，文字也就毫不勉强地跟随而至。如果一个人懂得他对于他的国家和朋友的责任是什么，懂得怎样去爱父兄、爱宾客，懂得元老和法官的职务是什么，派往战场的将领的作用是什么，那么他一定也懂得怎样把这些人物写得合情合理。我劝告已经懂得写什么的作家到生活中、到风俗习惯中寻找模型，从那里汲取活生生的语言吧。时常，一出戏因为有许多光辉的思想，人物刻画又非常恰当，纵使它没有什么魅力，没有力量，没有技巧，但是比起内容贫乏、（在语言上）徒然响亮而毫无意义的诗作，更能使观众喜爱，更能使他们流连忘返。”

在文艺的社会功能方面，贺拉斯提出“寓教于乐”的原则。他肯定诗人能给人以教育和智慧，指出诗人的愿望在于给人益处或乐趣，或既给人以快感，又对生活有帮助。他说：

“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在你教育人的时候，话要说得简短，使听的人容易接受，容易牢固地记在心里。一个人的心里记得太多，多余的东西必然溢出。虚构的目的在于引人欢喜，因此必须切近真实；戏剧不可随意虚构，观众才能相信，你不能从饱餐一顿之后的拉米亚肚皮里取出一个活生生的婴儿来。如果是一出毫无益处的戏剧，长老的‘百人团’就会把它驱下舞台；如果这出戏过于严肃，高傲的青年骑士便会掉头不顾。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这样的作品才能使索修斯兄弟赚钱，才能使作者扬名海外，留芳千古。”

在形式上，贺拉斯主张保持传统，当然他也不反对独创。他认为：

“或则遵循传统，或则独创；但所创造的东西是自相一致。譬如说你是个作家，你想在舞台上再现阿喀琉斯受尊崇的故事，你必须把他写得急躁、暴戾、无情，写他拒绝受法律的约束，写他处处要求诉诸武力。写美狄亚要写得凶狠、慍悍；写伊诺要写她哭哭啼啼；写伊克西翁要写他不守信义；写伊娥要写她流浪；写俄瑞斯忒斯要写他忧郁。假如你把新的题材搬上舞台，假如你敢于创造新的人物，那么必须注意从头到尾要一致，不可自相矛盾。”

贺拉斯认为诗的内容值得推敲，比如在舞台上演出，有些不该让观众看的内容就不要演出，如：

不必让美狄亚当着观众屠杀自己的孩子，不必让罪恶的阿特柔斯公开地煮人肉吃，不必把普洛克涅当众变成一只鸟，也不必把卡德摩斯当众变成一条蛇。你若把这些都表演给我看，我也不会相信，反而使我厌恶。无论如何要使观众相信内容，即使是虚构的，也要接近事实。贺拉斯强调，把形式和内容配合起来，取得良好的效果，才能达到得体性。

贺拉斯重视戏剧布局，认为结局应是情节的自然发展，而不是请出神来解决剧尾的纠纷。他强调性格、语言要切合人的年龄、性别和身份。他认为布局、风格描写、韵律等都要适当。他说：

“如果你希望你的戏叫座，观众看了还要求再演，那么你的戏最好是分五幕，不多也不少。不要随便把神请下来，除非遇到难解难分的关头非请神来解救不可。也不要企图让第四个演员说话。

“歌唱队应该承担它作为一个演员的作用和重要职责。它在幕与幕之间所唱的诗歌必须能够推动情节，并和情节配合得恰到好处。它必须赞助善良，给以友好的劝告；纠正暴怒，爱护不敢犯罪的人。它应该赞美简朴的饮食，赞美有益的正义和法律，赞美敞开大门的闲适（生活）。它应该保守信托给它的秘密，请求并祷告天神，让不幸的人重获幸运，让骄傲的人失去幸运。”

贺拉斯要求诗人遵从古典，勤学苦练。写出优秀的作品的人是天才、还是苦学出来的呢？他认为：

“有人问：写一首好诗，是靠天才呢，还是靠技艺功夫？我的看法是：苦学而没有丰富的天才，有天才而没有训练，都归无用；两者应该相互为用，相互结合。在竞技场上想要夺得渴望已久的锦标的人，在幼年时候一定吃过很多苦，经过长期练习，出过汗，受过冻，并且戒酒戒色。在阿波罗节目的音乐竞赛会上的吹箫人，在这以前也经过学习，受过师傅的斥责。今天他可以说：我写出了惊人的诗篇；让落在后面的人心痒难搔吧；我不屑于落在别人后面，我也不愿承认我没有学过，所以我确实不知道。”

贺拉斯是罗马最重要的文艺理论家。他针对当时诗坛上的不良作风和作品的萎靡空洞提出补救办法，但未能奏效。然而《诗艺》对后世欧洲文艺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理论都被文艺复兴、古典主义时期的作家视为经典，作为写诗的准绳，但往往被人误解，成为僵化的教条，限制了诗人的创作。

继贺拉斯的《诗艺》后，罗马文学中一篇比较重要的文艺理论作品是《论崇高》，也是用书信体写的，用希腊文写成。作者相传是公元1世纪的朗吉努斯。作者提出：崇高的风格主要决定于庄严、伟大的思想和强烈、激荡的感情，然后借助技巧，才能产生伟大作品。那些认为财富、名誉、权势是幸福的人不可能有伟大的灵魂，产生伟大的作品。作家若只是注意修辞就等于诡辩或存心欺骗。他认为当代文学所以败坏，是因为作者内心被情欲所支配。论文还强调作品应为更广大读者接受，表明作者顺应民主潮流的文艺观点。

（3）奥维德

奥维德（公元前43—公元18年），是奥古斯都时期最后一位大诗人。他出身于富有的骑士家庭，早年在罗马受教育，后又去雅典深造。他在政府部门担任过一些低级职务，早就与奥古斯都接近，属于麦凯纳斯文学集团。

奥维德早期主要写爱情诗，作品有《爱情诗》3卷，包括哀歌体诗49首，设想多种情景，追求爱情，以享乐主义为主导思想。有《古代名媛》21首，用哀歌体写的诗，大半是作者设想古代传说中的女子如珀涅罗珀、狄多写给丈夫或情人的书信，表示离恨或责备对方无情。人物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戏剧性，但无真情实感。这些作品在中古和文艺复兴时期都很有影响；还有《爱的艺术》3卷，也是用哀歌体写的，把求爱写成一种学问，反映出罗马奴隶主精神上的堕落颓废。这些诗内容轻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奴隶主阶级的荒淫生活。由于这些诗违背了屋大维“重整道德”的政策，他于公元8年被流放到黑海之滨，客死他乡。在放逐前，奥维德写了《岁时记》，属教谕诗一类。作者的目的在于肯定并歌颂罗马的各种制度。它按时间顺序叙述罗马宗教节日以及有关的传说、历史事件和祭祀仪式、民间风俗等，只完成一半，因流放而中断。它对了解罗马风习有一定参考价值。他在流放期间又写了《哀怨集》5卷、《黑海书简》4封。诗中备述流放之苦，充满着忧郁、

哀伤的情绪。

奥维德的代表作是神话故事诗《变形记》，共 15 卷，包括 250 个长短不一的神话故事，从开天辟地写到罗马奥古斯都政体的建立，按时间顺序系统地整理罗马、希腊的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全书结构安排主要为序诗、引子（包括天地开辟、四大时代、洪水的传说）、神话故事（1—6 卷）、男女英雄的故事（7—11 卷）、历史人物的故事（12—15）、尾声。诗人使用故事套故事的写法，造成全书环环相扣、彼此呼应的效果。每个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点——变形。人物最后或成为鸟兽，或变作花草植物，或作顽石天星。从这里可以看出诗人受了“一切都在变易中”（卢克莱修）的哲学观念的影响。

他借助丰富的想象力，运用高度的艺术技巧，特别注意人物的心理描写，把传世的许多神话传说描写得生动有趣，使这些尽人皆知的故事获得了新的生命。全书以凯撒遇刺变为星辰、屋大维建立统治结束。最后，奥维德写道：

“我的作品完成了。任凭尤皮特的怒气，任凭刀、火，任凭时光的蚕蚀，都不能毁灭我的作品。时光只能销毁我的肉身，死期愿意来就请它来吧，来终结我这飘摇的寿命。但是我的精萃部分却是不朽的，它将与日月同寿，我的声名也将永不磨灭。罗马的势力征服到哪里，那里我的作品就会被人们诵读。如果诗人的预言不爽，我的声名必将千载流传。”

《变形记》是一部希腊、罗马神话的总集。作者通过这些生动多变的故事，曲折地反映了罗马的现实生活，歌颂了罗马帝国的历史，揭露了罗马贵族的荒淫腐朽、专横任性、道德败坏，赞美了忠贞不渝的人间爱情，生动地表达了古代人民的美好幻想。

《变形记》想象丰富，形象生动，语言优美，风格精致。它为后代的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材料，但丁、乔叟、莎士比亚、莫里哀、歌德等伟大作家都很推崇这部作品并受过它的影响。

三、古希伯来文学

1. 古希伯来文学的生成

古希伯来人在公元前 3 千纪时游牧于幼发拉底河流域的草原，公元前 2 千纪中叶侵入迦南，就是后来称为巴勒斯坦的地区。当时的迦南人把入侵者叫做“希伯来”人，意思是“从河那边来的人”（“河”指幼发拉底河）。

迦南是地中海东岸的一个狭小地区，它夹在埃及、巴比伦、亚述、波斯等大国之间，是军事上的要地，也是商业上的交通要道。公元前 3 千纪时，迦南人已定居从事农业，也有了城市，并在周围各文化古国的影响下创造了自己的“迦南”文化，在公元前 18 世纪达到全盛时期。公元前 16 世纪后期，埃及新王国向亚洲进军，迦南陷入向埃及纳贡的从属地位，后来经过埃及军队的全面占领，便开始衰落了。到公元前 15 至前 14 世纪埃及军撤退时，游牧的希伯来人乘机入侵。他们在长期斗争中战胜了迦南人，同时也接受了迦南人的影响，转入定居的农业生活，并且创造了自己的希伯来文字。希伯来人分为两大部落联盟，以色列部落联盟住在北方，犹太部落联盟住在南方。他们夺取了迦南人的土地，分给了部落内的各家族，还把一些迦南人变成了奴隶。希伯来人内部也在分化。那时部落联盟的领袖叫“士师”，当时正处于国家形成的前夕。

到公元前 12 世纪时，海上民族非利士人入侵迦南的沿海地区，并占据了几个设防城市，还把迦南改名为“巴勒斯坦”，意思是“非利士人的土地”。希伯来人同非利士人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在战争中创造了不少英雄业绩，产生了一系列史诗式的英雄人物。这不仅构成了希伯来文学的重要题材，同时也促进了以色列犹太统一国家的形成。

公元前 11 世纪末，以色列——犹太王国建立，扫罗（公元前 1028——前 1013 年）被推选为第一任国王，据说他是以色列部落中抽签选出来的。扫罗虽然打了一系列胜仗，但未能完成驱逐非利士人的任务就死于战场。南方犹太部落出身的大卫利用扫罗死后的国内混乱局势，利用以色列和犹太部落贵族中不满分子的合作而登上了王位（公元前 1013—前 793 年），建都于迦南人的古都耶路撒冷。这座著名的古城位于犹太部落的境内，是耸立于高山上的天然堡垒。在大卫的统率下，希伯来人战胜了非利士人，国势日趋强盛。大卫还控制了从腓尼基到埃及的商队大道，促使商业发展。王国的奴隶制度大大发展，经济得以繁荣，文学艺术也兴盛起来。

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统治时期（公元前 973—前 933 年），是王国的鼎盛时期，也是希伯来文学开始发展的时期。所罗门在大卫政绩的基础上，使国家进一步繁荣富强起来。“所罗门的荣华”、“所罗门的智慧”成了世界性的成语。所罗门对外用和亲政策，交好四邻；对内则大兴土木，建筑豪华的圣殿、宫室和要塞。所罗门的一代繁华，宫廷贵族的奢侈豪华生活，是建立在对人民群众的剥削之上的。他们对北方以色列族的剥削更加残酷，引起了以色列人的强烈不满，酿成了以色列族的耶罗波安为首的起义，但起义一开始就被所罗门镇压下去了，耶罗波安逃亡埃及。所罗门死后，王子罗波安继位。不久，以耶罗波安为首的起义又爆发了。因有埃及法老示撒的帮助，起义取得了胜利，以色列人独立，建都撒玛利亚。公元前 922 年，统一的以色列王国分裂成南北对峙的两国。长期的内战，互相残杀，导致了双方力量的

削弱和国势衰微。

以色列和犹太分裂后，南方的犹太王国一直在大卫的后代的统治之下。北方的以色列王国则频繁更换王朝。公元前 875 年暗利王朝建立，这是以色列王国的繁荣时代，统治达半个世纪之久。这个时期奴隶制度更加发展了，剥削也更加残酷了，东方兴起的亚述帝国又不时入侵，引起了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这时，有一些下层的贫苦祭司在平民间活动，他们假托耶和华神的启示，指斥富人对穷人的剥削和奴役，预言国家将受到惩罚。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先知。这种反映了阶级矛盾的斗争的运动，史称“先知运动”。公元前 722 年，亚述王萨尔贡二世攻陷首都撒玛利亚，并虏其国王以及臣民 27000 人去美索布达米亚、迁移巴比伦等地的人去占住撒玛利亚，以色列王国灭亡。

亚述灭了以色列王国后，犹太处境岌岌可危，可犹太国内的阶级矛盾仍然很尖锐。公元前 7 世纪，一个犹太王镇压人民，许多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他的儿子继续作恶，结果他的臣仆背叛，在宫里杀了他。新王约西亚（公元前 637—前 608 年）被迫实行改革，修整法律以缓和阶级矛盾，并开始形成犹太教的法规，强调爱国主义思想，但是依然抵挡不了强邻新巴比伦王国的进攻。公元前 586 年，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军队攻陷耶路撒冷并付之一炬，灭亡犹太，并把王公贵族、军队、手工业者、建筑师和男女歌手等 5 万多人虏到巴比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巴比伦之囚”。

希伯来人各部落原来信奉多神，但是也有一个共同的主神耶和华。国家形成以后，耶和华神崇拜得到广泛的宣扬。犹太人在做巴比伦的俘虏期间，不堪忍受侮辱和虐待，逐渐在一部分人中产生了希望耶和华派遣一个“救世主”来拯救他们的宗教观念。他们通过秘密传播，鼓动建立重返故土的信心。一个名叫摩西的先知还做出了复国建都的详细方案，在俘虏中传播信奉一神耶和华和犹太将在耶和华神权下复兴的说教。于是，从这种信仰中逐渐产生了“犹太教”的萌芽。公元前 538 年，波斯王居鲁士战胜并统治了巴比伦，决定恢复耶路撒冷，作为征服埃及的据点，把被囚在巴比伦的犹太人一批批地放回去重建都城，成立傀儡政权。犹太人被释放回耶路撒冷后，形成了一种一神教的神权统治，犹太教逐渐形成了。

公元前 332 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东侵，击败了波斯，占领了西亚广大地区。不久，亚历山大病死，国土被三分鼎立。西亚地区大部由塞琉古王朝所统治。犹太人不堪残酷的压迫，发动起义，于公元前 142 年成立了马卡比王朝。但这恢复的犹太国只昙花一现，不久又被征服。公元前 64 年，罗马的庞培东侵，将犹太夷为属国。公元后，犹太人不堪罗马奴隶主的压迫，起义反抗达 7 年之久，终于被残酷镇压，重建的京城和圣殿又被毁坏。古希伯来人被迫远离家乡，流落到世界各地。古希伯来民族的历史也从此结束。这些散落在各国的犹太人在语言上已同化于各寄居国，但是他们一般却保留着犹太教的信仰，直到现在。

“巴比伦之囚”以后的 5 百年，是希伯来文化史上的重要时期。希伯来人在这一时期不仅完成了一神论的犹太教的教义和教规，还为了宣传耶和华，通过整理希伯来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编纂了犹太教的经典——《旧约》。《旧约》集中地体现了希伯来文学的重大成就，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2. 《旧约》文学的成就

《旧约》不仅是一部宗教书，也是希伯来民族文化遗产的总汇和希伯来文学总集，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旧约》于公元前 5 世纪开始编纂，直到公元 1 世纪时完成。这份希伯来的文学遗产，被后来的基督教徒所接受，编入他们的“圣经”，称为《旧约全书》，以区别公元前后基督教徒写的《新约全书》。

《旧约》全书原为 24 卷，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后译成希腊文时，正经被分为 39 卷。它包括不同时期和不同人写作的文献和作品，形式多种多样，反映了古代希伯来人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其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都是很高的。一般研究者按其内容和体例，把它分为法典、先知书、杂著三大部分。

法典，又称“摩西五经”。包括《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5 卷。这一部分成书最早，公元前 444 年就被确定的圣经，内容多为古代希伯来的神话和传说。

先知书，包括历史书和先知书。希伯来人把历史书称为早期先知书，计有《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共 10 卷。这部分成书在公元前 3 世纪左右，是犹太民族建国和亡国的史记。先知书计有《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阿摩司书》、《哈巴古书》等 15 卷。它成书于公元前 3 世纪至公元前 8 年，是先知先觉的社会改革家和思想家唤起民众的作品。其中的英雄故事神奇感人。

杂著即诗文集，包括抒情诗集《诗篇》、《雅歌》，哲学诗集《箴言》、《传道书》，大哲学诗剧《约伯记》和小说《路得记》、《约拿书》、《以斯帖记》、《但以理书》等。它成书在公元前 4 世纪至公元前 1 世纪之间，是《旧约》中的文学作品部分，也是世界文学遗产中的珍品。

（1）神话传说

《创世记》是希伯来神话传说的主要汇集，其中有许多神话传说十分优美动人，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喜爱。

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类的故事中讲到：在耶和華神造天地的日子里，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華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起，滋润遍地。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进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華在东方的伊甸建有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華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悦人的心目，树上的果子用作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辨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耶和華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让他修理看守。耶和華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哪一天你吃了必定死。耶和華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便取下他的一条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耶和華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里的一切生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你们吃了那棵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眼睛就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你们不一定死。女人知道果子能使人有智慧，便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

他丈夫吃了。他们二人眼睛亮了，才知道自己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耶和华知道后诅咒蛇用肚子行走，终生吃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增加你怀孕的痛苦，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必终身劳动，才能从地里得到吃的。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归土为止，因为你是从土里生出来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亚当给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又伸手摘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活着了。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自己的土地。神把他赶出去了，在伊甸园的东边设下神丁和一把四面发火的剑，把守生命树。

这篇优美动人的神话，反映了古代希伯来人对天地万物的形成和人类起源的朴素认识和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他们敢于追求智慧、勇于分辨善恶的斗争精神。

挪亚造方舟躲避洪水的故事也是《创世记》中很有名的神话传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就后悔在地上造人，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走兽、昆虫、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一代人当中是个完人。挪亚生了3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神对挪亚说：凡是血肉的人，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歌斐木造一只方舟，一间一间地造，里外抹上松香。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有气息的生物。凡有血肉的生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带进方舟，好在你舟中保全生命。你要把各样食物积蓄起来，作你和他们的食物。挪亚就这样按照神的吩咐做了。耶和华要挪亚及其全家带畜类、飞鸟进入方舟，说7天后要在地上降雨。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整600岁。他同妻子、儿子、儿妇及畜类、飞鸟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40昼夜的大雨降在地上，地上的各类生物都消失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生命。浩大的水势，在地上泛滥了150天。到挪亚601岁时，地上的水干了。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了，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耶和华说：“只要地还存在，稼穡、寒暑、冬夏、昼夜，将永不停息。”

挪亚方舟的神话，显示了远古人类遭遇洪水灾害的苦难经历。它既反映了古代人类对洪水的畏惧心理，又反映了他们战胜洪水的强烈愿望和坚强意志。这篇神话，通过挪亚带领全家人与洪水搏斗并取得胜利的动人故事，颂扬了古代人类同大自然英勇斗争的精神和伟大气魄。

希伯来的神话传说想象丰富，幻想美丽，情节动人，至今魅力不衰。

（2）英雄故事

《出埃及记》是一部英雄史诗，叙述传说中的英雄摩西的故事。故事中讲，以色列人的先祖雅格的第11个儿子约瑟，因只知享受被弟兄们卖给过路的埃及商人。约瑟在埃及吃了不少苦，后来做了宰相。约瑟死后，他的子孙繁衍起来，埃及法老深恐以色列势力强大，对他不利，乃残酷压榨、虐待他们。最后，埃及新王下令，以色列人生子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以色列人面临着亡族灭种的厄运。摩西生下后，被偷偷养了3个月，然后他母亲把他装在箱子里，并把箱子搁在河边。正巧法老的女儿到河边洗澡发现了他，便抱去抚养长大。摩西就这样侥幸地活了下来。长大后，他组织并率领受尽奴役之苦的以色列人逃出埃及，又在沙漠地区流徙多年，历尽艰难。当以色列

人被追赶到海边时，由于神的帮助，海水分开，让出一条干路。以色列人走入海中的干地，水在他们左右作了墙垣。埃及人追赶他们，当法老的一切车辆、兵马都跟着下到海中时，海水竟又复回原状，致使埃及人全军覆没。

《出埃及记》情节曲折，叙述生动，撼人肺腑。英雄摩西机智聪颖、意志坚强，是深受人民爱戴的领袖人物。

《撒母耳记》记叙了大卫的英雄事迹。大卫是耶西的儿子，一日去军营看他哥哥时，听说扫罗与非利士人作战，节节失利，他主动要求出战。在战场上，他机智地用弹弓发射石子把非利士人首领哥利亚打得“面伏于地”，又从他的刀鞘中拔出刀来，割下了他的头。大卫的胜利使以色列人扬眉吐气。从此，他成了被人称颂的小英雄。后来他做了以色列的第二任国王，干出了一番事业。大卫的名字在欧洲是家喻户晓的，他是人们理想中的英雄。

《士师记》记载了智勇双全的英雄基甸、耶弗他和参孙的故事，其中参孙的故事最可歌可泣。参孙是耶和華施恩给玛挪亚的妻子生的男孩，自幼力量超人。他的力量来自他头上的 7 绺头发。长大后他做了以色列的士师（部落领袖），战无不胜。后来，非利士人收买了他的情人大利拉，始获知他力大无穷的秘密。参孙被捕后，被挖去双眼，关进大牢。非利士人举行大祭，把参孙提到大厅里任意戏耍，万般侮辱。参孙满怀愤恨，机智地撼倒房柱，使大厅倒塌，压死了所有在场的非利士人，自己也与之同归于尽。

这个故事赋予参孙以神奇、超人的力量，歌颂了参孙英勇顽强、视死如归的精神，表现了希伯来人反抗异族压迫、不甘凌辱的可贵性格。参孙的英雄形象影响十分深远，后曾被一些欧洲作家选为创作题材。

《旧约》里的英雄故事，想象丰富、夸张，人物性格鲜明，形象突出，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3）小说和先知书

《旧约》里收入了在故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说。《路得记》是希伯来文学中最早的一部短篇小说，写于公元前 400 年左右。故事叙述的是，寡妇拿俄米带着两个儿子去摩押逃荒，并在那里娶了摩押族的儿媳。两个儿子死后，她决定回故乡。儿媳路得在死去丈夫之后，与婆婆相依为命。在返回家乡后，路得辛勤劳动，赡养婆母，她的贤德受到了以色列人的敬重。路得与农民波阿斯相爱而结婚，长老们也支持这个异族婚姻。他们相处得非常好。小说热情歌颂了人与人之间友爱相处的美德，不歧视与异族结亲，具有一定的社会进步意义。

《以斯帖记》也是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写两个希伯来人——以斯帖和其堂兄末底改在波斯朝廷中为本民族利益斗争的故事，用以鼓励当时在叙利亚王安条克残酷压迫下的希伯来人矢志忠于本民族，英勇机智地斗争，直至取得胜利。小说的情节生动，不带宗教气味，颇具感人的艺术力量。

《但以理书》是一篇“启示”式的小说，用想象的幻境形象地教育人民要在极端恐怖的时代里坚定胜利的信心。作者借历史上亡国被俘又被放回复国的事件，隐喻当时叙利亚塞琉古王朝统治下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小说的前 6 章写但以理和 3 个朋友被虏到巴比伦时的情况，后 6 章写他所见的幻象，其中有 4 只怪兽从碧绿的海水中翻腾起来，象征 4 个帝国——巴比伦、米提亚、波斯、希腊，必将如海市蜃楼般消失。故事通过天使米迦勒启示人们要坚强地斗争，坚定信心，终必胜利。

先知书是希伯来文学中的一束奇葩。所谓“先知”，是先知先觉的社会改革家和思想家，他们在以色列将要亡国的关头，大声疾呼，奔走呼号，用演说、诵诗唤醒群众，警告压迫者。他们揭露富人的残暴、官吏的腐败和社会风气的堕落，敢说真话，具有不怕牺牲的殉道精神。他们大都有诗人的气质，富于热情的说教，很能鼓动人心。马克思所说的“旧约全书中的语言、热情和幻想”，多半是指先知书而言。在以色列将要亡国时，先知们大都是社会改革家和宣传正义的志士，如劳动人民出身的先知阿摩司，在亡国前 30 年就写出《阿摩司书》，警告以色列的君王和臣民。他目睹社会的不合理，就满腔义愤地大声疾呼：

“以色列人再三犯罪，我一定要处罚他们。他们贪图钱财，出卖老实人，以一双凉鞋的代价把无法还债的穷人卖作奴隶。他们践踏贫民，推开路上的穷人。父子去跟同一个寺庙娼妓睡觉，污辱了我的圣名。他们竟敢在祭坛旁边，用别人抵押给他们的衣服当床单；他们竟敢在上帝的殿宇里，拿剥削穷人的钱买酒喝。”

“你去向那些住在埃及和亚实突王宫里的人宣布：你们要集合在撒马利亚的山上，看看城里所发生那无法无天、欺诈压迫的事。”“那些人在他们的宫里堆满了抢劫和剥削来的财富；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公平交易。因此，敌人将包围他们的城市，破坏他们的防线，洗劫他们的宫殿。”“就像牧羊人只能从狮子的嘴里抢回两条羊腿和一截耳尖，在撒马利亚过奢侈生活的以色列人也只有少数能从灾难中逃脱。听啊！要警告雅各的后代：当我处罚以色列所犯的罪时，我要拆毁伯特利的祭坛；每一座祭坛的四角要给打破，倒在地上。我要拆毁他们避暑别墅和避寒的暖阁。象牙装饰的房屋和豪华的楼房都要倒塌，成为废墟。”

阿摩司在预言中强烈谴责了国王、官吏、宗教祭司的罪恶，揭露了奸商、高利贷者欺诈人民的丑恶面貌，并对美好前景做了展望，表达了对未来的向往和信心，言辞激烈，爱憎分明，对被压迫者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哈巴谷书》的作者是亲眼见犹太人被囚虏的先知。他在书中描写了新巴比伦的骑兵比豹还快，如鹰来抓食。指责他们贪欲无度如阴间那般的黑暗。

（4）希伯来的诗歌

《旧约》文学中成就最高的是诗歌，它包括劳动歌谣、英雄战歌、抒情诗和哲理诗等。

《诗篇》是《旧约》中最大的诗歌集，共收入 150 篇诗歌，多数是无名氏的作品。写作时间上至公元前 11 世纪大卫时代，下至公元前 2 世纪，几乎反映了犹太立国和亡国的全部过程。它的基本主题是赞美耶和华，也有反映“巴比伦之囚”时期的悲歌。如第 137 篇“在巴比伦河边”：

在巴比伦河边
我们坐了下来，
一想起锡安，
便不禁痛苦。
我们把竖琴
挂在那儿的柳树上，
因为那些俘虏了我们的人
要我们唱一支歌；

那些抢劫过我们的人
要我们为他们作乐，
他们说：“给我们来一首锡安歌吧。”
可我们怎能在异邦
把我主的歌诵唱？
啊，耶路撒冷，假如我忘记你，
愿我的右手忘记了技巧；
假如我不记挂着你，
不把你看成我平生最大的快乐，
愿我的舌头永远粘在上膛！
啊，主啊，请记住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里，
伊东人的子孙们曾说：
“毁掉它！毁掉它！
把它彻底毁掉！”
啊，行将遇难的巴比伦女儿啊，
像你待我们一样
酬答你的人有福了！
那把你的孩子
摔在石头上的有福了！

这是一首哀歌。诗人和他的同胞一起凄然地坐在巴比伦河边，流向远方的河水勾起了他对故乡的怀念，亡国之恨油然而生，产生了强烈的复仇愿望。诗中充满了犹太人被俘虏到巴比伦以后的怀念祖国和故乡的深情，表达了坚定的复仇信念。这首诗以哀婉欲绝之情和严酷的复仇之心为特色，给读者留下了难以消蚀的印象。

《底波拉之歌》（《士师记》第五章）是最有名的一首英雄战歌，它为颂扬以色列对迦南军事首领西西拉作战得胜而作。歌中先从正面讴歌了以色列人胜利后的欢快心情和高昂的战斗热情，其中写道：

在亚拿之子珊迦所在的时候，
在雅亿所在的时候，
大道无人敢走，
过客只能绕小道而行。
居民们都聚集起来，
都停止在以色列，
直到我底波拉兴起，
直到我成为以色列之母。
以色列人选择了新神，
战事就临到城门。
那时以色列四万人中，
何曾见什么刀枪剑盾？
我一颗心儿向着以色列首领，
他们情愿当众牺牲。
啊，幸福归于我主。

接着，写血淋淋的战争场面，其中写道：
君王们都来参战，

在米吉多河旁的它纳。
迦南诸王也兴起干戈，
但却未掳掠到银钱。
他们在天上争斗，
星宿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向亚西拉宣战。
基顺河把他们冲走，
基顺河啊，古老的河！
啊，我的灵魂，你压倒了我的力量。

诗中撷取了雅亿与西西拉周旋，最后打死西西拉这一个场景，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

愿基尼人希百的妻子雅亿
比一切女人更受祝福，
比帐篷中的女人更蒙福祉。
西西拉求水，雅亿给他牛奶，
用宝贵的盘子，盛给他奶油。
雅亿左手去拿钉子，
右手去拿匠人的锤子，
她击打西西拉，
打伤他的头，
把他的鬓角打破穿通。
西西拉在她脚前曲身仆倒，
在她脚前曲身倒卧。
在那里曲身，在那里死去。

最后，笔锋一转，由血淋淋的战争转向静谧舒适的宫廷。歌中写道：

西西拉的母亲从窗户里往外观看，
从窗棂中呼叫说：
他的战车为何久久不来？
他的车轮为何走的这样慢？
聪明的宫女回答了她。
她也自言自语地重复着答话：
他们莫非在分战利品？
每个男子得了一两个女子？
而西西拉的战利品五颜六色，
五颜六色的绣花彩衣；
这彩衣两面绣花，乃是披在
被掳之人颈项上的。

西西拉的母亲在殷切盼望儿子得胜归来，同时掠回女子和绣花彩衣。这里，以幽默的口吻嘲讽了敌人。结束句写出“耶和華啊，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旭日东升，光辉烈烈！”

《底波拉之歌》奔腾突跃，生动形象，是英雄战歌的典范。

《耶利米哀歌》是《旧约》中最动人的篇章。耶利米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他生逢耶路撒冷被毁的悲剧时代。他出生于一个乡村祭司家庭，热情善感，

年轻时就出来做正义的呼吁，常因直说统治者的邪恶，并预言将亡国，祖国必将遭受强邻的蹂躏而被逮捕，关禁在地牢或警卫队的院子里。每次国家的危机加紧时，他总是大声呼吁、警告，总是被捕、关禁，直到国家最后灭亡。

诗人痛感犹太亡国之悲，用彩笔写下了《哀歌》5首，用以寄托爱国的思想感情。其中写道：

从前人烟稠密的城市，
现在孤零零地躺在那里；
从前为世界所尊崇，
现在像寡妇一样寂寞。
从前是诸省之后，
现在沦落成为奴婢。

她整夜痛哭，泪流满面。
从前知己的朋友们，
现在没有一个来安慰她。
她的盟友都出卖她，
都成为她的仇敌！
犹太人民是可怜的奴隶，
被逼离开了家乡。
他们流浪异域，
没有安居的土地。
他们四面受敌，
没有逃避的出路。

通过锡安的街道凄凉；
没有人上去过节。
圣殿歌唱的女子悲伤；
祭司们只有哀叹。
城门冷落；
锡安悲愁！

她的敌人成为主人：
他们的权力支配她。
因为她罪恶多端，
上主使她受苦；
她的儿女被敌人掳到远方去。
耶路撒冷的光荣已成陈迹。
她的领袖像鹿一般，
因饥饿而衰弱；
他们逃避猎人的追赶，
耗尽了精力。

耶路撒冷凄凉荒废，
追忆着往昔的荣华！

她落在敌人手里的时候，
没有人可援助她。
征服她的人看着她，
讥笑她的沦陷。

她的荣华丧尽；
她赤身露体，
受人轻藐。
她只有叹息，
在羞辱中不敢露面。
耶路撒冷罪大恶极，
一身肮脏。

.....

《耶利米哀歌》描写了耶路撒冷陷落之后犹太人国破家亡的悲惨状况，表现出诗人深切的哀痛与愁苦，切齿的仇恨与愤怒，深刻的自省、自咎以及祈愿故国复兴的感情，爱憎强烈，哀怨感人，有力地表达了苦难的犹太人的心声。《哀歌》是希伯来民族的绝唱。后来，他们每逢国耻纪念的集会，必定朗诵歌唱《耶利米哀歌》。他们虽然飘泊于世界各地，《哀歌》所表现的精神纽带依然存在。《哀歌》以后虽然产生过不少诗歌，但作为民族喉舌的歌声，就没有更雄大的了。《哀歌》也是希伯来诗歌发展到最高峰的标志。

《雅歌》在《旧约》中被称为“所罗门之歌”，是古代世界文学中最优美动人的民间情歌集之一。

关于《雅歌》的诗体问题，二千年来众说纷纭。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说这是一部诗剧，认为它是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第二种观点说这是一部抒情体的牧歌，本世纪美国摩尔登在《圣经的文学研究》中就是这样分析的；第三种观点说这是一部民间情歌汇集，德国浪漫派诗人海德尔在1778年就提出这一主张。

这几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若把《雅歌》拆散开来，其中的情歌多数是可以独立成诗的。但它有人物，有故事，有统一的主题和情调，甚至隐约中也可以揣摩出完整的故事。但它的情节关联又很松散，其中的人物身份并不是十分明确的。由此看来，《雅歌》原先可能不是一时一人所作，而是民间口头创作，由许多短小的诗歌组合，经过祭司系统的编纂整理，加工而成。所以，阅读《雅歌》的重点不在它的故事性，而应放在它的意境、渲染和表现手法上。

《雅歌》对青年男女之间热恋的描写，表现得那样朴实而优雅：

我的佳偶在女子中，
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
我的良人在男子中，
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
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
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
它带我走进筵宴所，

在我头上展开爱的旗子。
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
给我苹果畅快我心，
因我思爱成病。
他的左手在我头下，
他的右手将我抱住。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
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
不要惊动，
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
等他自己喜欢。

《雅歌》不仅没有宗教意味，而且有些诗句与禁欲说相悖。青年男女在表达爱情时不受任何约束，大胆直率：

我夜间躺卧在床上，
寻找我心所爱的；
我寻找他，
却寻不见。
我说，我要起来，
游行城中，
在街上，在大道边，
寻找我心所爱的。
我寻找他，
却寻不见。
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
我问他们：
“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
我刚离开他们，
就遇见我心所爱的。
我拉住他，
不容他走，
领他入我母家，
进了我母的内室。

这里描写了女子如痴如醉、不顾一切的爱，表现出焦虑、哀怨、缠绵、缱绻等万种情思。《雅歌》与中国的《诗经》和古乐府中的恋歌比较，来得更坦率明朗，感情狂热奔放，自然优美。

《雅歌》的意境渲染有独到之处，如写所罗门行进的队伍：

那从旷野上来，
形状如烟柱，
以没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
是什么呢？
看哪，是所罗门的轿；
四围有六十个勇士，

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
手都持刀，
善于战争，
腰间佩刀，
防备夜间有惊。
所罗门王用黎巴嫩木，
为自己制造一乘华轿。
轿柱是用银作的，
轿底是用金作的，
坐垫是紫色的，
其中铺的乃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
锡安的女子啊，你们出去，
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
那是他婚筵的日子，
心中喜乐的时候，
他母亲给他戴上的。

这里刻意渲染了行进在旷野中，形状如烟柱的所罗门的队伍的场景意念，掩卷之余，难以忘记。

《雅歌》成功地使用物喻作为象征来抒发情感，使纯真的爱情和大自然交融在一起，飘溢着清新自然的生活气息，如描写女子的美丽：

我的佳偶，
你甚美丽！你甚美丽！
你的眼在卷发下好像鸽子眼。
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
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刚刚洗净，
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丧子的。
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
你的嘴也秀美。
你的太阳掩在发内如同石榴。
你的颈项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
其上悬挂一千盾牌，都是勇士的藤牌。
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只小鹿，
就是母鹿双生的。

……
我新妇，你的嘴唇滴蜜，
好像蜂房滴蜜；
你的舌下有蜜有奶。
你衣服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
我妹子，我新妇，
你是关锁的园，
禁闭的井，
封闭的泉源。

《雅歌》中的物喻具有希伯来人独特的民族特点。希伯来人原是游牧部落，后来移居迦南。迦南是“流奶滴蜜”之地，盛产葡萄、石榴、枣子、无花果

等多种水果。因而《雅歌》用来作喻体的形象事物如奶、蜂蜜、小鹿、山羊、石榴等，自然与希伯来民族的文化环境、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体现希伯来人的审美心理定势。

《雅歌》以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真实地表现了成年男女之间爱情的痛苦与欢乐，诗中写道：

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
看哪，他躡山越岭而来。
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
他站在我们墙壁后，
从窗户往里观看，
从窗棂往里窥探。

……

我心睡卧，
我心却醒，
这是我良人的声音。
他敲门说：
我的妹子，
我的佳偶，
我的鸽子，
我的十全人，
求你给我开门。
因我的头满是露水，
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
我回答说：
我脱了衣裳，
怎能再穿上呢？
我洗了脚，
怎能再玷污呢？
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
我便因他动了心。
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
我的两手摘下没药，
我的指头有没药汁滴在门闩上。
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
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
他说话的时候，
我神不守舍，
我寻找他，竟寻不见，
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
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
打了我，伤了我，
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
我嘱咐你们，

若遇见我的良人，
告诉他，
我因爱成病了。

《雅歌》高度赞扬了纯洁和坚贞的爱情，如：

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
带在你臂上如戳记；
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
嫉恨如阴间之残忍。
所发的电光，
是火焰的电光，
是耶和华的烈焰。
爱情，
众水不能熄灭，
大水也不能淹没，
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
就全被藐视。

《雅歌》没有任何宗教气味，感情质朴、健康，清新自然。心理描写细致入微，比喻形象贴切，意境渲染独到，是《圣经》中一枝清新自然的奇葩。它的卓越的艺术技巧，曾使后世不少诗人、作家称颂和赞叹。它是《旧约》中最晚出的一卷，却是古希伯来民族留给世界人民的一束最鲜艳的花枝。

《箴言》是“智慧文学”最好的一卷，为哲理体的“集中之集”，收入的都是犹太人的谚语和格言。如

“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
与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

“吃素菜彼此相爱，
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

“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
宽恕人的过失是自己的荣耀。”

“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
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

“手懒的，要受贫穷；
手勤的，却要富足。”

“妇女美貌而无见识，
如同金环带在猪鼻上。”

“宁可住在旷野，
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

《箴言》用精炼的语言概括出对现实社会的体会和认识，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他们有的直接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有的为贫苦大众鸣不平，

有的反对邪恶、残忍，提倡正直、诚实、仁慈，有的则总结生活经验，提出做人的标准等等，反映了劳动人民积极健康的思想感情，语言凝炼，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传道书》也是一本美丽的哲理诗集。那时希伯来人受到马其顿王朝的血腥统治，社会腐化，人心沮丧，影响了作者的人生哲学。全书充满了人世无常、及时行乐的思想。开头就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万事都是虚空！人生一切的劳碌，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少年人哪，你在幼年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心所爱看的。”《传道书》所传的只是低沉消极之道，是颓废的乱世亡国之音。它融戏剧、史诗、抒情诗和散文等诸种文学体裁于一体，以其思想的深刻、意境的幽远和辞章文句的优美彪炳于世界文学史册。

《约伯记》是《旧约》中最宏大的经典性文学作品，大约是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从巴比伦之囚回归重建都址时的作品。它所探讨的问题是好人为什么要受苦？诗剧的引子说明约伯的来历。上帝和撒旦约定，由撒旦去考验约伯，看他是否真正义人，信心是否坚定。于是约伯接连遭到不幸，牛羊成群成群的失去，七子三女都死光，自身又长满恶疮，疼痛难忍。三个朋友来安慰他，却说他一定是犯了天条，罪有应得。约伯知道自己没有罪，受了冤枉，和三个朋友辩论得很激烈。后来一个成年人拿出新见解，说受苦是上帝给人的锻炼，这个说法也不能说服约伯。正在辩论中，风云骤变，上帝在暴风雨中说话，证明约伯是义人，在极端的苦难中怀疑并责难上帝是当然的。

《约伯记》所辩论的问题没有得到最后解决，只证明了约伯是好人。它通过约伯无论在任何苦难袭来时都坚守纯正、笃信上帝的义举，赞颂了人的正直善良的品德，寄托了人民美好的生活理想，同时表现了委曲求全、善恶报应的思想。它把深刻的哲理和浓郁的诗情融于一体，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对后世不少作家的创作产生了影响。

《约伯记》第3章有一首抒情诗——《愿我出生的那天受到诅咒》，为约伯所吟，约伯诅咒道：

愿生下我的那个白昼死去，
愿曾孕育我的那个夜晚消亡。
愿那一天是个阴郁的日子，
愿上帝对它不屑一顾，
愿光明不会投射其上。
愿黑暗和死荫把那个日子玷污，
愿它上面有四合的阴云密布，
愿日蚀给它带来恐惧。
愿那个夜晚被黑暗攫取，
不与一年中的任何一天为伍，
也不属于月份中的任何一日。
啊，愿那是一个寂寞的夜晚，
愿欢乐不与它同驻。
愿那些散发出晨光的人
诅咒这个夜晚，
一如诅咒白昼。

愿那黄昏时的星斗暗淡，
 寻索着光明，却只是徒然，
 愿那日的黎明永不出现。
那个日子没有关上母亲子宫的门户，
 也没有让忧患躲开我的双目。

我为什么不一出娘胎就短命？
 为什么不一出母腹就丧生？
为什么我的双膝让我前行？
 为什么我的口会把奶头吸吮？
否则我早已安然躺下，
 轻入梦乡，
 静静安息，
而陪伴我的将是尘世的君王将相，
 他们曾在地上为自己建造起荒邱；
或是拥金的王子们，
 他们曾用白银堆满了自己的宫室；
要不然就像一个隐藏着的胎儿，
 突然不期而坠，
 如同从未见过光明的婴孩。
在那儿邪恶将停止搅扰，
 困倦者将得到安息；
在那儿被囚者们拥在一起，
 再也听不见压迫者的声音。
高低贵贱都同处一地，
 仆人不再受主人的奴役。

为什么光明会降临患难者的肉身？
 为什么生命会注入心中愁苦的人？
他们渴求那不肯光顾的死亡，
 求死的心更胜过寻觅隐蔽的宝藏。
一旦能寻求到墓地，
 他们就快乐无比。
当一个人看不到一条出路，
 上帝又将他四面困住，
 何以光明要降临在他的肉身？
每日饭前，我总止不住叹息声声，
 我的哀号泉涌不停。
我最怕的事偏让我担戴，
 我最担心的事偏向我走来。
没有安全感啊，我不能休息，
 也不能平静，

而灾患依然向我降临。

这是约伯对自身命运的诅咒。约伯悲切地发问：神为何要把光和生命赐给患难和愁苦之人？他明确地宣称如此痛苦的生不如死，但这些可怜人“渴望那不肯光顾的死亡”，还必须忍受痛苦的煎熬。全诗充溢着一种无法抑制的绝望痛苦之情，足以撼人心魄。因此，这首诗被誉为文学史上最优秀的抒情诗歌之一。

3. 《旧约》文学的影响

古希伯来文化遗产《旧约》反映了希伯来民族的发展和王国兴亡的全部历史。它的文学思潮以宗教为中心，艺术风格简洁、生动、形象。包括《旧约》和《新约》在内的《圣经》和古希腊、罗马文学一样，成为欧洲文学的两大源头之一，享有“唯一的书”与“万书之书”的盛誉。从世界文化史上看，几千年来没有第二部书像它那样分布的那么广，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和贡献那么大。

朱维之先生著文说：创造西方文化的历史条件是两大传统。一个是希腊、罗马的古代传统，而罗马文化是从希腊文化那里继承演变而来的，因此古代传统实际上是希腊传统。另一个是希伯来、基督教的中古传统，而基督教文化是继承希伯来文化并吸收一些希腊影响演变而来的，所以中古传统实际上是希伯来传统。希腊和希伯来传统是哺育西方各国文化的成长之乳。在过去一千多年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欧洲中古各新兴的民族、国家，是在基督教文化传统的哺育下由野蛮进化到文明的。以《旧约》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圣经》在中古欧洲新兴的民族开化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不仅是宗教、文化、哲学、历史、政治等方面的经典，而且还是当时人们日常必须遵循的法律和道德规范。

《旧约》对西方文学艺术影响深广，欧洲中世纪的诗歌、戏剧、小说，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雕塑，大都以《圣经》为主要题材。如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的第一位伟大代表乔托的壁画《犹太之吻》、《逃亡埃及》，马萨乔的壁画《失乐园》，达·芬奇的壁画《最后的晚餐》，米开朗基罗的壁画《创世纪》、雕塑《摩西》、《大卫》，伦勃朗的绘画《扫罗和大卫》等美术作品；海顿的《创世界》，贝多芬的《庄严的弥撒曲》等作品的思想内涵、情节内容都来源于圣经故事。

《圣经》不仅是中古以来艺术作品的土壤，也是西方近代文学发展的源头。许多近现代的著名作家都曾受到《圣经》的启示，写出优秀的作品来。乔叟的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集》多次采用《圣经》的材料；莎士比亚的每一部剧本平均引用《圣经》多达14次；拜伦运用《旧约》中的故事，反其义而行之，创作出卓越的哲理诗剧《该隐》；普希金在其《先知》一诗中借用了《旧约》的故事情节表达了诗人点亮人们心灵之光的愿望；托尔斯泰的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都直接引用《圣经》的语录作扉页的题辞。

《圣经》对于现代各流派的影响同样很大。如美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尼尔的剧本《拉撒路笑了》，美国现代派小说家福克纳的名作《押沙龙，押沙龙！》等等，都成功地运用了《圣经》的材料。直到今天，许多文学艺术作

品仍带有浓厚的圣经色彩。

《圣经》对中国也有一定的影响。“五四”运动前夕，《圣经》中文译本完成，加上深受《圣经》影响的西方文学作品大量翻译成中文，《圣经》的大量典故渐渐进入了中国的新文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如“亚当”、“夏娃”、“乐园”、“圣母”、“天使”、“救世主”等等。茅盾早年的两个短篇小说分别命名为《耶稣之死》和《参孙的复仇》，艾青有一部诗集题名为《新的伊甸》。可见，《圣经》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也很大。《旧约》文学中的珍品，至今仍然受到各国人民、特别是文学爱好者的喜爱。当然，包括《旧约》在内的《圣经》两千年来作为宗教书籍也曾被教会利用毒害过人们的心灵，有着很大的腐蚀作用，但这不是《旧约》文学本身的罪过。

四、中国秦汉文学

1. 秦汉文学的发育

秦汉时期，从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到 220 年曹丕代汉称帝结束，历时 400 余年。秦代是一个短命王朝，整个汉代总的说比较强盛。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灭六国，结束了 200 年七国纷争的局面，第一次在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秦朝的建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国的发展，具有开创之功。这一时期，西方大国罗马正处于罗马共和国时期，开始进行大规模的领土扩张。

秦朝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加强统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推行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改革。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建立全新的职官体制，对维护国家统一起了重要作用。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车同轨”，“行同伦”，统一法令、历法等，对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发挥了促进作用。秦朝的政治、经济制度，对此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有着深刻的影响。它奠定了中国辽阔疆域的基础，使中华民族的崇高声誉，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远播海外，因而对世界文明的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秦朝为统一中国采取一系列措施的同时，又以残酷镇压手段企图扼杀一切反秦意识。采用严刑峻法，焚书坑儒，箝制了思想，摧残了文化，在这种恐怖、高压政策下，秦代统治 15 年间，文学了无成就，唯一的作家是李斯。这时的罗马文学正处于开创时期，主要成就是戏剧。

由于秦统治者滥用民力，赋税无度，暴虐无比，阶级矛盾迅速尖锐化。公元前 207 年，秦王朝便被广大人民及六国残余贵族的起义所推翻。经过 4 年的楚汉战争，刘邦打败项羽，于公元前 206 年建立汉政权，史称西汉。公元 8 年，王莽篡汉，国号为新。公元 23 年，绿林、赤眉起义，推翻了王莽政权，刘秀乘机夺取胜利果实，于公元 25 年建立东汉。两汉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在亚洲西部是帕提亚王朝，中国史书称之为“安息”。在中亚细亚是大月支人建立的贵霜帝国。在欧洲是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罗马共和国后期约与西汉同时，罗马帝国前期与东汉同时，它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成为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两汉和罗马两大帝国成为东西方文明的中心，东西方文明已经超越时间和地域的局限互相碰撞，相互影响，这是世界史上的第一次不同文明相互传播与交流时期。

西汉开国之初，城乡荒凉残破，人口大量减少，国家非常贫弱。汉初统治者汲取秦速亡的教训，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薄赋敛，省徭役，轻田租，重农抑商，因而初步出现了社会安定、生产发展、人口增长的局面。与此相适应的是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道家的“无为而治”颇为流行。汉惠帝废除秦的挟书之令，广开献书之路，促进了学术思想文化的发展，文学开始出现了生机。从公元前 206 年刘邦建汉到公元前 141 年景帝死，是西汉的前期。这一时期文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散文和辞赋的发展上。汉初作家在全国一统的局面下，既保持了战国诸子关心现实的优良传统，又受到南方楚辞文体的影响，他们往往既是政论散文的作家，又是辞赋作家。因而，他们的散文从内容看，密切结合政治；在艺术上，辞采华茂，情感真挚，句法有辞赋化倾向。著名作家有贾谊、晁错等。

辞赋主要继承骚体传统，也开始向新赋体转化。完成由骚体赋向散体大

赋这一演变的代表作家是枚乘。

西汉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公元前 156—前 87 年）即位后，经济力量已十分雄厚。汉武帝施展雄才大略，实现了中央集权下的全国的统一。经过多次战斗，他把匈奴势力赶到了大漠以北。西汉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学术文化也达到了汉代的鼎盛时期。与政治、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在思想文化方面，对当时社会影响最深而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皇权思想，标志着儒家思想经过董仲舒的发展，开始成为封建统治阶级加强政治思想统治的重要工具。

伴随着这种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各方面的变革，在文化上也对古代、特别是对春秋战国以来的灿烂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其代表著作就是司马迁的《史记》，这是我国先秦文化的集大成式的文献，是一部光耀千古的文学著作。

汉帝国的强盛，使好大喜功的汉武帝需要洋洋洒洒的文学作品来歌功颂德，宣扬统一帝国的强大声威。于是，反映这个时期汉帝国的强盛和突出反映统治阶级生活豪华、适应宫廷需要的一种辞赋形式——“大赋”便应运而生。汉武帝时代，是辞赋最兴盛的时期，代表作家是司马相如、东方朔等。

武帝以后，西汉王朝逐渐转入了衰微的时期。土地日益集中，阶级矛盾尖锐。王莽改制，进一步加深了社会灾难。西汉后期的文学也呈现衰落状态，较有成就的仍然是辞赋和政论散文。一般政论散文大都蒙上今文经学说教的外衣，迂腐板滞，毫无生气，只有宣帝时桓宽编著的《盐铁论》是唯一可贵的作品。刘向的散文也有一定的价值。扬雄是西汉后期最大的辞赋家。

东汉建立之初，光武帝刘秀调整统治政策，与民休息，多次释放奴婢，安置流民，减轻田租，兴修水利，出现了“光武中兴”，阶级矛盾暂时缓和，天下安平，百姓殷富。但东汉豪强地主势力有了很大发展，中期以后，皇帝都是幼年即位，不能掌握权力，于是出现了外戚和宦官专权的局面，使政治日趋黑暗，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激化。公元 184 年，终于爆发了黄巾农民大起义，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基础，使东汉政权名存实亡。

东汉时期的统治思想是今文经学特别是谶纬神学。所谓谶纬神学，实际上是经学和封建迷信的混合物，只不过是在经学身上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愚弄人民和束缚士人的思想。为了使谶纬神学取得与经学同样的学术地位，公元 79 年，汉章帝大会群儒于白虎观，讨论“五经同异”，“使诸儒共正经义”，实际是要使谶纬经学化，经学谶纬化。会议的讨论情况，由班固写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白虎通》）。这部书系统地吸收了阴阳五行和谶纬之学，形成了今文经学的主要论点。这部书把儒家思想法典化，使儒学独尊的局面最后确立下来。

谶纬神学的流行，使得今文经学更加空虚荒诞。统治阶级中一些较有见识的人如桓谭、王充、张衡等都反对谶纬神学。王充的《论衡》对一切神学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表现了唯物主义精神，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东汉时期，最重要的史学著作是班固的《汉书》，它包括了整个西汉一代的历史，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东汉的赋体文学不如西汉兴盛，但出现了一些有一定开创意义的抒情小赋，张衡、蔡邕、赵壹等是代表作家。汉代乐府民歌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汉代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代表作首推

《孔雀东南飞》，它创造了一个反抗封建礼教压迫的典型妇女形象，是汉乐府叙事诗发展的高峰。在乐府民歌的影响下，东汉文人的五言诗有了发展。《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文人五言诗的代表作品，它们反映了汉末尖锐的阶级矛盾，风格含蓄，语言谐和而鲜明。

2. 秦汉散文

秦朝存在的时间很短，统治者专门崇尚法治，对于发展文化不大重视。因此，秦代文学没有什么成就，唯一的作家是李斯。西汉是一个泱泱大朝，取得了很高的文学成就，其中散文成就最高。西汉前期，统治阶级及其所有的政治家、思想家、历史家们都在认真总结秦亡的经验教训，思考怎样避免重蹈秦的覆辙，使汉王朝的统治长治久安。表现在文学上，最有力量的作品是政论散文，其代表作家是贾谊、晁错。西汉中期，国力强盛，文化繁荣，在文学上最具代表性的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散文家司马迁。西汉后期，社会动荡，文学呈现着衰落的状态，较有成就的散文作家是桓宽、刘向。东汉时期的文章著述比西汉后期还要迂腐沉闷，文坛上充塞着一种神学迷信和恶劣的形式的迷雾，最有成就的散文作家是班固。而战斗性最强、思想水平最高的是王充的作品。关于司马迁，将在下一个目作专门介绍。

（1）李斯

李斯（？——公元前 208 年），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县）人。秦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

战国末期，他和韩非同受业于著名思想家荀况。后入秦，历任长史、客卿、廷尉，官至秦国丞相。他在辅佐秦始皇统一中国和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秦二世时，被赵高杀害。

李斯的文章留下来的有《谏逐客书》和《论督责》，见于《史记·李斯列传》。

《谏逐客书》写于战国晚期的秦王嬴政十年（公元前 237 年），是李斯对秦王嬴政由于发现奸细而错误地下逐客令所上的一封奏疏。当时，韩国派往秦国作间谍的郑国被发觉，秦王在宗室大臣的一致要求下下了逐客令。李斯是楚国人，正在秦国作客卿，也被驱逐。于是，他上了这篇奏疏，历叙了秦穆公以来客卿在秦国的统一事业中立下的功绩，并以异国的器物玩好作比喻，指出这些东西虽然不产于秦，却为秦所用，批驳了逐客的错误，进而指出用人不必限于本土，重用客卿，将无敌于天下：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借寇兵而赍盗粮者也。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文章不仅表现了政治家的远见，而且也真实地反映了战国晚期斗争剧烈、各国统治阶级争取人才的历史。文章运用铺陈夸张、排比对偶的写法，比喻形象，说理有力，文采华美，气势充沛，具有战国纵横家善于辞说的雄

辩风格，产生了巨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结果，秦王读了这封奏疏后，收回了逐客令。

《论督责》是李斯向秦二世阿谀谄媚、推行严刑酷法的奏议。李斯的铭文是他随同秦始皇巡狩封禅时刻在山上的文字，一般是四言韵文，歌功颂德，对后世碑铭文有一定影响。

（2）贾谊

贾谊（公元前 200——前 168 年），洛阳人，汉初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也称贾生。少以博学能文著称，20 余岁，博通诸子百家之言，被汉文帝召为博士，擢拔为太中大夫。他提出了一套巩固地主政权的主张，力主中央集权，强调以民为本，颇得汉文帝赏识。后因周勃、灌婴等人的谗毁，被贬为长沙王太傅、梁怀王太傅，忧郁而死，年仅 33 岁。其政论散文皆见于刘向编的《新书》中。

贾谊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以政治家敏锐的目光、文学家杰出的手笔，写出了匡时救失、具有远见卓识的政论散文。其代表作为《过秦论》、《陈政事疏》、《论积贮疏》等。

《过秦论》分上、中、下三篇，总结了秦朝兴亡的历史原因，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其基本观点是秦国不了解打天下与守天下所用谋略的区别。作者极力渲染秦国自孝公以来如何强盛，但终于二世而亡。文章深刻论述了以暴力取天下兴，以暴力治天下则亡的道理，强调了民心的作用。秦始皇守天下没有实行争取民心的政策，秦二世又暴虐无道，所以，陈涉、吴广揭竿而起，伐无道，诛暴秦，富强无比的秦顷刻土崩瓦解。而秦亡的原因是什么呢？“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

所以，要想使天下长治久安，必须使用儒家的仁义之术。

“过秦”，即指责秦政的过失。作者的写作目的是用“过秦”来“过汉”，要汉朝以秦亡为鉴。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对贾谊评价很高。

《过秦论》采用夸张对比的手法来论述主要观点，文辞宏丽，笔致曲折，气势纵横，具有雄辩的说服力。

《陈政事疏》针砭时弊，开头使用了一个非常恰当而形象的比喻将当时隐藏的社会危机指了出来：“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势，何以异此。”作者大胆揭露了汉初存在的矛盾和危机，提出削弱诸侯割据势力、全力抗击匈奴的入侵、注意民生等问题，分析深刻，笔锋犀利，言辞激切。汉文帝看了这篇奏疏后，当时就采纳了其中不少建议。

《论积贮疏》对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作了真实的叙述，提出：“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蓄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廩廩也。”文章条理明晰，说理透彻，中心思想是要天下以农为本，各食其力。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汉书·贾谊传》。

《汉书·食货志》。

贾谊的政论散文都善用比喻，感情充沛，气势磅礴，语言明畅，保留着战国散文的特点，对后世的政论文有一定的影响。

贾谊也是汉初的辞赋家。现存作品 5 篇，以《吊屈原赋》和《鹏鸟赋》为代表作。《吊屈原赋》是他被贬官长沙途经湘水时所作，借吊屈原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心情，激昂感愤，哀怨悱恻，有屈原之遗风。《鹏鸟赋》是他谪居长沙时所作，主要是自我伤悼、自我排遣，充满消极悲观的思想，也流露出对社会现实的不满。贾谊的赋采用主客问答体，大量使用四字句，形式上趋向散体化，显示了楚辞向汉大赋过渡的痕迹。

（3）晁错

晁错（公元前 200——前 154 年），颍川（今河南禹县）人。西汉前期著名的政治家。汉文帝时任太子家令，称为智囊。汉景帝时任御史大夫。他主张发展农业生产，抗击匈奴的入侵，削夺诸侯王国的部分封地，因而遭到诸侯的反对。吴王刘濞联合六国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借口，发动了七国之乱。为了平定诸侯的叛乱，汉景帝杀晁错以退兵。著有《论贵粟疏》、《守边劝农疏》、《贤良文学对策》、《言兵事疏》等，其中最著名的是《论贵粟疏》。

《论贵粟疏》是晁错针对当时土地兼并严重，广大农民破产逃亡的社会现象，写给汉文帝的一封奏疏。其内容是建议汉文帝重视粮食生产，提出了重农贵粟、重农抑商的主张和办法。文章说：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以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富可捐，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这些对于加强中央集权，打击诸侯割据势力，积蓄力量反击匈奴入侵是十分必要的。汉文帝接受了他的意见，实施了这个办法，从而促进了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

晁错的文章逻辑严密，立论精辟，语言简练朴实，较之贾谊则略乏文采。鲁迅曾评价贾谊、晁错的散文：“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4）桓宽 刘向

桓宽（生卒年不详），西汉汝南（今河南上蔡西南）人，字次公。博学多才，善写文章。汉宣帝时任为郎，官庐江太守丞。其代表作是《盐铁论》，共 60 篇。

《盐铁论》记述的是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 81 年）盐铁会议上御使大夫桑弘羊和贤良文学所进行的一场有关盐铁问题的辩论。辩论的起因是当时有些人不满意汉武帝以来所实行的盐铁官营以及平准均输等各项重大经济政策。参加会议的有丞相田千秋和他的下属丞相史、御史大夫桑弘羊和他的下属，还有代表一般商人和地主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即所谓的“贤良”和“文学”，共 60 余人。会议辩论很激烈，涉及的政治范围很广。辩论的结果以贤良文学们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各项基本政策基本上都没发生大的变化。桓宽

《汉书·食货志》。

《汉文学史纲要》。

对辩论的旧有纪录进行了再创作。他的立场是站在贤良文学一边的。全书以对话的形式，彼此诘难，相互辩驳，展开争论，再现了每个不同立场的人物的形象，栩栩如生，特别是刻画出了桑弘羊的政治才干和他义正辞严的论辩雄风。如《利议》中写道：

“大夫曰：作世明主，忧劳万人，思念北边之未安，故使使者举贤良文学高第，详延有道之士，将欲观殊议奇策，虚心倾耳以听，庶几云得。诸生无能出奇计，远图匈奴安边境之策，抱枯竹，守空言，不知趋舍之谊，时世之变，议论无所依，如膝痒而搔背，辩讼公门之下，汹汹不可胜听，如品即口以成事，此岂明主所欲闻哉？”桑弘羊的政治眼光和锋利的论辩语言，都表现得异常突出。

《盐铁论》是西汉中期以后最优秀的政论散文集，它针砭时弊，颇中要害，文笔简练，言辞犀利，浑朴质实，在西汉散文中独具一格。

刘向（公元前79——前8年），字子政，沛（今属江苏）人。西汉著名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汉皇族楚元王刘交四世孙，著名学者刘歆之父。20岁任谏议大夫。汉宣帝时，任散骑谏大夫给事中。汉元帝时，任散骑宗正给事中。他是皇帝的宗室，非常关心当时外戚与王室的斗争。他写过许多章表书疏，内容多是称引灾异警告皇帝要提防外戚王氏篡权，客观上反映了西汉末年统治集团内部的尖锐冲突。他因弹劾外戚宦官专权误国而两次入狱，免官多年。汉成帝时，升迁光禄大夫，官终中垒校尉。他平生著述甚多，其文章舒缓平易，说理畅达。

刘向编著了《新序》、《说苑》、《古列女传》等历史故事集，辑先秦及汉代史事，用以总结历史教训，阐明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维护刘氏的正统，排斥外戚势力。但其中也有不少意味深长的寓言故事和民间传说，《新序》中的《叶公好龙》最脍炙人口，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宫雕文以写龙。于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非龙者也。”此文生动地刻画了喜尚空谈、不务实际的封建地主阶级士大夫的虚伪面貌。另如孙叔敖、丑女无盐等故事都耐人寻味，是魏晋小说的先声。

（5）班固和《汉书》

班固（公元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东汉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著名史学家班彪之子。年9岁即能写文章诵诗赋，及长，博通群书。班彪曾续《史记》作后传65篇。班彪死后，班固继承父业，于汉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开始私撰《汉书》。后来被人告发，以私改国史罪被捕下狱。其弟班超上书力辩，明帝阅读了班固著作的初稿，很赞赏他的才能，予以获释，并召为兰台令史，让他继续撰写《汉书》。一年后升为郎，典校秘书。经过20多年的努力，至章帝建初七年（公元82年）基本写成《汉书》。章帝时，为玄武司马。和帝时，为中护军，随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后因窦宪被杀受牵连入狱，死在狱中。《汉书》未完成部分，由其妹班昭完成。

《汉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记载了自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29年的历史。全书共100卷，分12帝纪、8表、10志、70列传。它在体制上全袭《史记》，只改“书”

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

班固出身仕宦家庭，崇奉儒家思想，又是奉诏修书，缺乏司马迁那种卓越见解和批判精神。如《史记》歌颂游侠见义勇为、扶贫济弱的精神，班固却说他们“其已不容诛”。但作为一个史学家，他还是尊重客观历史事实的。在《外戚传》、《佞幸传》中，比较深刻地揭露了统治阶级及其爪牙的罪行，也流露出对人民疾苦的同情。而在另外一些传记如《龚遂传》中，对那些体恤民情、公正清廉的官吏加以赞扬。

《汉书》作为传记文学，也有较高的成就。它的文笔虽不如《史记》富于变化，跌宕起伏，但是很严谨。语言则受汉赋的影响，以整饰华丽见长。其中有不少传记写得生动酣畅，可与《史记》媲美。如《霍光传》刻画了霍光的权臣形象，揭示出他的既维护刘氏政统又权高震主，既小心谨慎又飞扬跋扈的复杂性格。《朱买臣传》、《张禹传》等都写得很成功。最著名的是《苏武传》，它描写了一个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勇敢无畏、坚贞不屈、不辱国命的使臣形象。苏武是汉武帝时人，出使匈奴，匈奴人千方百计诱降他，都被严辞拒绝。于是：

“单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共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无人处，使牧羝，羝乳乃得归。别其官属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这篇传记出色地描写了苏武坚韧不拔的民族气节和生活上的种种苦难，千载之下，仍然令人肃然起敬。

《汉书》在中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的人物传记的成功之作，同《史记》的优秀人物传记一样，也成为后代传记文学的典范。历史上《史》、《汉》并称，各有所长，都对后代有很大影响。

班固又是著名的辞赋家，作有《两都赋》、《答宾戏》、《幽通赋》等，但多模拟之作。《两都赋》记述了长安、洛阳两都的富丽繁盛，最后归结为应建都于洛阳。作品的内容与形式都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

（6）王充和《论衡》

王充（公元27——97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东汉初年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文学理论家。出身寒门，家以农桑为业。少年好学，后受业于太学，曾师事史学家班彪。因家贫无书，常去书摊阅览，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曾做过郡功曹、治中等地方官吏，后弃官家居，专心著述。他的著作现在保留下来的只有《论衡》一书，85篇，20余万言。

《论衡》是一部具有唯物主义思想与无神论光辉的哲学巨著。在这里，王充以唯物主义观点批判了当时统治者所提倡的对于天道神权命运的迷信，表现了作者反正统思想的战斗精神。从这种精神出发，作者对当时以辞赋为主的正统文学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也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提出了不少进步的文学主张，对魏晋以后的文艺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充重视文章的实用价值，强调文学的“劝善惩恶”和“有补于世”的作用。他说：“夫文人文章，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文学之可贵也正在这里。“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者，一章无补。如皆为用，则多者为上，少者为下。”王充主张文章的内容与形式要统一，即“外内表里，自相副称”，反对“雕文饰辞”、“言过其实”。

他强调文学语言应浅显通俗，力求文学语言与口语一致，反对文字艰深、厚古薄今、模拟因袭。

王充认为作家的写作都有着一定原因并为着一定的目的而创作的。所谓“故夫圣贤之兴文也，起事不空办，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王充的这一思想不仅在哲学上，而且在文学上给了后世很大影响。从唐代古文运动所强调的“辅时及物”、新东府运动所提出的“匡世济时”中，都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

当然，王充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但总的说，却代表着那个时代的高峰。他的文学理论，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和积极意义，对后世颇有影响。

3. 司马迁和《史记》

（1）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

司马迁（公元前135——前87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在中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的《史记》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史诗，他的史传文学同屈原的辞赋、杜甫的诗歌、曹雪芹的小说一样，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划时代的作品，因为他们的作品都反映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特征，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面貌。

司马迁生活在西汉武帝时代，这是中国古代一个空前强盛的时期。经过汉初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汉朝的政治日渐巩固，经济日渐发展，国力日渐强盛。富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一改汉初的“清静无为”之风，“外事四夷，内兴功利”。他改革了内政，开拓了边疆，同时，他又在思想文化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现了思想统一。经过汉武帝的内外经营，西汉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大汉帝国雄踞世界的东方。这样一个伟大的帝国和伟大的时代，是孕育司马迁这样一位伟大作家的土壤。

然而，盛极而衰是事物发展的不可抗拒的辩证法。经济的繁荣滋长了统治阶级的铺张奢靡，国力的强盛滋长了统治者的穷兵黩武，而思想的独尊儒术，则根本排斥了百家争鸣，束缚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司马迁看到了当时社会的隆盛，也看到了它的弊端丛生。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司马迁以饱蘸感情的巨笔，以史传文学的形式，去讴歌正义，批判腐朽，探讨新生，“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寻找历史的答案，终“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之所以能够完成《史记》这样的伟大著作，与他多少年学识的积累和他个人生活的磨难是分不开的。

首先是他的家学渊源。司马迁的先代“世典周史”，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初年的太史令。司马谈学识渊博，且早有像孔子那样著述历史的宏愿。他为此做过一些准备，但未能实现。临终之际，他将这一理想和愿望留给儿子，希望儿子能继承史官家世，学习孔子写《春秋》的精神，以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他的思想、学识和治学态度无疑都对司马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除了家学影响外，少年时代的司马迁“十岁诵古文”，后来，曾向大学问家孔安国请教古文《尚书》，也曾师从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即今文《春秋》学说，加上他自己刻苦研读了大量的典籍，这些都为他的著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董仲舒的《春秋》学说则直接成为他写作《史记》的思想动力。他就是要学孔子，以一部《春秋》微言大义，评述历代是非，“以

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青年时代的司马迁曾经漫游祖国的名山大川，探察历史的遗迹，这对于完成他的宏篇巨著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他的漫游考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他 20 岁时开始的。为了开阔眼界，弄清楚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环境，追踪重要历史人物的行迹，他南游江淮，登会稽山，探寻传说中大禹住过的洞穴；考察九嶷山，寻访舜的葬地；也曾泛舟沅水湘江，凭吊屈原的志洁行廉；他还曾北渡汶水泗水，在齐鲁之都临淄、曲阜等地与儒者谈经论业，观瞻孔子墓地及其生前所居之堂、所遗之物，观看孔子的后学弟子在仲尼的庙堂上演习各种礼仪；又到孟子的故乡邹峰之地，学习乡射之礼，为邹鲁之邦浓重的儒风深深地感染了，留连“不能去云”。此后，司马迁继续南行，访问了孟尝君的封邑薛，西楚霸王项羽的王都彭城，汉高祖刘邦及汉初诸多名臣的故乡沛丰，收集了大量的秦汉之际重要人物的行迹，然后，他经过梁、楚之地，折回长安。

第二阶段的游历是在他入仕之后，大概在元鼎三年（公元前 114 年），司马迁“仕为郎中”。郎中是汉朝宫廷内部一个很低的官职，平时守卫宫门，出巡时侍从车驾，是皇帝的近侍官。此后，司马迁经常侍从武帝，巡幸郡县，省察民情，进行封禅活动。这期间，他先后到过西北，奉使川蜀滇中，登泰山封禅，东巡海上，北临碣石，巡辽西，历九原，还曾跟随汉武帝到濮阳一带“负薪塞河”，以防治黄河水患。几年中，司马迁多次侍驾出巡，足迹遍及全国，远涉边陲夷地，大大丰富了司马迁的阅历。作为皇帝的近侍，他也更多地了解了宫廷的内幕，参加了各种大型典礼，更熟悉了朝堂礼仪。

这两个阶段的游历出行，使司马迁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获得了大量的逸闻趣事，进行了切实的历史考察和民间采风，这对他后来写作《史记》、写活历史人物作了十分有益的积累。

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 年），司马谈病逝。3 年后，元封三年（公元前 108 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他谨记父亲的遗训，缀集天下遗闻轶事，博览皇家旧史群书，开始着手编写《史记》。他一面忠心耿耿为皇帝做事，主持改订“太初历”，一面“绝宾客之知，亡世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潜心著述。

然而，就在这时，一场横祸降临到司马迁的头上。

公元前 98 年，汉武帝派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进攻匈奴。李陵一马当先，横扫千余里。但因孤军深入，寡不敌众，战败被俘，被迫投降匈奴。消息传来，武帝十分震怒。司马迁素与李陵交好，知其为人，便向武帝坦陈自己的看法，认为李陵战败迫降，实为不得已，将来一遇机会，定会报效朝廷的。这下惹恼了汉武帝，认为他是故意替李陵辩护，于是下诏将李陵满门抄斩，同时，将司马迁打入死牢。他在狱中关了 4 年，他曾想一死了之，但是，父命未竟，事业未成，如此一死轻于鸿毛。于是他从容就“腐刑”，忍辱含垢活下来。出狱后，他被任为中书令，但司马迁早已无心仕途。他看透了人间的世态炎凉，对最高统治者残暴无耻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他之所以“隐恶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也就是说，他之所以苟且偷生，活在世上，就是为了了却著述《史记》的心愿。于是，他把屈辱深埋心中，

把生死置之度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发愤著史。到公元前 90 年，整整 18 年的时间过去了，司马迁终于完成了他的宏篇巨制《史记》。此后，他便消声匿迹了，以至于他究竟什么时候离开人世也无人知晓。他把他全部的热情、全部的心血、他的激动、他的泪水、他的喜怒哀乐以至他的全部生命，都倾注到了这部《史记》之中，他在他自己的身后留下一座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

（2）《史记》的思想意义

司马迁的思想倾向和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史记》中。《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自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大约 3000 年的历史。全书分为 8 书、10 表、12 本纪、30 世家、70 列传，共 130 篇，526500 字。《史记》不仅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总结，也是以写人物为中心的历史文学的典范。它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述与评对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和褒贬，体现出作者的人民性、批判性的进步思想倾向，这是《史记》之所以成为不朽之作的精神支柱。

《史记》的进步性主要表现在它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肯定历史变革，颂扬为历史变革做出贡献的杰出人物。例如，他说：“桀纣失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这就肯定了历代变革的正义性，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在政治思想上，《史记》维护“大一统”的观念，这在当时是进步的。他颂扬秦始皇统一六国的丰功伟绩，也赞同刘邦结束楚汉纷争、重新统一全国的伟业。尽管他对此二人都有其他多方面的贬责，但在这一点上他是充分肯定的。因为当时的统一有利于人民的安定，为民心所盼。他赞成“王道”，反对“霸道”，他的政治思想一方面来源于上升时期的儒家思想，另一方面又深深植根于人民性之中。

《史记》的人民性集中体现在对民众疾苦的深深同情，以及对人民群众反抗暴力统治的斗争的肯定上。例如，他热情歌颂了陈胜（字涉）、吴广领导的反秦农民起义的历史功绩。对于这样一个在不大的范围内建立政权，前后不足六个月的农民领袖，司马迁将他列入“世家”，就是因为“天下之端，自涉发难”，陈胜乃“无土而王”。这是对传统的宗法观念的大胆突破，反映了司马迁的远见卓识。司马迁正确分析了起义的原因，是由于“秦失其政”，“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天下苦秦久矣”，从而揭示了这次农民起义爆发的根源。其认识是深刻的，闪烁着唯物史观的光辉，也为人民反抗斗争的正义性找到了最充分的根据。司马迁倾注着浓厚的感情，描写了陈胜少时的“鸿鹄之志”，危难时刻敢“为天下唱”的首创精神，建立“张楚”政权的雄才大略，以及起义后天下云集、队伍迅速壮大，攻关掠地，摧枯拉朽的磅礴气势。司马迁也描写了陈胜的错误和失败，总结了失败的教训，寄予了深深的惋惜与殷殷的同情。“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出自陈涉口中的呐喊，也是司马迁心中的呐喊。正因为如此，他把陈涉与古代“圣贤”汤、武、孔子并列。这是司马迁对陈胜的崇高评价，也是《史记》人民性的集中体现。

《史记》的人民性还体现在为一批下层社会的人物立传，其中有刺客、游侠、医卜、倡优等等。他赞许刺客“士为知己者死”、舍身反抗强暴的英雄行为；他歌颂游侠急人之难、济人之困、轻生死、重然诺、见义勇为、舍己为人的侠义精神。例如，他笔下的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而他

自己却“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鞬牛”。郭解则是“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振人之命，不矜其功”。游侠是与统治者相对立的，司马迁倾注自己的强烈感情，和着自己的泪水颂扬他们，把他们看作是为那些被摧残、被损害的社会弱者申冤复仇的英雄。

《史记》坚持了史家忠于史实的“实录”精神，对统治阶级，甚至是当朝最高统治者的残酷、贪婪、阴险、昏庸，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讽刺，表现了深刻的批判性。如，司马迁笔下的汉高祖刘邦，少时是一个“好酒及色”的无赖之徒。楚汉战争中，他自私、残忍，不惜把自己的父亲作牺牲品；入宫之后，他“贪于财货，好美姬”；对于辅佐他打天下的功臣，他心怀猜忌，玩弄权术；夺取江山以后，他诛杀功臣，背信弃义。通过这一桩桩历史事件和一个个细节描写，字里行间活画出一个阴险、狡诈、多疑、残忍、玩弄权术的帝王形象。

汉武帝是与司马迁同时代的“圣上”，司马迁长期侍从其左右。对于这样一位当朝最高统治者，司马迁也大胆揭露了他的好大喜功，暴戾残酷和愚昧迷信。特别是对武帝的迷信求仙活动给予了辛辣的讽刺。武帝堂堂一国之君，屡被方士所骗，甚至听从方士的胡言，把自己的宫室按照神仙境界布置起来，居于其中，等待神仙来会。一住一年多，也没有见到神仙的影子。后来方士又将帛书塞到牛肚子里，谎称神牛欺他，经人辨认，知是伪书，才知道自己上了方士的当，却又怕别人笑话，不敢告人，实在愚蠢可笑之至。

《史记》还无情揭露了作为封建统治者爪牙的酷吏、汉儒的丑恶嘴脸。司马迁笔下的缙绅先生之徒“缘饰以儒术”，实则是只知阿谀奉迎、趋炎附势、投机取巧、追名逐利的利禄之徒。在《酷吏列传》中，刻画了汉武帝周围的一群酷吏，如张汤、杜周、义纵之流，他们专以人主的好恶治狱。在叙述这些酷吏的血腥“政绩”时，作者每每指出“上以为能”，笔锋直接指向皇上。

当然，《史记》也有很多落后的、腐朽的东西。它的思想体系基本上属于唯心主义的；它对封建统治阶级基本态度还是拥护的；它以阴阳五行神学观念附会王朝更替，给封建帝王披上君权神授的外衣；它把历史上的兴衰成败主要看作是帝王将相的活动，等等。但是，《史记》虽有这样一些糟粕，却掩盖不了其人民性、民主性、战斗性的精华。正因为如此，才使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

（3）《史记》的文学成就

《史记》是史学与文学完美结合的典范，它不仅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而且在艺术上也有独到的成就。

作为一部以写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历史文学著作，《史记》塑造了一系列形形色色的、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在《史记》的五大部分中，除了表和书以外，本纪、世家、列传都是写人的。上自帝王、将相、外戚，下到游侠、刺客、酷吏、兵家、策士、文人、儒者、医卜、倡优等等，各色人物无所不具，形成了一个历史人物的画廊。其中主要人物有制仪法、垂“六艺”的“至圣”孔子及其弟子；有贤相管仲、晏婴、萧何、曹参；有良将廉颇、李广、韩信；有行吟泽畔的屈原；有勇于变法的商鞅；有战国四公子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春申君；也有一代豪杰项羽、汉朝开国之君刘邦；有著名谋士良臣张良、陈平，也有造反的农民英雄陈胜、吴广……这些人物来自各个不

同阶级、阶层，不同职业、集团，但都是在历史上有代表性的人物。司马迁在忠于史实的前提下，善于调动各种文学手段塑造人物形象，使一个个历史人物既真实可信又栩栩如生，各具个性特征，音容笑貌跃然纸上。读后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宛如历史长河的灿烂群星，光彩照人。

《史记》善于运用符合人物身分、性格的语言刻画人物，在语言的运用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刘向、扬雄、班固等人都折服司马迁的文笔，称赞他“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司马迁善于抓住典型语言来反映历史人物的典型性格和内心世界。例如，陈涉、项羽、刘邦都是历史上很有作为的人物，作者选取了不同的场景和典型的语言来表现他们青少年时期的雄心勃勃。他写刘邦和项羽见到秦始皇时，项羽对身边的叔父说：“彼可取而代之也。”短短七个字，便刻画出项羽性格的爽直、坦白、强悍。刘邦则慨叹道：“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表现了刘邦的贪婪而又含蓄。而对于农民出身的陈涉，作者只写他在田间地头与穷哥们相约，“苟富贵，勿相忘”，暗射出他的“鸿鹄之志”。而一句“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一方面点出前段文字的主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陈涉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农民的狂傲自负之态。《史记》善于从群众生活中学习、提炼语言，运用了大量的口语、土语、谚语、民谣，甚至连周昌的口吃病也以“期期”二字表现得活龙活现。这一切都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

《史记》以故事化见长，写人记事力避一般化地平铺直叙，而是抓住主要事件，以故事化的手法，把人物放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来展现其性格特征。这种矛盾冲突往往以紧张的场面、情节描写为依托，极富戏剧性。例如，一篇《项羽本纪》就是由一系列的故事构成的，像“破釜沉舟”、“鸿门宴”、“鸿沟划界”、“垓下之围”等。这些故事正是项羽政治、军事生涯的关键事件，也是秦末农民战争、楚汉战争的关键事件。在这些故事中，作者通过曲折的情节、紧张的场面、激烈的矛盾冲突，活画出项羽、刘邦、范增、张良等一系列典型人物，引人入胜。

《史记》善于运用细节描写来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在材料的取舍上独具匠心。如《魏公子列传》中写信陵君为夷门监者侯嬴执辔过市，表现了他仁而下士的真诚态度。又如《酷吏列传》中写张汤儿时掘窟狱鼠的游戏，从而深刻揭示了张汤残忍的本性。这些看似儿戏的细节描写，使人物形象更加有血有肉，更具动人的艺术魅力。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鲁迅先生对《史记》的崇高而客观的评价。在古代，从班固以下的史学家、散文家无不对其推崇备至。从散文写作、文章风格，许多作家都从《史记》中汲取了营养。唐代古文运动的大家韩愈得其文风的矫健，宋代大散文家欧阳修得其一唱三叹，清代桐城派大师方苞得其记事有序有法。《史记》作为传记文学的开先河之作，最早取得了塑造人物形象的成功，对明清小说、戏剧的创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史记》中的许多故事和人物，千百年来在人民中间广为流传，成为小说、戏剧及其它文学形式取材的源泉。《史记》中所歌颂的许多英雄人物为后人所仰慕，历代的文人武士都可以从中受到鼓舞和激励。可见，两千年来《史记》的影响是极其深远而广泛的。

4. 汉代辞赋

辞赋是两汉 400 年间最流行的一种文学形式。西汉初期，是骚体赋向散体大赋的过渡时期，辞赋以抒情为主，其代表作家是贾谊和枚乘。汉武帝时代是辞赋最兴盛的时代，辞赋内容广阔、辞彩富丽、体制宏大，因此成了文苑的宠儿，共有赋 400 余篇。这一时期最有成就的代表作家是司马相如。此外，还有朱买臣、东方朔、枚皋等。西汉末年，较有成就的辞赋家是扬雄。东汉时期，散体大赋呈日益僵死的趋势，抒情小赋逐渐发展起来。抒情小赋文字清新，体制短小，表现了汉赋晚期的重大变化。其代表人物有张衡、蔡邕、赵壹等。

（1）枚乘

枚乘（公元？——公元前 140 年），字叔，淮阴（今属江苏）人。西汉著名的辞赋家。他生活在文景时代，初为吴王刘濞郎中，曾上书谏阻吴王谋反，未被采纳，遂投奔梁孝王，为梁孝王门客。后来吴王发动叛乱，他又上书劝谏。因此知名当世。景帝召拜他为弘农都尉。后来以病辞官，复游于梁。“梁客皆善辞赋，乘尤高”。梁孝王死后，他回到老家淮阴。汉武帝即位后，慕其文名，以安车蒲轮征其入京，卒于道中。《汉书·艺文志》著录枚乘赋 9 篇，今存《柳赋》、《菟园赋》、《七发》3 篇。前两篇后人多怀疑是伪作。《七发》比较可靠，它是标志汉赋形成的第一篇作品。

《七发》是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探望，说七事以启发太子。作者铺写了 8 段文字。开头一段是全文的序，叙述楚太子得病的缘由，指出楚太子的病根是腐化懒惰：“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这些话切中贵族子弟的要害，批判色彩非常鲜明。以下 7 段是吴客用 7 种办法来启发楚太子，为他治病。前 6 种办法分别是描述美妙的音乐、丰盛的饮食、排场的车马、宏深的宫苑、壮阔的田猎和舒心的观涛。一问一答，逐段铺陈，一步步启发太子，诱导他改变生活方式。结果太子都以病推辞。其中广陵观涛一段最为精采：

“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内云，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涛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 ■，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这里，从各个侧面描写波涛的形状、动态、声势，变化多端，惊心动魄，酣畅淋漓，音声盈耳，奇观满目，令人心旷神怡。最后，吴客说以圣贤方术之要言妙道：

“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娟、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怵然汗出，霍然病已。”这一段是全篇的主题。意思是说，做为一个统治者不能整天沉醉于声色犬马之中。太子听了这一番话，豁然大悟，病即痊愈。

《七发》在艺术上最大的特色是夸张铺叙。刘勰《文心雕龙》誉之“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七发》辞藻华丽，想象丰富，善用比喻，对汉赋有很大的影响。但它不像后来的大赋那样堆叠奇僻词汇，读来较为平易。其思想意义，刘勰以为“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李善以为“说七事以启发太子”。《七发》在汉赋中是思想性、艺术性都较强的一篇。但由于对声色玩乐等事物铺写过繁，刻画有余，而生动不足，自不免有冲淡主题、削弱思想意义之嫌，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汉赋“劝百讽一”的弱点。

《七发》是由骚体的楚辞演化而来的新体赋——汉赋正式形成的标志，在赋的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它奠定了新体赋的形式，促进了汉赋的发展，对后世影响很大。甚至后来专门形成了一种定型的主客问答形式的文体“七林”。

（2）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前117年）字长卿，成都人。汉大赋的代表作家，也是中国辞赋发展史上最杰出的辞赋作家。好读书击剑，汉景帝时任武骑常侍。后借病辞官，从枚乘游梁，在梁作《子虚赋》。梁孝王死后，相如归蜀，路过临邛（四川邛崃）时，以弹琴结识了临邛富人卓王孙寡女卓文君，情笃意深，遂双双私奔，同归成都。因为相如家贫，两人又回到临邛，当垆卖酒为生。卓王孙以为耻，乃分给文君家僮和财物。他们二人的爱情故事遂成佳话，在民间广为流传，后世小说、戏曲曾取为题材。后来汉武帝读了《子虚赋》，大为欣赏相如的才气，有“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的感叹。后武帝召见相如，相如说《子虚赋》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遂作《上林赋》。武帝大喜，封之为郎，侍从武帝左右。后来任中郎将，曾出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对沟通汉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做出了贡献。晚年免官闲居，郁郁而卒。《汉书·艺文志》载他有赋29篇，现存6篇，即《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和《哀秦二世赋》。其中《子虚赋》和《上林赋》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也是汉赋兴盛时期的代表作品。

《子虚》和《上林》两赋不作于同一时期，但内容联贯，形式相同，实为一篇。《史记》、《汉书》均作为一篇，萧统《文选》始分为两篇。两赋是以子虚、乌有先生、无是公这三个虚拟人物之间的相互辩诘来展开叙事的。

《子虚赋》写楚国子虚在齐国乌有先生面前夸赞楚国云梦之大、物产之丰和楚王田猎的盛况，乌有先生则驳难子虚之言，把齐国夸耀一番。如关于云梦的铺写：

“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峩郁，隆崇■率，岑峩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黄白垺，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光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琅琕瑀。城功玄厉，礧石碨跖。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茝若射干，芎蒭菖蒲，江篱蘼芜，诸柘巴苴。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陁靡，案衍坛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则生葳■苞荔，薛莎青蘋。其卑湿则生藏蓂蒹葭，东蔷雕胡，莲藕菰芦，菴■轩芋。众物居之，不可胜图。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发芙蓉菱华，内隐巨石白沙。其中则神龟蛟鼉，鼉瑁鼈鼉。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榧栲豫樟，桂椒木兰，檟离朱杨，楂梨棗栗，橘柚芬芳。其上

则有赤猿獬豸，鵄M 孔鸾，腾远射干。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蜿蜒猖狂。兕象野犀，穷奇猥狔。”只写了一个云梦，就上上下下极力铺陈了这么多，把云梦的山川环境、自然风物绘声绘色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令人向往。但铺陈形容也未免有些过分。

《上林赋》写无是公听了子虚和乌有的对话，嘲笑他们是井蛙之见，而盛赞汉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及天子射猎的盛举，以压倒楚齐，表明诸侯之事不足为道。其中描写天子游猎后的庆功宴会的气派：“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虞，建翠华之旗，树灵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这类描写充分显示了汉王朝的气魄和声威。文章一浪高过一浪，形成了壮阔的气势。最后，归结到节俭，反对奢侈淫靡，用以讽谏。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概括此赋为：“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借此三人为辞，以推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节俭，用以讽谏。”

这两篇赋从艺术上讲，结构宏大，场面壮观，词采华美，文笔飞扬，气势充沛，波澜壮阔。但也往往铺陈过分，夸张失实，而且用字冷僻，堆砌词藻，艰涩难读，这就多少削弱了感人的艺术力量。

司马相如的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强大的汉帝国的面貌，多少表现了当时统治者的一种发扬蹈厉的精神，奠定了汉赋的格局。其后的赋家多半陈陈相因，缺乏创造性。鲁迅说相如“制作虽甚迟缓，而不师故辙，自攄妙才，广博宏丽，卓绝汉代”。

（3）东方朔扬雄

东方朔（公元前154—前93年），字曼倩，平原厌次（山东惠民）人。西汉文学家。性诙谐滑稽，善辞赋。《史记》把他列入《滑稽列传》。《汉书·艺文志》把他列入杂家。汉武帝即位之初，他上书自荐，武帝令其待诏公车，后任常侍郎、太中大夫等职。他言辞敏捷，性格诙谐，常在汉武帝面前调笑取乐，被视为俳优。但常常“观察颜色，直言切谏”。他曾上书反对武帝修造上林苑。文章《谏除上林苑》指出了武帝大造宫殿、大开猎场的错误与危害。由于武帝把他当作俳优看待，他在政治上始终不受重用，故作散文赋《答客难》发泄牢骚。

《答客难》以主客问答的方式，揭露封建帝王不尊重人才，抒写作者怀才莫展的苦闷，诙谐讽刺，颇能代表他的个性。其中说：“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这些话道出了有才之士不得不听任权势随意安排自己命运的苦衷，很形象地表现了封建帝王对人才的玩弄，话里话外都带着刺和牢骚。

《答客难》言辞激切，略带幽默感，寓庄于谐。文风放浪，气势逼人，是东方朔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文章。

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字子云，成都人。西汉末年最著名的辞赋家。他少而好学，博览群书，极好司马相如的赋。汉成帝时，有人推荐他的文章似司马相如，被召入宫中，侍从成帝祭祀游猎，作了《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和《河东赋》4篇大赋，歌颂皇帝的功德和汉朝的声威。

扬雄口吃，不能畅谈，默而好沉思，心胸淡泊，无心仕进，历成、哀、平三世，官不过黄门郎。他埋头著述，在哲学与语言学方面都有突出贡献。扬雄的赋据《汉书·艺文志》载有12篇。除铺叙祭祀游猎的大赋外，还有《解嘲》、《解难》、《逐贫》和《酒箴》等抒怀的散文赋和状物小赋。其赋作最为著名的是《甘泉赋》。

《甘泉赋》是扬雄随汉成帝郊祀甘泉宫归还后所作。他把天下郊祀铺写得雄伟壮阔又飘飘欲仙：“流星旄以电烛兮，咸翠盖而鸾旗。敦万骑于中营兮，方玉车之千乘。声騑隐以陆离兮，轻先疾雷而服遗风。”并颂扬汉王朝“辉光眩耀，隆厥福兮，子子孙孙，长无极兮”。

扬雄的辞赋虽有模仿前人之处，但也有独特的面貌，含讽之意较多。晚年，他对赋有新的认识。他在《法言·吾子》中写道：“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尔曰：壮夫不为也。或问：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扬雄认为辞赋是“童子雕虫篆刻”，是小孩子堆砌文字的玩意，“壮夫不为也”。他认为当时的赋“极丽靡之辞，宏侈巨衍，竟于使人不能加也，即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很少起到讽谏的作用，指出了汉赋的根本弱点。他把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作品称为“诗人之赋”，把宋玉以后赋家的作品称为“辞人之赋”。他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看法，认为前者意存讽谏，而后者则虚滥侈靡。他要求辞赋合于讽谕的正道，这种文学观点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4）东汉的抒情小赋

东汉时期，汉代叙事大赋已走近尾声，抒情小赋逐渐兴起。这些抒情小赋，代表着东汉辞赋的发展趋向，在辞赋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张衡就是这样一位承前启后的辞赋家。

张衡（公元78—139年），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人。中国古代伟大的科学家和文学家。他博通群书，曾任太史令、河间相、尚书等官职。他创造了世界上第一架利用铜壶滴漏带动的浑天仪和第一台测定地震方位的地动仪。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和赋两方面。著名的《四愁诗》，对后来七言诗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最著名的赋篇是《二京赋》和《归田赋》。

《二京赋》模仿《子虚赋》和《两都赋》，体制宏伟，铺叙夸张，被称为京都大赋的“长篇之极轨”。但它在描述社会风俗、表现都市生活方面有些新的突破。赋中对统治者进行了讽刺批评，规劝统治者要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表现出作者对封建统治的危机深感忧虑。这些都非司马相如、班固的作品所可以比拟。张衡的叙事大赋可以说是对汉大赋的一个总结。

《归田赋》是一篇抒情小赋。作者借想象中的归田之乐，抒写了仕不得志的愤懑感情。作者开头写自己离京归田的原因：

“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徙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谅天道之微昧，追渔夫以同嬉；超尘埃以遐■，与世事乎长辞。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鸕鶒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嚶嚶。于焉逍遥，聊以娱情。”作者入世已久，而与世不合，愿归于田园。中间写隐居山林田园的乐趣：

“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落云间之逸禽，悬渊沉之魑魍。”作者用清新的语言写出了春日田园景物的美妙，抒发了自己归田后的恬淡心情。末尾写纵心物外、忘怀荣辱的人生态度：

“于是曜灵俄景，系以望舒，极般游之至乐，记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作者对世事已经厌恶，只想过一种恬淡的生活。作品虽有一些消极情绪，但表现了作者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精神。

《归田赋》全篇 211 个字，形式短小，抒情言志，文辞清丽，朴实感人，毫无铺采虚夸堆砌之习，是东汉抒情小赋的代表作，为辞赋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

赵壹，汉末人，字元叔，汉阳西县（今甘肃天水）人。东汉辞赋家。他恃才傲物，狂荡不羁，终身位不过郡吏，遭乡党世俗排斥，屡陷于罪。他的代表作品是《刺世疾邪赋》和《穷鸟赋》。

《刺世疾邪赋》指责邪恶腐败的世态。他揭露统治阶级“宁计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和“佞谄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刑，姬名势，抚拍豪强”的丑恶。面对丑恶的现实，作者愤慨地表示：“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乘理虽亡而非亡，违义虽生而匪存。”作品揭露和抒情融为一体，感情激烈，语势短促有力，篇幅短小，在汉赋中别具一格。《穷鸟赋》借物言志，抒写了对汉末凶险恐怖的黑暗政局的忧愤。

蔡邕（公元 132—192 年），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汉末颇负盛名的文学家。年少博学，喜好辞章、数术、天文、书法，精通音律。灵帝时召拜郎中，迁议郎。因上书论朝政阙失，遭诬陷流放朔方。遇赦后，正值汉末大乱，亡命江湖十余年。董卓专权，被迫出仕。董卓被诛后，被捕死于狱中。著诗、赋、碑、诔、铭等凡 104 篇。其中的《叙行赋》记述赴京途中的见闻和感受，借古讽今，抨击了汉末腐败的政治，表现了对人民疾苦的同情。

（5）东汉的文人五言诗

五言诗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主要形式。汉代受乐府民歌的影响，文人创作的五言诗开始出现。

最早的文人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但“质木无文”，艺术性不高。此后，有张衡的《同声歌》，词采绮丽，表达技巧有一定的进步。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日趋成熟，艺术成就最高的是辛延年的《羽林郎》和宋子侯的《董娇饶》，表现技术成熟。另外，还有许多无名氏的五言诗流传下来，以梁代萧统《文选》中收入的《古诗十九首》最具代表性。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大多是地位低下、怀才不遇的文人，诗歌主要写别情、宦情。游子出门既久，思乡思家思妇之情油然而生，如《客从远方来》：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奇。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这里的游子思妇之辞写得哀艳缠绵，含蓄有味。还有《行行重行行》、《迢迢牵

牛星》、《明月何皎皎》等，都充满了怀人相思之情。

士人远游的目的，是为了：“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轲轲长苦辛。”（《今日良宴会》）当他们游宦四方，饱尝世态炎凉，宦情不如意时，不免愤愤不平地慨叹：“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好手，弃我如遗迹。”（《明月皎夜光》）他们既然流落江湖，也就有了知己难遇的牢骚，如《西北有高楼》：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希。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全诗通过知音难觅的特定情景来抒发落寞失意的心情，如梦如幻，幽怨悲凉。

《古诗十九首》所反映的社会内容比较贫乏单调，但真实地反映了一部分文人的思想感情，也曲折地反映了汉末动乱的部分社会现实，其艺术成就是很高的。钟嵘评价它：“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它把叙事、写景、抒情融为一体，自然、浑厚、真挚，语言浅近精炼，生动妥贴，在中国五言诗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魏晋南北朝和唐人的诗歌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

5. 汉代乐府民歌

（1）汉乐府民歌的采集

乐府是古代音乐机构的名称，乐即音乐，府即官府。乐府早在秦时已出现了，秦出土的编钟上刻有篆书“乐府”二字。乐府见诸文字的最早记载是在汉初。《汉书·礼乐志》说：“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乐府令是掌太乐（郊庙朝会的贵族乐歌）的乐官。到汉武帝时，扩大了乐府机构，于太乐官署之外，另立掌管俗乐、采集民歌入乐的乐府官署。“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汉代乐府的职能，一是组织文人作词配曲，演习排练歌舞，供皇帝以及有关部门的需要。当时主要是把文人所作的歌功颂德的诗赋配上乐谱。二是组织人到各地采集民歌。这些民歌主要反映了各地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这是它不同于后代的一个最大特点。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这里说采诗的目的是为了考察民情，当然，也是为了宫廷娱乐。这在客观上起了保存民歌的作用，使民歌得以记录保存、流传后世。

汉代采集的民歌，《艺文志》所著录的共138篇，这是西汉的民歌，东汉的尚不在内。采集的范围遍及黄河、长江流域，比周代采诗要广泛得多。

宋人郭茂倩编辑的《乐府诗集》，是保存乐府诗最完备的一部总集，共100卷，辑录汉魏至唐五代的乐府歌辞及先秦至唐末歌谣，分乐府诗为12类。汉乐府民歌主要收录在“鼓吹曲辞”、“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中。

（2）汉乐府民歌的思想内容

现存的汉代乐府民歌 40 余篇。这些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多方面地反映了汉代人民的生活、思想、情绪和愿望，极为深刻地揭示了汉代社会生活的种种矛盾，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和高度的思想性。

汉乐府民歌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残暴，反映了劳动人民遭受压迫、剥削的苦难和反抗。如《妇病行》，通过一个家庭的悲惨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剥削的罪恶：

“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撻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乱曰：抱时无衣，襦复无里。闭门塞牖，舍孤儿到市。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这是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的缩影。

《平陵东》通过义公被劫的事件深刻地揭露了汉代贪官污吏像土匪一样掠夺人民的事实：

“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劫义公，在高堂下，交钱百万两走马。两走马，亦诚难，顾见追吏心中恻。心中恻，血出漉，归告我家卖黄犊。”官吏劫人勒索，逼得被害之家卖掉小牛凑钱赎人。《东门行》则表现了贫苦人民的饥寒交迫、走上反抗道路的过程：“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反映了汉代社会矛盾的尖锐激化。

汉乐府民歌还反映了战争和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如《战城南》：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凉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这里真实地再现了一场激战后战场上留下的悲惨情景，字里行间，凝结着阵亡士卒的血和泪，充满了人民对战争的诅咒，笼罩着一种悲烈惨痛的气氛。《十五从军行》描写了一个老兵 15 岁从军出征直到 80 岁才得回家的悲惨遭遇：

“十五从军行，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乐向望，泪落沾我衣。”诗歌反映了战争给人民造成的家破人亡。战争和徭役是分不开的，战争的负担全都落在劳动人民身上，特别是兵役制度，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读之催人泪下。

汉乐府民歌，还有以妇女的爱情和婚姻为题材的诗歌，这些诗歌唱美好的爱情，也反映了对封建礼教和婚姻制度的反抗，如《有所思》和《上邪》：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妃呼豨’，秋风肃肃晨风颭东方须臾高知之。”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汉乐府民歌情诗很少，这两首为古代情诗中的杰作。《有所思》是女子相思之词，全诗皆自述口吻。当她听到男方有点变心，一怒之下把准备赠送给他的“双珠玳瑁簪”烧毁了，并“当风扬其

《有所思》。

《上邪》。

灰”，以示决绝之心。而回忆起过去初恋时的情景，又相思难舍。《上邪》是一个痴情女子对爱人的热烈表白，她发誓永远相亲相爱，这是多么坚贞、多么火热的爱情！有人认为这两首诗原是一诗，被分割应用了，这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们把两诗的首尾蝉联，会发现两语相接，如出一口，非常自然。全诗激情洋溢，风格奔放，对后世民歌影响很大。

民歌中更多的还是弃妇和怨女的悲诉与抗议，如《上山采蘼芜》：

“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跑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敌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阁去。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这是弃妇对喜新厌旧的“故夫”提出的责难。诗中的弃妇勤劳、善良、柔顺，但还是被抛弃了。通过“故夫”自己的表白揭示了他的卑鄙自私，喜新厌旧。至于那个相形见绌的“新人”，其命运比“故人”好吗？

反映妇女的痛苦，最杰出的诗篇是《孔雀东南飞》，它是汉乐府叙事诗发展的高峰。它深刻而巨大的社会意义，在于通过焦仲卿、刘兰芝的婚姻悲剧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热烈地歌颂了刘兰芝夫妇为了忠于爱情宁死不屈地反抗封建邪恶势力的斗争精神，表达了广人民争取婚姻自由的必胜信念。作品以动人心弦的力量，两千年来一直激励着青年男女为争取幸福婚姻所展开斗争。

（3）汉乐府民歌的艺术成就及影响

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思想内容极其丰富，反映了非常广泛的社会生活。其创作方法和艺术形式也是变化无穷、不拘一格，有着很高的艺术成就。

汉乐府民歌叙事描写细致生动，善于抓取典型的细节表现场面和人物的思想。《诗经》中的“氓”、“谷风”等虽有某些叙事成分，但主要是抒情形式，缺乏完整的人物和情节。而汉乐府民歌最大、最基本的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孔雀东南飞》是古代民间叙事诗中最杰出的篇章，代表了汉乐府民歌艺术成就的最高峰，被明代王世贞称为“长诗之圣”。这首诗以白描的手法，刻画出刘兰芝、焦仲卿、焦母、刘兄等几个极其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作者描写了刘兰芝聪明美丽、勤劳能干、知书达礼：她“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着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作者既写出她有教养的一面，又突出地写出她当机立断、不向恶势力示弱、不为荣华富贵所动的倔强的一面。在“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的迫害下，她毫不示弱退让，宁愿背着“不顺父母”的恶名，也不肯在焦家过这种奴隶般的屈辱生活。因此，她毅然主动向仲卿提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非常镇定地面对不幸的命运。当阿兄逼嫁时，他知道在娘家也呆不下去了，便在“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初定”的深夜，从容不迫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正是这种倔强性格和不妥协精神，使刘兰芝成为古代文学中光辉的妇女形象之一。焦仲卿虽然性格比较软弱，但也走上了反抗的道路：“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焦母、刘兄是封建礼教和宗法势力的代表，虽着墨不多，但其狰狞可恶，已跃然纸上。

汉乐府民歌叙事描写细致生动，有些尽管篇幅很短，却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一幅轻松愉悦的劳作场面像一幅水墨画一样跃然纸上，活现出江南水手的勃勃生机。

汉乐府乐歌语言清新活泼，形式自由多样，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如《陌上桑》，写的是一个太守戏弄采桑女子而遭严词拒绝的故事。诗歌先写采桑女罗敷的美貌，又写罗敷路遇太守使君。当使君垂涎罗敷的美貌、仗势要与她一起坐车回去时，遭到了罗敷的断然拒绝：“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回答的合情入理，柔中有刚，义正辞严，表现了罗敷的纯朴正直和对权贵的蔑视。但怎样摆脱使君的纠缠呢？聪明的罗敷盛夸夫婿：

“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皙，鬢鬢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罗敷用夸夫的妙计、虚拟的方式向使君描绘出一个官居要职、春风得意的夫婿形象。喜剧在充满胜利快感的哄笑中结束了，而把使君如何自惭形秽、狼狈而去的丑态留给读者去想象。通过对罗敷语言和行动的叙述，表现了罗敷机智、勇敢的性格和不甘受辱的高贵品质。《上山采靡芜》、《妇病行》的对话也很成功，语言朴素精炼，个性鲜明。

《诗经》主要是以四言为主，汉乐府民歌对四言、五言以及各种杂言的形式都做了尝试，没有固定的章法、句法，长短随意，整散不拘。汉乐府民歌是现实主义的精确描绘，但也有一些作品运用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如《上邪》中那如山洪爆发似的激烈的高度夸张，《陌上桑》中的罗敷的理想形象，《孔雀东南飞》中写刘兰芝与焦仲卿合葬后墓上的松柏、梧桐如同有情似的枝叶交合等，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浪漫主义色彩。

汉乐府民歌对后世文学的发展影响极为深刻，它直接继承、发扬了由《诗经》开创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承上启下，引导着后世诗人们走反映社会生活现实的诗歌创作道路。从曹氏父子到李白、杜甫，到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无一不是学习汉乐府反映社会现实、反映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精神。汉代乐府民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长期哺育着后代文学家，使他们从中吸取了极其丰富的创作思想和艺术养料。

五、中国魏晋南北朝文学

1.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滋长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起自汉末董卓之乱（公元 190 年）到隋代统一（公元 589 年），历时约 400 年。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处于长期分裂和动荡不安的状态。由于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南北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北方民族的迁徙杂居，加速了各族封建化的过程，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局面，为隋唐的强盛奠定了基础。在西方，地跨欧、亚、非的罗马帝国开始由盛而衰，公元 395 年分裂为东、西罗马帝国。公元 476 年西罗马帝国瓦解，标志着西欧奴隶制的瓦解和封建制的出现。统治中亚和印度大部分地区的贵霜帝国，也从 3 世纪开始衰落，分别为萨珊波斯王朝和笈多王朝所取代。

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基础，东汉政权名存实亡。从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 190 年）董卓之乱开始，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扩张了军事力量的豪强军阀纷纷拥兵割据，进行了长期的混战，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割据的军阀中，曹操广招人才，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政策，因而发展了生产，壮大了力量，逐步统一了北方。建安二十五年（公元 220 年），曹操死，曹丕代汉为魏文帝，分据东南、西南地区的孙权、刘备也相继称号建国，形成了魏、吴、蜀三国鼎立的局面。公元 264 年，魏灭蜀。265 年，司马炎代魏，建立了西晋王朝。太康元年（公元 280 年），西晋灭吴，至此，从汉末动乱了近百年的中国获得了统一，出现了太康年间的繁荣。但西晋王朝是代表士族大地主利益的腐朽政权，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导致了“八王之乱”（公元 291—306 年），使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西晋社会内部潜伏的各种矛盾迅速激化。西北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贵族又纷纷入侵，永嘉五年（公元 311 年），晋怀帝被俘，西晋王朝覆亡，中国又进入了南北长期分裂的时代。

公元 317 年，司马睿在建业（今南京市）称帝，建立了东晋王朝。它是西晋腐朽的士族特权政治的继续。士族阶级在雄厚的物质基础上，过着苟安享乐的生活，各种现实矛盾继续发展。公元 420 年，刘裕代晋自立，东晋灭亡。从刘裕代晋到公元 589 年隋统一，南方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史称南朝。南朝继续东晋的偏安局面，社会秩序比北朝安定，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在中国北方广大地区，西晋亡后，进入了五朝十六国时期，各族统治者不断互相攻杀兼并，混战了 100 多年，使中原的经济和文化再次遭到惨重的破坏。公元 440 年，北魏拓跋焘统一了北方。其后，北魏又分裂为东魏、西魏，后来又分别为北齐、北周所代替。公元 581 年，杨坚代北周称帝，589 年灭陈，建立了统一的隋帝国，结束了南北朝分裂的局面。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随着社会的动荡、时局的变化，社会思想和文学都有重大变化。汉代自武帝以来儒学独尊的局面已经瓦解，封建阶级的一些传统的思想学说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思想界呈现出复杂纷纭的局面。建安年间，曹操等人师商、韩之法术，刑名之说风行一时，同时道家思想也逐渐抬头。曹魏末年，经过五弼、何晏、嵇康、阮籍等人的倡导，老庄学说盛行，并形成政治倾向不同的流派。到了晋代，玄学大盛。玄学是道家虚无思想恶性发展的结果，并与当时流行的佛教、道教合流，成为这一

时期社会思想的主流。封建门阀士族阶层形成了享乐主义、纵欲主义的腐朽的人生观。这种社会思潮和习俗，一直蔓延到整个南北朝时期，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南北朝时期，北方各族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热衷于利用汉族的封建文化，推尊儒学，儒家思想占有相当的地位，与南朝的情况有别。统治者又利用佛教麻痹人民，因而佛教大盛。

魏晋南北朝文学丰富多彩，文采风流，诗赋盛行。既有继承汉乐府现实主义传统的文学，又有以新的审美观进行的创作，也出现了文学批评专著，文学进入自觉的时代。

建安文学是这一时期文人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潮，曹操、曹植、“七子”和女诗人蔡琰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建安文学的独特风格被后世称之为“建安风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始文学的代表作家是嵇康、阮籍，虽然与“建安风骨”一脉相承，但因处于政治恐怖时期，其作品内容和表现手法与建安时期有很大不同，带有更多的老庄思想的色彩。西晋太康时期的文学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以陆机、潘岳为代表的多数作家的作品社会内容贫乏，偏重雕章琢句。只有左思、刘琨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创作出反映社会现实的一些诗篇。西晋末年至东晋时期，玄言诗、游仙诗泛滥成灾，直到东晋末杰出的诗人陶渊明的出现，才给窒息的东晋文坛带来光明和生机。陶渊明的诗表现了对腐朽的士族社会的极端憎恶，反映了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的高尚品质和归隐田园的怡然情趣，独具风格，对后世诗歌产生了巨大影响。南朝宋初，谢灵运写出了大量的山水诗，开创了山水诗一派，齐时的谢朓继承和发展了谢灵运的山水诗。宋代的鲍照继承和发扬了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写了大量的乐府诗，抨击士族门阀制度，反映社会生活，成为当时代表进步倾向的优秀诗人。他的七言和杂言乐府诗改进了七言诗的形式，对七言诗的发展有重要贡献。齐梁时出现了“永明体”，开创了中国近体诗发展的时代。梁陈时代，流行反映贵族宫廷荒淫生活的宫廷诗。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南北朝时期骈文畸形繁荣，只有在历史和地理之类的学术著作中，散文有一定的发展，散文作品有《后汉书》、《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等。南北朝乐府民歌则绚丽多彩。南朝民歌清丽婉转，多写男女爱情。北朝民歌粗犷刚健，内容充实，《木兰诗》是其中杰出的代表。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志怪小说以干宝的《搜神记》成就最高，轶事小说集大成之作是《世说新语》。这一时期，文学批评获得了空前的成就。曹丕的《典论·论文》对文学创作全面地提出了新的观点、准则、尺度，开创了文学批评的风气。陆机的《文赋》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系统而完整的论文学创作的文章。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是两部系统的文学批评巨著，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发展达到了高峰，对后世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萧统的《文选》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选集，为后人研究文学史提供了便利。

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很不平衡。在建安时期，北方比南方兴盛；在两晋时期，西晋比东晋兴盛；在南北朝时期，南朝比北朝兴盛。南北文学还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点，南方比较华美柔婉，北方则以刚健质朴为特色。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上承先秦两汉、下启隋唐的一个重要阶段。

2. 建安文学

建安（公元 196—220 年）是汉献帝刘协的年号，文学史所指建安时期则指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 190 年）到魏明帝太和年间（公元 233 年）。

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作家众多，其中以“三曹”、“七子”和蔡琰为代表。他们大多亲身经历了汉末的社会动乱，饱受忧患，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有深刻的感受。而且他们在政治上有一定抱负，具有统一天下、安定社会的理想与渴望，希望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有所作为。他们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在作品中反映社会现实，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壮志，具有梗概多气、慷慨悲凉的风格特征。

建安文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诗歌创作空前活跃，普遍采用了新兴的五言形式，奠定了五言诗在文坛上的坚固地位。汉代那种铺张堆砌的大赋消沉了，具有浓厚诗意的抒情小赋方兴未艾。散文则趋于自由通脱，文学批评风气开始出现。因此，建安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辉煌灿烂的时期。

（1）曹操 曹丕

曹操（公元 155—220 年），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其父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他 20 岁举孝廉为郎，历任洛阳北部尉、济南相等职。他在镇压黄巾起义中逐步扩充了军事力量，建安元年（公元 196 年）迎汉献帝都于许昌，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击败袁绍，统一北方，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建安十三年（公元 208 年）进位丞相，二十一年（公元 216 年）封魏王，死后其子曹丕称帝，追尊为魏武帝。曹操对结束汉末以来军阀长期混战的局面、促进国家的统一一起过重要作用，又以自己富有创造性的作品开创了文学上的新风气，是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

曹操现存乐府诗 20 余首，较完整的散文 40 多篇。他御军三十余年，“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他用乐府古题自创新诗，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表现出一位政治家的博大胸襟和深刻眼光。

曹操的部分诗作反映了汉末的战乱和民生的疾苦。如《苦寒行》是征讨袁绍之甥高幹时所作，诗中非常生动地描写了在冰天雪地中山路行军的艰苦；《却东门行》写征夫怀乡；《薤露行》写董卓乱政，反映了对动乱中苦难人民的同情；其广为传诵的《蒿里行》，描写了各地军阀以讨伐董卓为名，争权夺利，自相残杀，暴露了军阀混战的罪恶，反映了人民离乱死亡的真实情况：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踳蹢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些诗篇苍凉凄楚，形象鲜明，都是当时战乱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曹操还有不少表现自己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和积极进取精神的诗篇，如《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诗中辽阔壮观的画面，展示了诗人的雄伟气魄和广阔的胸怀，吟诵之际，使人感受到这位盖世英雄心中那股叱咤风云的豪迈气概。

此外，曹操的《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显示了志士不甘衰老的奋发向上的胸怀，内蕴着一股自强不息的豪迈气概，给人以积极进取的启迪，是千古传诵的名句。又如另一篇《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诗人以“对酒当歌”这种貌似颓放的意态来表现对人生哲理的严肃思考和及时进取的精神，酣畅淋漓地抒写出诗人慷慨不平的心曲和渴慕贤士的情意，表现了诗人志欲统一天下、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格调高远，慷慨悲凉。

曹操的诗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语言质朴自然，风格健康明朗。他那拯世济物、统一天下的宏伟抱负，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关心国事的慷慨激情，以及壮志难酬的低沉悲凉的情调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极具慷慨悲壮之气概，体现了“建安风骨”的文风和特点。

曹丕（公元187—226年），字子桓，曹操次子。三国魏著名文学家。建安十六年为五官中郎将，二十二年立为魏太子，二十五年（公元220年）代汉帝自立，改国号为魏，史称魏文帝。在位7年，竭力提倡文学，与当代著名文人宴饮唱和，往来密切，政治上没有什么大的作为。曹丕生活的主要时期是赤壁之战奠定了天下三分的局势之后，生活环境相对安定。因此，他虽然也有一些作品反映了军旅生活的艰辛，流露出对人民的同情，但是内容远不及父亲的深刻、丰富，也没有那种古直苍凉的气韵。现存诗歌40余首，其中比较出色的是描写男女爱情和离别愁恨的作品，以《燕歌行》第一首最为著名：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这首诗描写一位女子在秋夜里对丈夫的思念，把她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细腻委婉地表现出来，语言清丽，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它比张衡的《四愁诗》明显地消除了“兮”字的影响，跨入七言的篇首，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此外，还有《杂诗》、《清河作》、《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等诗也较为出色。

曹丕的散文成就较高，他著有《典论》一书，全书已不传，现存较完整的只有《自叙》和《论文》两篇。《自叙》善于叙事，其中有一些生活琐事描写。《论文》是我国现存第一篇文学批评的专论，主要内容是明确文学的重要地位在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鼓励作家自觉地进行创作；提出文学批评的正确态度，反对文人相轻，并用“审己以度人”的态度分别指出了建安七子在各体文章创作上的长处和短处；指出文体四科各有特点，风格也应不同：“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这就为各体文章的创作和批评找到了一个初步的客观标准。而“诗赋欲丽”一点，更显示了建

安文学渐向词采华丽发展的新风尚；提出作者气质不同，文章应有作者自己的特色。《典论·论文》开了文学批评的风气，对于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曹植

曹植（公元192—232年），字子建，曹操之子，曹丕之弟。建安时期最杰出的文学家。曾封为陈王，死后谥曰思，故世称陈思王。他才华出众，深得曹操的赏识与宠爱，曾欲立为太子。曹丕称帝后，他受到猜忌和迫害，屡遭贬爵、改换封地。曾多次上书请求任用，终未如愿，忧郁而死。这种生活悲剧，对他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曹植今存诗歌80余首，较完整的词赋、散文40多篇。

曹植的文学创作活动，以曹丕即帝位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曹植早年随父南征北战，有着远大的抱负和强烈的建功立业的事业心。他前期的诗歌主要是表现追求政治理想、向往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如《白马篇》：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迎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诗人以浓墨重彩描绘了一位爱国志士渴望卫国立功不惜壮烈牺牲的英雄形象，抒发了自己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感情炽热，语言华美，风格雄放，乐观豪迈。

曹植后期的作品，表现了他壮志难酬的愤激不平之情，揭露了封建统治集团的矛盾，控诉了曹丕父子对他的迫害。以《杂诗》和《赠白马王彪》为代表。他曾在《杂诗》第五首中写道：

“仆夫早严驾，吾行将远游。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将骋万里途，东路安足游？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写这首诗的时候，诗人正要辞别洛阳，东归封地鄄城。然而他的心向往着南征东吴、实现统一天下的壮志，情愿为国家的忧患而赴汤蹈火，可曹丕对他进行压制，只能在家闲居。全诗情调悲壮，希望有所作为的急切心情溢于言表。曹植当时的处境和心情，正像传说曹丕曾命他七步成诗，不成则被杀一样：“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又如《赠白马王彪》中写道：

“玄黄犹能进，我思郁以纆。郁纆将何念？亲爱在离居。本图相与偕，中更不克俱。鴟枭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欲还绝无蹊，揽辔上蜘蹰。”

“心悲动我神，弃置莫复陈。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何必同衾帟，然后展殷勤。忧思成疾疢，无乃儿女仁。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这是诗人后期的代表作品。当时诗人和白马王曹彪、任城王曹彰去京师朝会，任城王到京后不久就不明不白地死去了，诗人与白马王返回封地时，曹丕的爪牙又不准他们同行，于是诗人“愤而成篇”，写下了这首赠诗。全诗共分七章，表达了诗人对任城王暴亡的深沉悼念和对曹丕迫害兄弟的愤怒斥责，吐露了自己处境险恶、朝不保夕的不安心情，客观

上深刻暴露了统治阶级内部萁豆相煎的残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全诗情感悲怆而笔力刚朗，有浓郁的民歌风味，很能代表建安诗歌的特色，是文学史上颇负盛名的长篇抒情诗。

曹植也有少数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诗篇，如《送应氏》描绘了洛阳破败、荒芜的景象：

“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这首诗是诗人随父西征马超，路过洛阳，送别应瑒、应璩兄弟而作，真实地反映出洛阳残破的社会面貌，满目萧瑟，沉痛悲凉，特具风力。又如《泰山梁甫吟》，真实地描写了海边人民的困苦生活：“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野。妻子像禽兽，行止依林阻。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诗人对人民寄予着一定的同情。

曹植还写了一些较出色的情诗，如《七哀诗》，借思妇的哀怨，曲折地吐露诗人在政治上遭受打击后的怨愤心情：“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暗吐出思君报国的衷肠，流露出愤慨、凄惶之感。又如《美女篇》，是曹植脍炙人口的代表作之一：

“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叶落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借问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客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媒氏何所营，玉帛不时安？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诗人用绚丽的词藻铺写美女的形神风貌，借咏美女盛时不嫁、独处闺中的不幸遭遇来抒发自己不能施展才干的抑郁心情。语言华美，意致委婉，被后人视为“汉魏压卷”之作。

曹植的散文和赋也不乏佳作，他的《与杨祖德书》、《求自试表》，都是后世传诵的名篇。他的《洛神赋》，是赋中的名作。这篇赋受到了宋玉《神女赋》的启发，通过幻想的方式描写了一个人神恋爱的悲剧。赋中先用大量篇幅描写洛神宓妃的容貌、姿态和装束，其中写首：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作者把洛神轻盈飘忽的形态描写得栩栩如生，使人仿佛看到她正凌波渡水而来。然后写到诗人的爱慕之情和洛神的感动。最后写洛神含恨赠珰而去，诗人缠绵悱恻，怀着一颗破碎的心踏上了征途：“浮长川而忘返，思绵绵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露繁露而至曙。命仆夫而就驾，吾将归乎东路。”这篇赋抒发了作者在政治上受压抑、壮志难酬的苦闷忧愤，想象丰富，词采流丽，抒情意味很浓，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曹植是建安时期创作五言诗最多的作家，对五言古诗的发展贡献突出。他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其作品个性表现之充分、鲜明和强烈，是在屈原以后和陶渊明以前所仅见的。他是建安文学的杰出代表，钟嵘称之为“建安之杰”，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引自《诗品》。

引自《诗品》。

（3）建安七子和蔡琰

除了“三曹”外，“建安七子”也是建安时期的主要作家。“七子”之称出于曹丕的《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璉，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孔融（公元153—208年），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孔子20世孙。汉末文学家。“七子”中，他年辈最长。曾任北海（今山东寿光）相，世称孔北海。曹操召为将作大匠，又迁少府。他性情刚正，直言敢谏，在政治上比较保守，反对曹操，终于被曹操所杀。孔融以文章见长，辞藻华丽，气势雄放，有较多的骈俪气息，代表作是《论盛孝章书》。盛孝章是江东名士，遭孙策忌恨，处境危险。孔融与盛孝章交好，便写了这封书信请求曹操营救。文章简练典重，动之以情，喻之以理。曹操读罢，便让汉献帝下诏征召盛孝章，可惜诏书还没到，盛孝章已被杀了。

“七子”除孔融外，其余六人都依附于曹氏父子，想做一番事业。他们大都经历战乱，其作品反映了社会动乱和人民所受的灾难，抒写了个人的抱负和遭遇，表现了建功立业的精神，生动深刻，颇为感人。“七子”的代表是王粲。

王粲（公元177—217年），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汉末著名文学家。他出身世家，少有文名，被著名学者蔡邕称为“异才”。17岁时避难荆州依刘表，未被重用。后归曹操，任丞相掾，赐爵关内侯。官至魏国侍中。“七子”中，他的文学成就最高。刘勰说：“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王粲诗赋的数量几乎等于其他6人的总和。他的《七哀诗》、《从军诗》、《登楼赋》等，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是汉末社会动乱现实的写照。如《七哀诗》第一首：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人妇，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泣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这首诗记录了诗人由长安避乱赴荆州时途中所见所思。诗人用通俗的语言，描绘了军阀混战造成的人民流离失所、饥饿死亡的悲惨景象，苍凉悲慨，凄哀动人，表现出作者对人民的深切同情。

王粲还长于辞赋。他寄居荆州时所作的《登楼赋》，是抒情小赋中的名篇。赋中表达了他对故乡的思念，感叹战乱不休，年华易逝，渴望时世清明，天下一统，具有积极的进取精神。

陈琳（公元？—217年）以书檄驰名。他的《为袁绍檄豫州》，劝刘备归附袁绍，不要依赖曹操。文中痛诋曹操及其先世的败德，有纵横家之声势。曹操苦于头风病发，卧读陈琳书檄，翕然而愈，可见陈琳笔力之犀利。袁绍失败后，他归附曹操，曹操爱其才而用之。陈琳诗作仅存4首，但其《饮马长城窟行》一诗却脍炙人口：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

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这首诗用对话的方式，从筑城卒与妻室的书信对答中，反映了修筑长城的劳役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长城窟下，水寒伤骨，死人众多，筑城卒已无生还的希望。他不希望心爱的妻子耽误青春，催她再嫁。而妻子对丈夫忠贞不渝，表示既然丈夫难以存活，自己也决心以死殉情。全诗充满了身家破灭的悲痛，其中“生男慎莫举”四句，乃是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血泪之语，极为沉痛酸楚。封建时代，本来重男轻女，诗中却说生男不要去养活他，生女要用肉去喂养她，可见人民对繁重的徭役兵役的愤恨。杜甫受到陈琳这首诗的启发，在《兵车行》中写道：“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陈琳的这首诗五七言杂用，通篇7次换韵，以叙事纪言的乐府体式来反映民间疾苦，声调铿锵，文情并茂，在建安诗坛一枝独秀，为后来杜甫、白居易等诗人所继承和发展。

阮瑀（公元？—212年）也以书檄驰名。他的《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文，文笔流畅，很具感染力。他的《驾出北郭门行》诗，写孤儿为后母所虐待，颇有社会意义。刘桢（公元？—217年）则以诗歌见长，其代表作有《赠从弟》三首。钟嵘在《诗品》中把刘桢列在上品，称他的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徐干有《室思诗》6首，其中写道：“思君如流水，何时穷已时”，“寄身虽在远，岂忘君须臾”，语言流畅，情深意长。应瑒（公元？—217年）有《别诗》2首，写征夫悲怀，感情真切。“七子”的创作虽各有特色，但反映社会现实、抒发理想抱负、情调慷慨悲凉则是其共同特点。

建安时期唯一的女诗人是蔡琰。蔡琰，字文姬，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蔡邕之女。她博学多才，精通音律，一生的遭遇非常不幸。幼年时曾随被陷害获罪的父亲度过一段流亡生活，后来嫁给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而回母家寡居。在汉末大乱中又为胡人所掳，滞留南匈奴12年，嫁给胡人左贤王，生有2子。后为曹操赎回，再嫁陈留董祀。她的作品有3篇流传，《悲愤诗》五言、骚体各一篇，《胡笳十八拍》一篇。能确定不是他人伪托的，只有五言的《悲愤诗》。

五言《悲愤诗》是自传体作品，真实地叙述了诗人在汉末军阀混战中的悲惨遭遇，反映了广大人民共同的苦难。诗中描绘出“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血淋淋画面，并记叙了诗人被掳途中的遭遇：“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敢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捶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诗人滞留边塞，时刻思念着故乡的亲人：“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幸而被赎归来，却又要与亲生骨肉离别：

“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诗中写出了母子离别的沉痛心情，达到了全诗的高潮。回到故乡后，只见：

“城廓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复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故乡在战乱后面目全非，深沉吞咽的悲痛更觉凄凉。结尾写诗人曾遭流离，现在“托命于新人”，嫁给董卓，总担心受人轻视而被抛弃，“怀忧终年岁”，写出心灵的隐痛。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首文人五言长篇叙事诗，长达540字，具有史诗般的体制和浓郁的时代气息。诗中凝结着诗人的屈辱和心酸，血泪交流，真情倾泻，是建安文学中的一篇传世佳作，在中国现实主义诗歌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

建安时期文学创作上的繁荣和建安作家们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及文学创作上的现实主义的特色，被后来的文学家誉为“建安风骨”，并当作宝贵的文学传统加以珍视，看作是评价文学作品好坏、成就高低的标准。“建安风骨”的传统对后世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3. 正始文学与太康文学

(1) 正始文学

继建安文学之后是正始文学。正始（公元240—249年）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这一时期，曹魏政权逐渐削弱，代表士族大地主利益的司马氏集团逐渐掌握了魏国的军政大权，与曹魏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异常尖锐激烈，政治非常黑暗，社会思潮发生了重要变化。

在极端恐怖的政治局面下，文人大多接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借以逃避现实，或任性放达，用曲折的方式来反抗黑暗现实。顾炎武说：“至正始之际，而一二浮诞之徒，骋其智识，蔑周、孔之书，习老、庄之教，风俗又为之一变。”当时这种思想的代表是“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任诞篇》说：“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比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玕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竹林名士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跟“建安七子”有所不同。他们崇尚老庄，蔑视礼法，寄情于山水，饮酒放荡，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拒绝与司马氏合作。在文学上，以阮籍、嵇康的成就最大。

阮籍（公元210—263年），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三国魏著名诗人。阮瑀之子。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他“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曾登广武山观看楚汉古战场，感慨道：“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他生不逢时，虽有济世之志，不仅抱负无由施展，自身的安全也没有保障，于是他转而崇尚老庄，对黑暗的现实采取了一种消极反抗的态度，饮酒昏酣，遗落世事，做出种种狂态，是当时著名的不拘礼法的人物。

阮籍尽管在行动上佯狂不羁，内心却非常痛苦。史载他“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他把现实生活中无由发泄的内心痛苦与愤懑，在诗歌中用隐约曲折的形式倾泻出来，这就是著名的82首五言《咏怀诗》。这些诗真实地表现了诗人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如第一首：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

《日知录》卷十三。

《晋书·阮籍传》。

《晋书·阮籍传》。

鵙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诗人在黑暗中看不到任何希望，只有“忧思独伤心”，表现了在黑暗现实里诗人的抱负和壮志难酬的苦闷。又如他对势利之徒和虚伪礼教讥道：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罄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淡，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诗人把封建统治者的虚伪丑恶描绘得淋漓尽致。司马氏集团正是以这样严肃正经的举止来掩饰其荒淫腐朽的生活。这是诗人不甘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的表现，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

阮籍的散文《大人先生传》，虚构了一个抗世傲俗、超然独往、与道合一的大人先生形象，对封建社会作出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讽刺那些循规蹈矩的礼法之士不过是藏在裤缝中的虱子。文章言辞辛辣，韵文与散文间杂，风格独特。

嵇康（公元223—262年），字叔夜，谯郡铨（今安徽宿县）人，三国魏著名文学家。做过中散大夫，也称“嵇中散”。少时孤贫，聪慧博学，多才多艺。他崇尚老庄，恬静寡欲，却又刚肠疾恶，锋芒毕露。他反对司马氏为篡权所推行的虚伪礼教，公开发表“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言论，拒绝与司马氏合作。《晋书·嵇康传》记载，嵇康和向秀一起在大树下打铁，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来拜访。嵇康不理睬他，钟会走时，嵇康冷冷地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从此，钟会深恨嵇康，不断向司马昭进谗言。因为嵇康触犯了司马氏集团的利益，妻子又是曹魏宗室之女，所以，最终被司马氏以“乱群惑众”的罪名杀害了。这显示了司马氏集团的卑鄙狠毒，也表现了嵇康不向邪恶势力屈服的高贵品格。

嵇康的诗今存50首，以四言诗为主。他的诗在感情上和阮籍一样，也是在当时恐怖政局下曲折复杂感情的反映，但艺术成就较之阮籍则略见逊色。他的《赠秀才入军》18首，抒写了诗人纵心自然的情怀，其中第14首写道：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酒会诗》表现了一种清逸脱俗的境界，其中的“淡淡流水，沦胥而逝；汎汎柏舟，载浮载滞”，是传诵一时的名句。《幽愤诗》揭示了生活在黑暗现实中正直文人的悲剧结局，是诗人痛恨人生的经验总结：“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时恭默，咎悔不生。”

嵇康的四言诗能够脱出《诗经》的藩篱，抒写自己的生活实感，具有清淡高远的特色，但也具有浓厚的老庄思想色彩，对后来诗歌的玄言化有影响。

嵇康还擅长散文，《与山巨源绝交书》是他的一篇著名的散文。山涛字巨源，本为“竹林七贤”之一，后投靠司马氏任尚书吏部郎。他推荐嵇康来代替自己的职务，嵇康认为是奇耻大辱，写了这封信与山涛绝交。他说：“人伦有礼，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他的“必不堪者七”，是表示蔑视虚伪礼教，“甚不可者二”，更是公然对抗朝廷法制。这篇散文自始至终贯串着对司马氏腐朽统治的决绝态度。他把山涛荐他做官比做是“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羶腥”，极尽辛辣讽刺之能事。并表示如果司马氏要强迫他做官，他就会像野性难驯的麋鹿，“狂顾顿缨，赴汤蹈火”，拼死相抗。而贯注在整个书信中的乃是他崇尚自然的精神。全文嘻笑怒骂，锋利洒脱，很能表现他峻急刚烈的性格。他的另

一些散文如《声无哀乐论》、《管蔡论》等，都能独抒新见。所以鲁迅先生说嵇康的论文“思想新颖”，并辑有《嵇康集》。

正始文学与建安文学有明显的不同，它具有浓厚的老庄思想色彩，但其主要倾向是抨击黑暗政治，仍然反映了社会现实，基本精神还是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

（2）太康文学

西晋初期，全国统一，政局比较稳定。晋武帝太康（公元280—289年）年间，社会呈现出暂时的繁荣景象，“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业而乐其事”。就在这昙花一现的繁荣景象里，文学史上也继建安文学之后出现了一个比较兴盛的短暂时期。当时文坛上有三张（载、协、亢）、二陆（机、云）、两潘（岳、尼）、一左（思）等一批作家。太康文学与建安、正始文学比较，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文学作品的社会内容贫乏，追求形式的倾向比较严重。“采缁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陆机、潘岳是太康诗风的代表作家。这一时期，只有左思、刘琨等个别作家在文学上表现了突出的成就。

陆机 潘岳。陆机（公元261—303年），字士衡，吴郡吴（今江苏苏州）人。西晋著名文学家。曾任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吴丞相陆逊之孙，吴大司马陆抗之子。吴亡后入洛阳，成为太康文坛最著名的作家，被后人誉为“太康之英”。成都王司马颖讨伐长沙王，任他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兵败被杀。

陆机的诗注意追求词藻和对偶，具有繁富之美，但由于文饰过分，往往流于堆砌呆板，繁冗乏力，内容贫乏，缺少新意。只有少数作品比较真切自然，如《赴洛道中》其二：

“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振策陟崇丘，案辔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顿辔倚嵩岩，侧听悲风响。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这首诗是诗人在太康十年应诏赴洛阳时写成的，比较形象地写出了诗人去国远行途中内心纷扰的忧思和对前程的重重顾虑，对偶工整，词藻精美。

陆机的文与赋的成就高于诗歌，如《豪士赋序》、《吊魏武帝文》，表现出豪迈而又凄婉的风致。《演连珠》假喻设譬，颇含讽议之义，文字工整，具有浓厚的骈丽气息。《文赋》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系统而完整的论文学创作的文章，主要内容之一是论证文学创作的过程，细致地论述从构思到谋篇及如何运用想象等问题；二是探讨立意修辞等问题；三是在曹丕所分文体四科的基础上又区分文体为十类，并说明其不同的要求。《文赋》对当世和后代文学创作及文学理论的发展，都有积极的影响。

潘岳（公元247—300年），字安仁，荥阳中牟（今河南中牟县）人。西晋著名文学家。少以才慧知名，乡邑称为奇童。早举秀才，十年未得官。后历任河阳令、怀县令、太傅主簿、著作郎、散骑侍郎、给事黄门侍郎等职。与石崇等谄事贵戚贾谧，为贾谧“二十四友”之首，因赵王伦亲信陷害被杀。

《晋书·食货志》。

《文心雕龙·明诗》。

他工于诗赋，与陆机齐名，后人有“陆才如海，潘才如江”的赞语。他的诗与陆机一样，缺乏深厚的内容，铺叙过多，但词采华艳，感情真挚，比陆诗显得明净流畅。

潘岳的代表作是《悼亡诗》三首，其一云：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g 倏恭朝命，回心反初役。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帷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恍如或存，周遑忉惊惕。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春风缘隙来，震雷承檐滴。寢息何时忘，沉忧日盈积。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这是诗人哀悼亡妻而作的，道出了物是人非、哀痛无尽的深情。《晋书》说他“辞藻艳丽，尤善为哀诔之文”。后人受潘岳影响，写哀悼亡妻的诗也都用“悼亡”为题。

潘岳的《怀旧赋》、《寡妇赋》、《哀永逝文》等都以善叙哀情著称，文辞凄切。《秋兴赋》、《闲居赋》则意境清幽。

左思 刘琨。左思（公元250？—305年？），字太冲，齐国临淄（今山东临淄）人。西晋最有成就的诗人。他出身寒门，父亲曾做小吏，妹左棻有才名，被晋武帝诏选入宫，全家迁居京师洛阳。左思官秘书郎。晋惠帝时，曾追随贾谧，为“二十四友”之一。后隐居不仕，专意于典籍。他曾构思10年，写成《三都赋》，显名当时，豪贵之家，竞相抄传，致使洛阳纸贵。

左思的作品保持了建安文学的传统，具有比较充实的社会内容，在当时那种模拟因袭、雕饰词藻的形式主义诗风盛行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其代表作是《咏史》诗八首。

《咏史》诗借古人古事抒发情怀，表达了建功立业的抱负，反映了寒门知识分子与士族门阀制度的矛盾。诗人对门阀制度进行了揭露和抨击，如《咏史》第二首：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躋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诗中以山上的细草居然荫蔽了涧底松的比喻，揭露了门阀社会的不合理，形象地揭示出土族子弟“躋高位”、有志寒士“沉下僚”的社会现象，愤怒地抗议门阀制度对人才的压制，具有很强的思想感染力量。左思所创造的“涧底松”这一艺术形象，扣动了后世不少文人的心弦。唐朝王勃曾写过《涧底寒松赋》来抒发怀才不遇的苦闷心情。

左思志高才雄，胸怀旷迈，富有反抗精神。他的《咏史》诗笔力矫健，气势充沛，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的特色。其艺术风格苍凉浑厚，不事雕琢，在西晋文坛上独树一帜，《诗品》誉为“左思风力”。左思继承和发扬了“建安风骨”的传统，给后世诗人良好的影响。沈德潜称赞说：“太冲胸次高旷，而笔力又复雄迈，陶冶汉魏，自制伟词，故是一代作手，岂潘、陆辈所能比埒！”

刘琨（公元270—317年），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县）人。是西晋略后于左思的有成就的爱国诗人。出身士族，年少有诗名。与石崇、陆

钟嵘：《诗品》。

《古诗源》卷七。

机、潘岳等以文章事权贵贾谧，为“二十四友”之一。历任著作郎、尚书左丞、司徒左长史等职，封广武侯。早年生活放荡，西晋末年在尖锐的民族矛盾中成为有名的爱国志士。他和祖逖闻鸡起舞的故事为后人所称道。永嘉元年为并州刺史，以后又都督并、幽、蓟三州军事。在外敌入侵、士大夫仓皇南渡之际，他留在北方辗转抗敌，屡经挫败，却锲而不舍。最后因军事失利，投奔幽州刺史段匹𢆆，竟被段杀害。刘琨的爱国事迹历来被人们所称道，宋代爱国诗人陆游曾写道：“刘琨死后无奇士，独听荒鸡泪满衣。”

刘琨今存诗歌3首，为《扶风歌》、《答卢谌》、《重赠卢谌》，都反映了保卫中原的战斗生活。其中有名的《扶风歌》是诗人赴任并州刺史途中所写：

“朝发广莫门，暮宿丹水山。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顾瞻望宫阙，俯仰御飞轩。据鞍长太息，泪下如流泉。系马长松下，发鞍高岳头。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挥手长相谢，哽咽不能言。浮云为我结，归鸟为我旋。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麋鹿游我前，猿猴戏我侧。资粮既乏尽，薇蕨安可食？揽辔命徒侣，吟啸绝岩中。君子道微矣，夫子固有穷。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弃置勿重陈，重陈令心伤。”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对京城的眷恋、旅途的艰困及对事业前途的忧虑。诗中洋溢着忧国伤时的感情，用李陵的典故揭露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腐朽，抒发了抗敌御侮的爱国至诚以及英雄末路的满腔悲愤。诗风慷慨悲壮，与曹操有相似之处。《诗品》称其“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

西晋末年，玄言诗兴起。这种诗以阐述老庄哲理为宗旨，“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能够在这种诗风中“变创其体”的诗人是郭璞。郭璞（公元276—324年）博学多才，代表作是《游仙诗》14首，借“列仙之趣”来抒写现实人生的感慨。其特点是借助形象阐述玄理，并未脱离玄言诗的范畴。从西晋末至东晋，玄言诗流风达百年之久。

4. 陶渊明

东晋时期，士族清谈老庄玄言的风气比西晋更盛。自西晋末年至东晋初年刘琨、郭璞以后的近百年时间里，玄言文学风靡文坛，没有出现真正有成就的大家。直到东晋末年，出现了一位反清谈玄理、作品富有现实内容的田园诗人陶渊明，才给窒息的文坛带来生气和光明。

（1）陶渊明的生平

陶渊明（公元365—427年），一名潜，字元亮，世号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东晋伟大诗人。曾祖陶侃曾官至大司马，祖父和父亲也做过太守、县令一类的官。到他时，家境已经没落。

陶渊明自幼接受老庄和儒家两方面的思想影响，29岁以前过着躬耕、读书的生活，从小养成了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由于受家庭和儒经的影响，他年轻时对统治阶级抱有幻想，有大济苍生之志。但他出身于没落的士族家庭，少时孤贫，得不到社会的重视。他生活在东晋末年、晋宋易代的大动乱时期，

社会黑暗腐败，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都十分尖锐。在这种政治局面下，他的进步的政治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陶渊明 29 岁出仕，任江州祭酒。因不满官场污浊，遂辞官归去。后来又作过参军一类的小官。他的个性与污浊的官场格格不入，因此每次出仕的时间都不长。39 岁那年，由于生活艰难，他开始参加农业劳动。41 岁出任彭泽令。当郡督邮来县时，吏属告诉他应该束带相迎，他叹道：“我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便解职归田，在官仅 80 余日。他认识到腐朽的社会现实，大济苍生的理想无从实现，又不甘与恶浊的社会同流合污，于是一直在出仕与归隐之间徘徊，在几度出仕之后，于 41 岁时弃官归隐，从此步入躬耕生活，直到 63 岁逝世。

陶渊明不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洁身守志，情趣高尚。他归隐田园后，参加了一些农业劳动，有机会接触农民，对农民的思想感情有了一些体会，这对以后的创作起了积极作用。

（2）陶渊明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陶渊明的作品今存诗歌 126 首，辞赋、散文 12 篇。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是诗歌，可分为田园诗和咏怀、咏史诗两大类。

最能代表陶渊明的创作特色和艺术成就的是田园诗。田园诗按其内容可分为三方面。有表现农村恬美的景色和归隐后悠然自得的心境和生活的，如《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诗人远离了污浊的现实，回到悠然自得的生活中，感到获得了归宿，心境自由而恬静。又如《归园田居》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诗人描绘出一幅典型的田园风光，庆幸自己终于冲破“尘网”、“樊笼”，复得返自然，表现了他对丑恶社会的鄙视和重返故乡的喜悦。

田园诗也有歌颂农业劳动、抒发诗人躬耕感受的，如《归园田居》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由于诗人亲自参加了农业劳动，改变了剥削阶级鄙视劳动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劳动的价值，也在劳动中对农民产生了亲切的感情，劳动才第一次在文人创作中得到充分的歌颂。诗人劳作了一天，虽然辛苦，但内心却很充实，企望庄稼取得好收成。随着生活的日渐贫困，陶渊明更多地参加了劳动。他在《于西田获早稻》中写道：“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田家难道就不觉得辛苦吗？只是没有办法摆脱这种艰苦的劳作罢了。诗人道出了劳动的艰辛和生活的不易，这种体会显然比“带月荷锄归”要深刻得多了。

田园诗还有反映农村的凋蔽和自己生活的困窘的，如《庞主簿邓治中》：

“炎人屡焚如，螟蛾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夏日干旱，又遭虫灾，收割季节，风雨纵横，从诗中可以看出农村的困苦的状况。诗中描述了诗人晚年每逢天

灾不免屡受饥寒的境遇。诗人归田初期那种悠然闲散的生活不见了，而是对劳动有了深切的感受。也正是在这种贫困劳顿中使诗人的认识提高了，他不再说早期说过的“民生不勤，勤则不匮”以及“力耕不吾欺”的话了，而是真正体验到“躬身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粱。御冬足大布，粗絺以应阳。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这时，他“倾壶绝余沥，闢灶不见烟。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早期那种“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的闲情逸致也一扫而光了。这是真诚可贵的。

陶渊明的咏怀、咏史诗继承阮籍、左思的传统，表达了他“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的苦闷，借咏贫士安贫守贱曲折地暴露了社会现实的黑暗，表达了自己不慕荣利、甘于淡泊的情怀。陶渊明在诗歌中也流露出一些消极思想和颓唐无奈的情绪。

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开辟了田园诗这块艺术园地。他的田园诗题材广、数量多、描写深刻，其基本风格是平淡自然。“惟陶靖节不宗古体，不习新语，而真率自然，则自为一源也，然已兆唐体矣。”他的创作内容主要是农村平淡的田园风光，所描写的生活景物都是农村的日常生活，普普通通，而出自诗人的笔下却又耐人寻味。如“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话极平常，事极常见，“沛然自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斧凿痕”。但自有一种真纯的美蕴涵其中。写雪景“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看似平淡，却匠心独具。他的诗在使人接触到田园生活画面的同时，而引入到一种境界中去。在他诗中出现的方宅茅舍、远村近烟、鸡鸣狗吠这一类宁静安祥的画面，无一不经过诗人生活理想的洗涤，无一不反射着诗人的希望和情趣，无一不含有极不平凡的思想意境。它们潜移默化，使人们感到亲切，又感到崇高。苏轼说：“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其奇趣。”他的诗由于内容不同，风格也不尽相同。田园诗平淡自然，咏史诗却豪放有力，抒写了诗人的满腔悲愤和抗争。所以龚自珍说：“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诗品》说他的诗“又协左思风力”。

陶渊明在经历了长期劳动和日益贫困的生活之后，向往着理想世界。他的《桃花源诗并记》就是诗人晚年在田园诗内容上的新发展，标志着诗人思想发展的新境界。陶渊明的文章中最为传诵的是《桃花源记》，这是一篇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都很高的散文，诗人在这里提出了“桃花源”的社会理想，全文如下：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

许学夷：《诗源辩体》。

《冷斋夜话》，引李格非语。

太元（公元376—396年），东晋孝武帝的年号。

武陵，在今湖南常德县一带。

要：通“邀”。

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桃花源记》不过 300 多字，却生动地展现了“桃花源”理想社会的生活图景。这里，没有战乱，没有剥削，人人劳动，大家都过着和平富庶的生活，令人悠然神往。诗人深沉的希望和失望，都通过渔人的奇遇细腻的表现出来了。这是诗人田园生活中理想因素的集中和概括，是代表小私有生产者对造成战乱和贫困的封建社会所提出的抗议，它反映了广大农民希望用自己的劳动创造和平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它虽然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但却启发人们认识封建社会的黑暗，鼓舞人们反抗社会弊端的斗争。这篇散文笔法疏淡，语言隽永，脍炙人口，备受后人推崇。王维、韩愈、刘禹锡、王安石等均以“桃花源”为题写过诗，抒发自己的社会理想。

（3）陶渊明对后世的影响

陶渊明的诗在玄言诗统治文坛的当时，并未能震动贵族文坛，他对后世的影响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扩大的。南朝梁时钟嵘《诗品》将他列为中品。到了唐代，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方得到承认。唐以后，他在文学史上发生了深广的影响。从李白、杜甫、白居易，到苏轼、辛弃疾、陆游，直到晚清的黄遵宪，都十分推崇他，并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影响。

陶渊明是魏晋南北朝最有成就的诗人，他不为当时风尚所囿，独能以清新的诗歌打破玄言诗的统治。他的咏怀、咏史诗，发扬建安文学的精神，继承阮籍、左思的传统，使后世重新确认了他的价值，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应有的重要地位。

他开创了田园诗派，为诗歌创作开辟了新的天地。他的田园诗和稍后的谢灵运的山水诗一起，改变了玄言诗统治文坛的局面，有力地推动了文学的发展，唐代的王维、孟浩然等就是在学陶的基础上形成各自的创作风貌的。后世有成就的诗人极少不受到他的艺术熏陶和对他表示推崇的，如唐代大诗人李白曾用“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的诗句来表示自己的仰慕之情；杜甫也说：“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陆游自云“我诗慕渊明”；黄遵宪以陶有“结庐在人境”的诗句，名其诗集为《人境庐诗草》，可见陶渊明诗歌的艺术风格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陶渊明对后人的思想影响也很深远，他蔑视权贵、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气节和高洁不群、光明坦荡的人格，给后世作家以良好的榜样。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傲岸性格，便与陶渊明一脉相通。宋代苏轼将陶诗抄录自勉，在晚年尤觉“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大思想家朱熹也对陶渊明的文章道德极其崇拜，自称“平生尚友陶彭泽，未肯轻为折腰客”。陶渊明的“桃花源”理想也给后人以深刻的启示，鼓励着人们去追求自由、和平的生活。但他的有些作品流露了人生无常、乐天安命的消极思想，也产生了不良好影响。

刘子骥：刘驥之，字子骥，东晋南阳人，隐居不仕，爱游山水。

5. 南北朝诗歌

西晋末年以来，黄河流域兵荒马乱，社会经济文化遭到严重破坏，具有传统文化修养的士大夫大多数集中在较安定的江南一隅，因此，整个南北朝时期，江南成为全国文化的中心。南北朝诗歌的主要成就是南朝宋齐时代谢灵运、谢朓的山水诗和鲍照的乐府诗。梁陈时代宫体诗流行，形式主义诗风泛滥。北朝文人诗坛自庾信由南入北后才有了一点生机。

（1）“二谢”和山水诗

南朝宋代谢灵运是山水诗的开创人，齐代谢朓继承并发展了山水诗，他们二人又是同族，故世称“二谢”，谢灵运为“大谢”，谢朓为“小谢”。

谢灵运（公元385—433年），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世居会稽（今浙江绍兴）。南朝宋著名诗人。出身门阀世家，东晋名将谢玄孙。幼年笃志好学，博览群书。18岁袭封康乐公，世称“谢康乐”。在世族豪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谢家与刘裕矛盾尖锐。刘裕灭东晋建宋，逐渐压抑世族，排斥异己。先降谢灵运公爵为侯爵，任散骑常侍。少帝时贬为永嘉太守。后以谋反罪遭杀于广州。

谢灵运在政治上失意，心怀愤恨，便肆意游山玩水，将其精神寄托于对山水的纵情游赏，并以富艳的才华描绘出奇秀的山水状貌，给人以豪迈的启迪和美的享受。他大量创作山水诗，开辟了山水诗一派，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以山水为题材进行大量创作的诗人。

谢灵运的山水诗大部分写在任永嘉太守以后，语言富丽精工，写景、抒情结合自然，如《登池上楼》：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幽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诗人先写仕途的失意，又写登楼眺望宜人的春色，“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两句自然清丽，最后抒写了意欲归隐的心情。全诗通篇对偶，着意雕琢，正是当时骈俪文风的体现。又如《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

诗人用洗练的笔法描绘了薄暮时分的湖山景致，精美而不失自然。鲍照称赞谢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但结尾依然残留玄言诗的痕迹，表明这一时期的山水诗还没有彻底清除玄言诗的影响，在艺术上也不够成熟。

谢灵运的作品不乏秀句，但少佳篇，也有过于雕琢的毛病，但对玄言诗是一个进步。像“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入彭蠡湖口》）；“泽兰渐被径，芙蓉始发池”（《游南亭》）；“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岁暮》）；“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登江中孤屿》）等，都是历代传诵的佳句。他用华丽精工的语言描绘自然景色，表现了他“极貌写物”、“穷力追新”的艺术追求。

谢灵运的山水诗打破了东晋玄言诗的一统天下，扩大了诗歌的题材，丰

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技巧。后来的诗人如南朝的谢朓、唐朝的王维、孟浩然等都受其影响，相继创作出许多优美的山水诗篇。

谢朓（公元464—499年），字玄晖，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南朝齐著名诗人。曾任宣城太守，故又有“谢宣城”之称。少好学，有美名。曾在随王萧子隆、竟王萧子良幕下任功曹、文学等职，深得赏识，为“竟陵八友”之一。明帝时任中书郎，官至尚书吏部郎。后为人陷害，死于狱中。

谢朓的诗歌继承了谢灵运的山水诗风，不过风格更加清新流丽了。他的作品中最出色的是那些描写山水风景的作品，如他的名篇《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灞浐望长安，河阳视京县。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霰。有情知望乡，谁能鬢不变？”诗中描绘了春江日暮景色。“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两句为历代所传诵。

谢朓的山水诗也和谢灵运一样，“有句无篇”，脍炙人口的佳句特别多，如“远树暖阡阡，生烟纷漠漠。鱼戏新荷动，鸟散馀花落”（《游东田》）；“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宣城郡内登望》）；“余雪映青山，寒雾开白日。暧暧江村见，离离海树出”（《高斋视事》）。这些诗句，很像一幅幅萧疏淡远的水墨画，平淡而又富有思致，特别清新自然。李白称赞他说：“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

谢朓的新体诗中，还有模仿南朝乐府民歌而写的小诗，尤为著名。如《玉阶怨》：“夕殿下珠帘，流萤飞复息。长夜缝罗衣，思君此何极？”描写思妇在深夜怀着无尽的情思缝制罗衣，语言精练，情味隽永，艺术上比乐府民歌有所提高。谢朓的新体诗，对唐代律诗、绝句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南齐永明（公元483—493年）年间，沈约、谢朓等诗人把当时声韵学研究的成果运用于诗歌创作中，写下了大批讲究声律和对偶、形式短小的诗篇，被称为“永明体”。这种新体诗便是我国格律诗产生的开端，从此开始了我国诗歌史上由古体诗到近体诗的转变时期。谢朓是永明体诗人的代表。

（2）鲍照

鲍照（公元414？—466年），字明远，东海（今江苏涟水县）人。南朝宋杰出诗人。他出身寒族，少有文学才情。因献诗临川王刘义庆得到赏识，擢为国侍郎，后曾任秣陵令、中书舍人。临海王刘诞镇荆州，任为前军参军，故世称“鲍参军”。后子诞谋反赐死，他为乱兵所杀。他是代表南朝文学最高成就的作家。

鲍照现存诗作约200多首，乐府诗有80多首。他继承和发扬了汉魏乐府民歌的传统精神，描写广泛的社会内容。《拟行路难》18首是他的代表作，主要抨击士族门阀制度，如第四首：

“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这里，含蓄地抨击了门阀制度对人才的压抑，倾吐了寒士忍辱偷生的愁苦和义愤。此愁深重绵远，郁积不散，时刻压在诗人心上。诗人才高气盛，反遭忌恨，壮士失意，只有仰天长叹。

鲍照的乐府诗大多直抒胸臆，也有的妙用比喻，如《梅花落》：

“中庭杂树多，偏为梅咨嗟。问君何独然？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摇荡春风媚春日，念尔零落逐寒风，徒有霜华无霜质。”诗中赞美了梅花不畏霜露的坚贞品格，借梅花来赞美坚贞正直之士，他们像梅花一样经得起严霜的考验，而那些没有节操的人则像满庭杂树，虽斗艳于春日，却零落于寒风，徒有其表。诗歌言短意长，是鲍照的传世名篇之一。

鲍照的诗歌，反映了广阔的生活画面，语言精朗雄健，气势俊逸奔放，格调刚健清新，显示出卓越的艺术价值。他的七言诗隔句用韵，为七言诗的发展开拓了更广阔的道路。

（3）庾信

庾信（公元513—581年），字子山，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县）人。南北朝末年最重要的诗人。梁著名宫廷文人庾肩吾之子。初仕梁，曾任御史中丞、右卫将军。42岁出使西魏，值西魏灭梁，不得返国，被留在长安，屈仕西魏，累迁仪同三司。后又仕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世称“庾开府”。他虽居高官，心情也非常痛苦。后来陈朝请求北周放他回国，北周因爱惜他的文才不肯放还，终于老死北周。

北朝的文人诗坛一直比较冷落，直到庾信由南入北，才给北朝诗坛带来转机。庾信羁留北方，痛苦的生活经历使他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感慨身世，倾诉故国之思，并有一些描写边塞的诗。他的代表作品是《拟咏怀》27首，主要抒写了他对身世的感伤和对故国家乡的思念和沉痛的心情，如第七首：

“榆关断音信，汉使绝经过。胡笳落泪曲，羌笛断肠歌。纤腰减束素，别泪损横波。恨心终不歇，红颜无复多。枯木期填海，青山望断河。”这首诗意蕴丰厚，感情深沉，将诗人羁居异域不得南归的痛苦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尤其“青山望断河”句，思乡情切，令人不忍卒读。诗人感叹“秋风苏武别，寒水送荆轲。谁言气盖世，晨起帐中歌”。以李陵、苏武、荆轲、项羽自喻，心情沉痛。这种苍劲悲凉，委婉刚健的诗风，显然是独树一帜的。

庾信一方面把南朝诗歌的艺术技巧带到北方，一方面又吸收了北方文化的刚健淳朴之气，唾弃了南朝诗歌的浮艳柔靡。他初步融合了南北诗风，是南北朝最后一个优秀诗人，也是唐诗的先驱。杜甫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杨慎云：“庾信之诗，为梁之冠绝，启唐之先鞭。”

6. 南北朝乐府民歌

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民歌又一次大放异彩的时代。由于南北朝的长期对峙，南北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差异很大，南北朝民歌在内容和形式上各具特色。它们不但反映了社会现实，而且在艺术上也有创新。

（1）南朝乐府民歌

《戏为六绝句》其一。

《咏怀古迹》其一。

《升庵诗话》卷九。

南朝乐府民歌以《清商曲辞》中的“吴声歌”和“西曲歌”为主，约 500 首。此外，《杂曲歌辞》和《杂曲谣辞》中也各有少数几首。“吴声歌”产生于当时首都建业（今南京一带），“西曲歌”产生于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一带。自东晋偏安江南以来，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得到很大发展，商业发达，城市繁荣，社会比较安宁。“凡百户之乡，布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南朝乐府民歌就是在这种柔媚轻曼的风尚中流行起来的。

现存的南朝乐府民歌与汉乐府民歌比较，内容显得狭窄、单调，多数是比较健康的情歌，也有一些情调低级、庸俗的东西。主要原因一是因为这些民歌并不是来自农村，而是来自长江流域的繁华都邑，主要反映当时都市里中下层人民的生活情趣。二是统治阶级有意识的采集。南朝的封建统治者，多是苟安江南、生活圈狭窄、追求声色享乐的腐朽人物。他们大多爱好民间的风情小调，而且自己能弹唱。在这种情况下，乐府机关采集的自然几乎全是“郎哥妙意曲，依亦吐芳词”的情歌。这些情歌多出自商贾、船户、妓女、婢妾之口，它们从各个角度细致地刻画了爱情生活中的离合悲欢，无不真挚感人，如：

“春蚕不应老，昼夜常怀丝，何惜微躯尽，缠绵自有时。”——《作蚕丝》

“打杀长鸣鸣，弹去乌臼鸟。愿得连冥不复曙，一年都一晓。”——《读曲歌》

“依作北辰星，千年无转移。欢行白日心，朝东暮复西。”——《子夜歌》

“杂曲歌辞”中的抒情长诗《西洲曲》，是代表南朝乐府民歌艺术最高成就的诗篇：

“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日暮伯劳飞，风吹乌臼树。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杆头。栏杆十二曲，垂手明如玉。卷帘天自高，海水摇空绿。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南北知我意，吹梦到西洲。”全诗描写的是一个少女对她旅居江北的爱人的一年四季的相思之情，从语言的提炼和诗的情调上看，是经过文人润饰的。诗中并没有出现春夏秋冬等字样，而只是通过“折梅”、“采莲”、“望飞鸿”等一些带有季节特征的景物来逐步转换时序。全篇将人物置于活动的环境之中，步步深入地抒发了她思念情郎而不得的曲折、深沉的情绪。此诗多次采用谐音双关的手法，比喻“莲子”谐“怜子”，“莲心”谐“怜心”，使诗歌显得含蓄委婉。又运用了民歌惯用的“接字”法，首尾相衔，加强了诗的节奏美。结句“南北知我意，吹梦到西洲”，涉想新奇，余味无穷。全诗构成了一幅色调鲜明柔媚的画，使人对这个少女追求幸福生活的急切、怅望情态深感同情。无疑，《西洲曲》是南朝乐府民歌中在艺术形式上最成熟、最精巧的诗篇。

（2）北朝乐府民歌

北朝乐府民歌以《乐府诗集》所载“梁鼓角横吹曲”为主，现存约 60

多首。“鼓角横吹曲”是北方民族马上演奏的、乐器有鼓有角的军乐，输入齐梁后，梁朝乐府机构录存，因冠以“梁”字，后世沿用，故谓“梁鼓角横吹曲”。此外，有少数收入《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

北朝时期，北方各少数民族入据中原，北方长期处于大分裂、大动乱中。北朝乐府民歌全面而生动地反映了北朝 200 多年间的社会现实，战斗性较强，具有雄健勇武的气概和豪迈率直的情感，形成了与南方不同的色彩。如堪称千古绝唱的鲜卑族民歌《敕勒川》：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种辽阔苍茫的草原景象，是北方独有的伟大的自然景象，又是北方经济生产的独有形态，比起南方的民歌来完全是两个天地。

北朝乐府民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有反映北方各民族遭受战乱和流离之苦的，如：

“兄在城中弟在外，弓无弦，箭无栝，食粮乏尽若为活？救我来！救我来！”（《隔谷歌》）

“烧火烧野田，野鸭飞上天。童男娶寡妇，壮女哭杀人。”（《紫骝马歌辞》）

“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企喻歌》）

这些民歌以愤怒的笔调，控诉了战争的罪恶，反映了人民大量死于战争的现实。

北朝乐府民歌中，反映贫富对立、贵族对人民的压榨的也不少，如：

“快马常苦瘦，剿儿常苦贫。黄禾起羸马，有钱始作人。”（《幽州马客吟》）

“雨雪霏霏雀劳利，长嘴饱满短嘴饥。”（《雀劳利》）

有反映北方民族勇武精神的，如：

“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跋黄尘下，然后别雄雌。”（《折杨柳歌》）

“男儿欲作健，结伴何须多。鸛子经天飞，群雀两向波。”（《企喻歌》）

也有反映爱情生活的，如：

“谁家女子脂行步，反著袂裌后裙露。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媼。”（《捉搦歌》）

“肃肃河中育，育熟须含黄。独坐空房中，思我百媚郎。”（《淳于王歌》）

北朝乐府民歌艺术成就最高的要属叙事长诗《木兰辞》，全文如下：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贴，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鞴，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朝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

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

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诗歌叙述了女英雄木兰乔装替父从军的故事。木兰是一个勤劳普通的织布姑娘，在战争到来时，她毅然改扮男装，替父从军。她万里纵横，十年征战，屡建战功。凯旋归来后，功成不受赏，只愿重返故乡。当她“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时，战将们才惊讶地发现这个功勋卓著的“壮士”是位女郎。原作以戏剧性的构思塑造了一个英勇善战、意志坚强、向往和平、纯朴高尚的女英雄形象。从木兰从军的故事中可以看到劳动人民勇于牺牲的爱国精神和对和平生活的向往。木兰的英雄行为突破了“女不如男”的封建传统观点，也是对男尊女卑的封建观念的猛烈冲击。千百年来木兰从军的故事家喻户晓，这位压倒须眉的巾帼英雄一直为人们所传颂。

《木兰诗》和《孔雀东南飞》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它们异曲同工，先后辉映。《木兰诗》叙事生动，语言丰富多彩，运用了复叠和排比的铺张手法，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复叠最精彩的是“爷娘闻女来”一段，活泼明快的节奏，可使读者和主人公一起共享胜利的喜悦。繁简得当又是该诗的一大特色。繁则极繁，如开头写木兰的问答和买马的情节都很详繁，这种夸张铺叙渲污了人物的紧张心情和战争气氛。简则极简，十年征战，艰苦备尝，只用“万里赴戎机”等6句30字就包举无遗。诗的结尾用雄雌兔作比喻，不仅表现了民歌特有的活泼幽默，而且传达出劳动妇女独有的纯朴感情，耐人寻味。木兰既是现实人物，又是人民理想的化身。《木兰诗》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优秀诗篇。

在艺术形式上，南朝乐府民歌最突出的特点是体裁短小，多是五言四句，而《诗经》和汉乐府民歌的篇幅大都比较长。其次是语言清新自然，情致宛转，“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第三是双关隐语的广泛运用，增加了表情的委婉含蓄。北朝乐府民歌内容丰富，语言质朴无华，感情率真坦荡，风格豪放刚健，体裁形式多样，不但有五言四句，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体和杂言体，在艺术上有其独创性。它没有所谓的一唱三叹的袅袅余音和巧妙的双关语，与南朝乐府民歌形成鲜明的对照。

7. 散文、小说和文论

（1）南北朝的骈文和散文

南北朝时期，骈文受到帝王和贵族的重视，加上音韵学的发展和它在文学创作上的运用，形成了骈文畸形发展的局面。但在一部分历史、地理之类的学术性著作里，散文也还有一定的发展余地，如范晔的《后汉书》、酈道元的《水经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等都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骈文是古代的一种文体名称，它是与散文相对而言的。它的主要特点是讲究对仗和协调音律，多用典故，辞藻华美。散文写起来比较自由，而骈文有很大的束缚性，阅读起来比较麻烦。骈文脱胎于汉赋，形成于魏晋，到了南北朝，是它的全盛时期，隋唐以后便渐趋衰落。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骈文作

家和作品，有鲍照的《芜城赋》、庾信的《哀江南赋》等。

南北朝时期，骈文在文章领域内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文体形式，散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骈文影响，和魏晋以前的散文风格颇不相同。这时著名的散文多为史地学术著作。

范晔（公元397—445年），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人。南朝宋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历任新蔡太守、尚书吏部郎、宣城太守，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因参预谋反事泄被杀。他博涉经史，善为文章。任宣城太守时，删取众家后汉史书，博采众家之长，写成史学名著《后汉书》90卷。《后汉书》突破《史记》、《汉书》体制，独创了一些新的类传，如党锢、文苑、列女等，对后来史家有一定影响。

酈道元（公元？—527年），字善长，范阳涿鹿（今河北涿县）人。北魏著名地理学家、散文家。曾任尚书主客郎、河南尹、御史中尉等职。因为政严猛，为权豪忌恨，后被杀害。

从文学上来看，《水经注》在描写景物上，取得了值得珍视的成就，被视为游记文学的开端。其中《江水注》中“巫峡”一节，是古今传颂的名篇：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迭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泝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 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三峡是万里长江最为雄伟秀丽的风景区，也是祖国山川最有独特色彩的一处胜境。巫峡是长江三峡之一。作者开门见山，一气贯下，用生动的笔墨描写了巫峡两岸山势连绵高峻、水流一泻千里的雄姿风貌以及峡中四季景色气氛的变化，有声有色，余味不尽。它可与李白的《早发白帝城》诗媲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两者都创造了雄伟崇高、清新幽美的艺术境界，表达了对祖国秀美江山的热爱之情。

《水经注》以描写山川景色见长，对后世山水诗和山水游记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李白的《早发白帝城》以及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在写景手法上就曾受到《水经注》的很大启示。

杨衒之，北平（今河北完县）人。北魏著名散文家。魏末曾任抚军府司马、秘书监，北齐时曾任期城郡太守。北魏在京城洛阳兴建佛寺一千余所，极尽奢华，后经丧乱，寺院大多毁于兵火。他重过洛阳看到这种景象后，便写了《洛阳伽蓝记》一书。他在其书的序言中说：“至武帝五年（公元547年），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复，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农夫耕老，艺黍于双阙。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寥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

《洛阳伽蓝记》以记叙洛阳佛寺的兴废、佛教与当时封建政治生活的关系为主要内容，来揭露封建统治者佞佛祸国、侵渔百姓的罪行，表现了作者对国事的关切，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魏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其中记写贵族们的生活情态，淋漓尽致。如在《法云寺》中，记述了住在“王子坊”里的河间王元琛生活居处的豪侈精妙，元琛乃至要和晋代最豪侈的石崇比富：“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反映了元琛生活之奢侈无度，

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2）魏晋南北朝的小说

中国的小说源于古代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产生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中保存了许多神话传说。秦汉时期的《说苑》、《新序》、《吴越春秋》、《越绝书》等都记叙了人物的言行，载有生动的故事，是中国小说的雏形。《汉书·艺文志》曾录小说 15 家，1380 篇，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见于著录的小说作品，可惜只有极少的遗作保存下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开始繁荣发展，大致可分为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两类。《搜神记》是志怪小说的代表作品，《世说新语》是轶事小说的集大成之作。

干宝的《搜神记》。干宝，东晋史学家、文学家。字令升，新蔡（今河南新蔡）人。博学多才，元帝时召为著作郎，又出任山阴令、始安太守、司徒左长史、散骑常侍。著《晋纪》一书，《文选》存其《晋纪总论》。又收集神怪灵异故事撰成《搜神记》

《搜神记》是魏晋志怪小说的代表作，它虽然有迷信神异色彩，但保存了不少优美动人的古代神话和民间传说。其中最精采的部分是一些民间传说，它们的内容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曲折地反映了人民的反抗意识和对理想的追求。这些民间传说揭露了一些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抨击了封建统治者荒淫暴虐的罪行。如《东海孝妇》一篇，写一个名叫周青的孝妇，被人诬告谋杀婆母，昏官不问情由，毒刑逼供，她含冤服罪。临刑之日，碧血逆流，上染长幡，而后郡中枯旱，三年不雨。天地神灵都为孝妇的屈死而不平。这个故事流传很广，成为后来一些戏曲改编的素材，元代关汉卿的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就受其影响。又如《干将莫邪》、《韩凭夫妇》，揭露了统治阶级的凶残无耻，歌颂了人民的反抗精神。鲁迅《故事新编》中的《铸剑》即取材于《干将莫邪》。可见，《搜神记》对后世小说影响很大。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刘义庆（公元 403—444 年），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南朝宋著名文学家。武帝时袭封临川王，任侍中。文帝时，历任秘书监、尚书左仆射、中书令、荆州刺史等职，官终南兖州刺史、加开封仪同三司。他博采众说著成著名的笔记小说集《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记录了汉末至东晋的士族名流的遗闻轶事，艺术地再现了“魏晋风度”和“名士风流”。对名士的颓废放诞虽取欣赏态度，但也有助于后世了解士族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如《任诞篇》载刘伶纵酒放达，甚至脱衣裸形在室中，有人看见讥笑他，他却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宇为衣，诸君何为入我 中？”这类放荡的言行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一部分人对现实深感绝望的心理。

《世说新语》暴露了贵族穷奢极侈、残忍凶暴、贪婪吝啬的恶劣行为。如《汰侈篇》，记石崇与王恺斗富，竞相挥霍民脂民膏。《俭嗇篇》记司徒王戎“既富且贵”，“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钻核卖李，这是何等刻薄吝啬的人性啊！

《世说新语》还赞颂了志高行洁，或有所作为甚至能改过自新的人，如《方正篇》记述了周嵩与奸邪小人当面斗争的故事以及何充敢于揭露势大威重的王敦对其兄长的袒护，《自新篇》记周处勇于改过自新、杀虎击蛟为民除害的故事。

《世说新语》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它“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

简瑰丽”，语言精练含蓄，隽永传神，对后世笔记文学影响很大。后世的模仿作品很多，唐代有《续世说新语》，宋代有《唐语林》，清代有《今世说》等。书中的不少故事，如“曹植七步成诗”、“祢衡击鼓骂曹”、“温娇娶妇”等，成为后世戏曲、平话、演义小说的素材。书中的不少语言、事迹，如“新亭对泣”、“谢女咏雪”、“望梅止渴”、“一往情深”等，也成为后世诗文常用的典故或人们熟知的成语。

（3）南北朝的文学批评

南北朝时期，在曹丕、陆机文论的影响下，文学理论的探索和对作家作品的批评发展兴盛起来，出现了两部真正具有理论体系的文学批评专著——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

刘勰的《文心雕龙》。刘勰（公元466？—520年？），字彦和，祖籍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人，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南朝齐梁时杰出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他少年孤贫，笃志好学，依附当时著名和尚僧祐十余年，博通佛学经典。曾任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晚年出家为僧，法名慧地。他30多岁时撰成《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是一部著名的文学理论专著，全书共有50篇。自《原道》到《辨骚》5篇，为“文之枢纽”，阐明了作者对文学的基本看法，是总论部分；从《明诗》到《书记》20篇，对各种文体作了详细的论述，是文体论；从《神思》到《总术》19篇，讨论作品风格、语言等问题，是创作论；从《时序》到《程器》5篇，论述了文学史和文学批评问题，是批评论。最后1篇《序志》，说明作者的创作目的和全书的部署意图，是全书的总序。

《文心雕龙》对文学理论的贡献十分突出，它初步建立了文学历史发展的观念，把文学发展与政治变迁相联系，把文学的演变和继承相联系。它阐述了“文”与“质”的关系，即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主张为情造文，文质并重。他说：“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鞞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他认为内容与形式应是统一的。他反对片面追求形式的倾向，认为内容与形式两者之间内容是主要的。他反复强调风与骨、情与文二者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要求“风清骨峻”，情文并茂。

《文心雕龙》从创作的各个环节总结了创作经验，提出了艺术想象、艺术风格、风骨、情采、熔裁、夸饰等问题。他认为文章的风格是作者创作个性在作品中的具体体现，作者在才能、气质、学识、习染等方面的差别，决定了作品风格的差异。他把文章的风格概括为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8类。他主张文章要有风骨，他说：“是以怛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他要求以刚健的言辞表现鲜明的思想感情，使作品呈现出非凡的气势力度和风貌之美。

《文心雕龙》还提出了文学批评的方法和标准。他反对“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而应该“无私于轻重，不偏

于憎爱”。批评家应具有深广的学识修养，“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如何评价文学作品的高低，他提出了六观的方法：“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只有这样才能作出公允的批评。作者由于受儒家正统思想及当时的文学风尚和门阀观念的影响，在其著作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对文学史上那些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家、作品往往评价得不够正确。

《文心雕龙》继承和发展了先秦以来的文学理论成果，总结了先秦以来千余年间的文学面貌，在当时具有积极的批判意义，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

钟嵘的《诗品》。钟嵘（公元？—552年），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南朝齐梁时著名文学批评家。齐时官至司徒行参军。梁时先后任衡阳王及晋安王记室，故世称“钟记室”。著有《诗品》3卷，《梁书》本传称之为《诗评》，成书于天监十二年（公元513年）之后。

《诗品》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第一部诗歌评论专著，它是汉魏以来五言古诗的总结，共品评汉到齐梁的作家122人，按上中下三品以区别作家的高低，其中上品有11人，中品39人，下品72人。根据《诗品序》里的议论，作者也是有感于当时诗风不正，而批评又没有公认的标准，自己才著《诗品》的。

钟嵘反对形式主义诗歌，反对抽象说理的玄言诗，反对堆砌典故，反对四声八病之说。他认为“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是最好的诗歌，即诗歌创作应以深沉慷慨之情和沉郁悲壮之气为主导，以音韵、节律、词采等相润色。他论诗重视风骨、词采、诗味，如评曹植之作“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刘桢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班固诗“质木无文”。但他具体评论诗人时往往忽略思想内容，而更多的着眼于艺术技巧方面的某些特点。他说陶渊明的作品是“文体省净，殆无长语”，指出了陶诗语言干净、毫不累赘的长处。在评论诗人的艺术风格时，很注意探索它的源流。他说曹植的诗“其源于《国风》”，陶渊明“其源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这对后人研究诗流派的启承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钟嵘评论诗人着眼于艺术技巧多，注意思想内容少，因而在评论中严重存在着良莠不分、高下失序的现象。他把陆机、潘岳等人放在上品，而将陶渊明、鲍照置于中品，把曹操贬为下品，这都受到了后人的非议。他称道诗中佳句，摘句论诗，也开了后代摘句批评的不良风气。但《诗品》诗歌理论的完整性、深刻性，是前代所无与伦比的，对后来的诗歌创作的评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文心雕龙》和《诗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发展达到了高峰，对后世的文学批评影响深远。

萧统的《文选》。萧统（公元501—531年），即昭明太子，字德施，南兰陵（今江苏常州）人，梁武帝长子，未及即位，31岁病逝。南朝梁著名文学家。他爱好文学，博览群书，引纳文人学士，主持编选了《文选》，世称《昭明文选》。《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选集，全书共60卷，选入了从先秦至齐梁时期的诗文作品700多篇，分为37类。他将经书、子书、史书划在非文学的范畴，只选入运用典故、成语、文辞华美的作品。因此，这是一部能代表当时文学观点的选本。入选的作品多数是经过精细考虑的，能反映古代各种文体概貌，为后人研究文学史提供了便利。唐高宗时，李善

注释并讲授《文选》，叫做“文选学”。唐以后的文人往往把它当作学习文学的教科书。

六、古印度文学

1. 古印度文学的生长环境

印度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古代印度文学成就辉煌，灿烂夺目，是世界古代文学中最完整、丰富的文学之一，其发展一般分为吠陀时代、史诗时代和梵语古典文学时代。

印度梵语文学时期（公元1—12世纪），上承两大史诗和早期佛教文学。两大史诗使用的梵语是通俗梵语，含有较多的非规则语法现象。而这一时期的梵语文学作品，使用的是经过梵语语法家规范化的古典梵语。印度古代文学中的戏剧、抒情诗、叙事诗和小说等纯文学形式都产生于这一时期。

从公元1世纪起到公元3世纪，古印度的西北部被来自中亚的贵霜帝国所征服。贵霜帝国在中国古代的史籍中称为大月氏。大约在公元1世纪初，大月氏人建立贵霜帝国，这标志着统一的大月氏奴隶制国家的形成。贵霜帝国建立后，势力日强，进一步南侵印度，到公元1世纪末，发展到鼎盛时代，其领土扩展到北印度恒河流域中游，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帝国。贵霜帝国是与当时罗马帝国、安息帝国和中国的东汉帝国并驾齐驱的四大帝国之一，是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帝国内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很尖锐，政局并不稳定。从公元3世纪起，贵霜帝国逐渐衰落。印度著名的佛教诗人和戏剧家马鸣，就生活在一二世纪贵霜帝国时期，他的作品是现存最早的梵语古典文学作品。

贵霜帝国衰落后，北印度又重新分裂成许多小国。公元4世纪初。摩揭陀重新兴起，旃陀罗笈多一世建立起笈多王朝（约公元320年——公元5世纪中叶）。经过后继者三摩笈多和旃陀罗笈多二世的不断征伐，至5世纪初，笈多王朝统一整个北印度和中印度的一部分，成为孔雀王朝之后的又一个庞大帝国。笈多王朝属于印度古代历史上的盛世。笈多王朝全盛时，政治统一，经济繁荣，梵语文学和佛教艺术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梵语古典文学的黄金时代。笈多王朝帝王大力奖励文学和学术活动，三摩笈多本人就有“诗王”之称。最杰出的古典梵语诗人和戏剧家迦梨陀娑就是超日王（即旃陀罗笈多二世）的宫廷“九宝”之一。公元5世纪中叶，在外族入侵下，笈多王朝瓦解，印度又重新陷入小国纷争的局面。历史学家一般认为，印度从公元5世纪以后逐渐向封建社会过渡。

在梵语古典文学时期，佛教和婆罗门教出现了互相消长的形势。婆罗门教是在吠陀时期形成的脱离群众的上层宗教，因而在佛教兴起后，它立刻相形见绌。而在这一时期，婆罗门教为了争取群众，开始融合民间的宗教信仰，大约在4世纪演变成了新婆罗门教，即我们现在通称的印度教。印度教也是多神崇拜，但以梵天（创造之神）、湿婆（毁灭之神）和毗湿奴（保护之神，主要化身为罗摩、黑天）为三大主神。通过两大史诗以及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的各种往世书的宣传，围绕这三大主神的各种神话传说在印度民间十分普及。

印度教在发展中，逐渐形成毗湿奴教、湿婆教和舍格提教三大教派，遍布印度各地。佛教在这一时期由小乘衍变成大乘，公元3至6世纪是大乘佛教的鼎盛时期。在此期间，大乘佛教向印度国外广为流布，佛教逐渐成了世界宗教。但在印度国内，佛教从笈多王朝开始，逐渐走下坡路，到13世纪在

印度本土彻底消亡。

整个梵语古典文学时期，印度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力大大提高，商品交换有了进一步发展，城市兴起，宫廷生活奢华，这些都为梵语文学的全面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一时期的文学家多数出身婆罗门，因而在宗教思想和神话观念方面依然受到印度教的强烈影响。但除了一些往世书和其它一些颂神作品外，从总体上说，梵语古典文学已与宗教文献相分离，成为独立发展的意识形态形式。

梵语古典文学是印度古代文学中最成熟、最富有艺术性的文学。公元前产生的戏剧学专著《舞论》，是印度现存的第一部文艺理论著作。此后，印度文艺理论著作又不断问世，形成了世界上别树一帜的印度文艺理论体系。印度戏剧的创作十分繁荣，重要的梵语古典戏剧家有马鸣、跋娑、首陀罗迦、迦梨陀娑等。最杰出的戏剧家是迦梨陀娑，他的戏剧作品《沙恭达罗》，代表着梵语古典戏剧的最高成就。首陀罗迦的戏剧《小泥车》也很著名。《五卷书》是蜚声世界的印度梵文寓言故事集。现存最早的梵语叙事诗是马鸣的《佛所行赞》和《美难陀传》，抒情诗代表作是迦梨陀娑的《云使》。自迦梨陀娑后，梵语古典文学的各种体裁继续向前发展，但优秀的作品不多，形式主义已达到无法挽救的地步，其衰亡势在必然。

梵语古典文学在戏剧、诗歌、故事等文学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在古代文明世界中大放异彩。

2. 梵语古典文学

梵语古典文学继承吠陀、史诗、佛经文学和民间创作的传统，各种文学体裁和文体风格日益繁复多姿，在戏剧、诗歌和寓言故事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1）梵语古典戏剧

印度古代戏剧起源较早，公元前后已达到相当成熟的阶段，公元四五世纪步入高潮。它不仅是与古希腊戏剧对峙的高峰，而且在形式、风格、技巧等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古希腊戏剧。现存剧本最早的是一二世纪佛教诗人和戏剧家马鸣的3部戏剧残卷。重要的古典梵语戏剧家有跋娑、首陀罗迦、迦梨陀娑等。印度的戏剧理论比较丰富，在世界文学理论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最早的文学理论著作是《舞论》。

《舞论》。婆罗多的《舞论》有两种传本，南方传本分36章，北方传本分37章。一般认为，《舞论》的原始形式产生于公元前后不久，而现存形式大约定型于公元四五世纪。

《舞论》关于戏剧起源的说明是神话化的：大梵天应众天神要求，创造了第5吠陀——戏剧，并由婆罗多仙人付诸实践。第一部戏剧是在因陀罗的旗帜节上演的。于是，大梵天出面调停，讲述戏剧的性质和功能。他指出，戏剧不是表现天神或阿修罗的单方面情况，而是表现三界的全部情况。戏剧模仿世间生活，具有各种感情，包含各种情况。它在各种味、各种情和各种动作中产生有益的教训，将有助于道德、名誉和寿命，增长智慧，使得世间安宁。

《舞论》自觉地把戏剧作为一种综合艺术对待，以戏剧表演为中心，兼

论音乐和舞蹈等，对印度戏剧美学的基本范畴如“情”、“味”等的研究特别细腻深入。作者认为：“味产生于别情、随情和不定情的结合。”所谓“味”，指的是戏剧艺术的感情效应，也就是观众在观剧时体验到的审美快乐。婆罗多认为，味有艳情、滑稽、悲悯、暴戾、英勇、恐怖、厌恶和奇异 8 种。与这 8 种味相应，有欢、笑、悲、怒、勇、惧、厌和惊 8 种常情。“别情”是指感情产生的原因或缘由，如剧中的主人公和有关场景。“随情”是指剧中主人公感情的外在表现，如语言和形体。“不定情”是指随时变化的感情，用以辅助和强化基本感情（即常情）。这些别情、随情和不定情运用得当，就会达到和谐完美的结合，便能产生感染观众的味，而戏剧表演应该有助于味的产生。

《舞论》对戏剧艺术作了详尽的论述，是古代印度戏剧丰富的实践经验的总结。

跋娑。跋娑（约公元 3 世纪）的作品早已失传。1901 年印度学者在南印度某寺庙里发现了取材史诗和《故事海》的 13 部未署名的剧本，推论是出于跋娑之手。这一重大发现引起了东、西方学者的巨大关注，展开了长期的争论，迄今尚无定论。

跋娑的 13 部剧本，6 部取材于史诗《摩诃婆罗多》——《仲儿》、《五夜》、《黑天出使》、《使者瓶首》、《迦尔纳出任》和《断股》；两部取材于史诗《罗摩衍那》——《雕像》和《灌顶》；1 部取材黑天传说——《神童传》；两部取材于优填王传说——《负轭氏的誓言》和《惊梦记》；两部取材于其它传说——《善施》和《宰羊》。其中的《惊梦记》，不少学者考证是跋娑的作品。

《惊梦记》是 13 个剧本中最优秀的一部，被视为跋娑的代表作。全剧分 6 幕，描写犊子国遭到阿鲁尼王入侵，形势危急，必须与强大的邻国摩揭陀联姻结盟，才能保全国家。宰相负轭氏想让优填王和摩揭陀国莲花公主结婚。但优填王笃爱王后仙赐，不愿再娶，负轭氏只得施展计谋。他和大将卢蒙湿、王后仙赐出于爱国，趁优填王去国外求援时，合谋散布宰相与王后被火烧死的谣言，终于撮合了优填王与莲花公主的婚事，但优填王仍常常怀念仙赐。仙赐已被乔装成婆罗门苦行者的负轭氏带往摩揭陀国，负轭氏假称仙赐是自己的妹妹，委托莲花公主照看一段日子。仙赐为了协助负轭氏完成救国大计，默默地忍受着内心的痛苦。但她暗中察觉新婚的优填王依旧怀念着她，心中又感到莫大欣慰。某日，优填王探望有病的莲花公主，却未见公主在房内，便躺在床上睡着了。这时，公主的侍伴仙赐也来探病，以为床上睡着的是公主，坐在床边等候，突然听见优填王在梦中呼唤她的名字，她吃惊地走开，在她转身离开之际，优填王醒了。优填王只瞥见仙赐匆匆离开的身影，以致他以为这不是梦境，也是幻觉。后来，优填王在摩揭陀国的帮助下，由大将卢蒙湿率军击败了阿鲁尼王。负轭氏说明原委，仙赐恢复原妆，与优填王团聚。《惊梦记》是一出政治剧，表现的是爱国的主题。它把特定环境下爱情与政治的复杂关系刻画得精彩动人，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特别是对仙赐王后繁杂矛盾的心理刻画尤为突出。

跋娑的 13 部戏剧代表了梵语古典戏剧的早期成就，其艺术特点表现在 4 个方面：一是戏剧性强。作品虽取材于史诗和传说，但并不拘泥旧说，而是进行创造性的艺术加工，制造戏剧性场面，使之结构严谨，情节紧凑，富于戏剧冲突和动作，特别适宜舞台演出；二是人物性格鲜明。如智勇双全的忠

臣负轭氏，爱情专一的优填王，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仙赐王后等；三是场景描写生动，如《惊梦记》中描写飞翔在秋空的一行仙鹤：

上升，下降，成行，分散，
拐弯时，犹如星座七仙，
天空洁净似蛇肚蜕皮，
这行仙鹤似空中界线。

这里的自然景色描写十分出色。在梵语古典戏剧中，舞台场景主要靠剧中人物用言语描写，跋娑善于用自然景色衬托角色的心情，达到情景交融；四是语言朴素。戏剧中的散文对白比较简洁，注重感情色彩和戏剧效果。诗句朴实无华，常常饱含丰富的情感。

跋娑的 13 部戏剧以丰富多样的题材和简朴有力的表现手法，奠定了梵语古典戏剧的基础，给后世以很大影响。

首陀罗迦。首陀罗迦大约生活于二三世纪，是古代印度最著名的剧作家之一。他的代表作《小泥车》是驰名世界剧坛的一部经典之作。

《小泥车》是 10 幕剧，它是反映劳动人民与统治阶级的矛盾和起义斗争的现实主义作品。在序幕中，舞台监督开宗明义，向观众指出本剧是表现“正当的爱情，法律的腐败，恶人的本性和必然的结果”。它由两条平行而交错发展的线索推动情节的发展：一条是道德高尚的穷商人善施与名妓春军曲折的爱情；一条是牧人阿哩耶迦率众反抗八腊王暴政的起义活动。

《小泥车》前 5 幕主要是爱情故事。在暴君波罗迦王统治下的优禅尼城，有个妓女春军爱上了穷婆罗门商人善施。一天黄昏时分，国舅蹲蹲儿恃权仗势，在大街上强拦春军调戏。春军走投无路，躲进善施的家中，得与恋慕已久的善施会面，临别时她有意留下首饰盒请善施代管，作为下次会面的由头。侠义汉子夜游为赎出春军的女婢爱春为妻，偷走了春军寄存在善施家的首饰。夜游与爱春幽会，爱春认出首饰是主人春军之物，便让夜游假借善施之名送还春军。春军在暗中听到了这对情人的谈话，但她佯作不知，收下首饰，并让夜游带走爱春，成全了他们的婚事。这时，外面传来义军首领阿哩耶迦被八腊王抓住的消息，夜游赶紧放下婚事，回义军设法营救好友阿哩耶迦。恋爱故事在第 5 幕达到高潮：春军在风雨之夜到善施家，揭开首饰盒被盗之谜，并和善施共度良宵，结成姻缘。

6 至 9 幕，《小泥车》情节的明线与暗线互换位置，政治斗争成为剧本的主要内容。夜游等人救阿哩耶迦出狱，善施在旧花篮园子等候春军，却发现接春军的车子里藏着起义首领阿哩耶迦。善施慷慨赠车，助他出城脱了险。这时，春军寻找善施，却误上了国舅的车。国舅喜出望外，向春军大献殷勤。春军怒斥国舅，国舅恼羞成怒，掐死春军，并嫁祸于善施。善施辩白不清，被法官判处流放。可是八腊王忌恨善施这样的有德之士，下令改判斩刑。两条线索发展到第 10 幕合而为一：在困境中曾受过春军恩惠的按摩匠救活了春军，领着他在行刑之际赶到刑场，救下善施。这时，义军攻入京城，夜游杀死八腊王，民众拥戴阿哩耶迦为新王，善施与春军终结良缘。

《小泥车》剧名的由来，即春军在善施家过夜后，第二天见善施的儿子升军不要小泥车当玩具玩，一定要小金车。春军便把自己的首饰放在小泥车上，让升军去换小金车。后来蹲蹲儿掐死春军嫁祸善施时，小泥车上未换成金车的首饰竟成了蹲蹲儿诬陷善施谋财害命的物证。《小泥车》以道具为剧名，别出心裁，耐人寻味。

《小泥车》是印度古典戏剧中的写实主义珍品，它展示了印度古代社会中下层人民生活的生动画面。首陀罗迦站在被压迫人民的立场上，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暴虐无道以及法律的不公道，热烈颂扬了推翻暴君的人民革命，热情讴歌了春军与善施对美好，幸福的爱情生活的追求。它具有鲜明的善恶斗争的政治色彩，具有巨大的思想意义。它是现存唯一的以社会政治问题为题材、反映城市中贫民和贵族斗争取得胜利的作品，因此，它在印度古典文学中有特殊的地位。

《小泥车》的艺术成就是卓越的，它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剧中人物众多，主要角色是善施、春军和蹲蹲儿。

善施是位理想化了的人物。他是个婆罗门商人，乐善好施，家产因此散尽，落得一贫如洗，但他依然把名誉和情谊看得高于一切。他是善良的化身，慷慨仁慈，正直宽厚，性格豪爽大方。他同情革命，在关键时刻，冒险协助阿哩耶迦逃跑。他性格的核心是仁善，甚至对那个恶贯满盈的蹲蹲儿，他也宽恕了他。善施的形象客观上反映了印度古代社会下层民众善良的愿望和理想。

春军是古代印度下层勇敢追求自由幸福的女性典型。她是个妓女，却执着地追求美好的生活和理想的爱情。她仰慕善施的品德，对所爱的善施热情温馨，对所憎恶的蹲蹲儿宁死不从。她心地善良，慷慨救助走投无路的按摩匠，又无偿解除爱春的婢女身份。最后，她摆脱了妓女生涯，感到自己这才获得了生命。她的性格具有浓郁的现实味，不像善施那样理想化。她与善施的结合是现实与理想的统一。

蹲蹲儿是全剧塑造得最成功的角色，他愚蠢、无知、阴险毒辣。他是八腊王残暴淫逸统治的化身，是恶势力的代表。他既张牙舞爪又胆小如鼠，既贪婪又挥金如土，既好色又自作多情，既好卖弄口才又口齿不清，既易于冲动又工于心计。几乎所有令人憎恶、可笑的东西都集中到他身上，是个典型的恶棍形象。“蹲蹲儿式”或“国舅型”已成为印度日常生活中形容仗势欺人的恶棍的专用名词，可见这一艺术典型的魅力。

《小泥车》情节发展曲折复杂，又变化有致。剧中明暗两条线索的转换交织，导致了剧情发展上的跌宕多姿和场面的精采。剧中既充满着矛盾冲突和紧张气氛，又时时洋溢着幽默情趣和诗情画意。人物对话机智诙谐，戏剧动作风趣发噱。《小泥车》的语言质朴明快，自然流畅。它打破了印度古典戏剧对语言颇为讲究的传统惯例，让下层人物操梵文雅语，上层人物操梵文俗语，使用的俗语品种最多，剧中的各个角色在戏剧语言上都得到了出色的表现。

《小泥车》内容深刻，形象鲜明，技巧高超，在古代世界文学中独具一格。

（2）《五卷书》

印度的寓言故事极为丰富，寓意深刻，发人深省，很有启迪意义。德富的《伟大的故事》，是印度古代规模最大的故事总集，原作已失传，现存3种梵语诗体改写本，即觉主的《大故事诗摄》、安主的《大故事花簇》和月天的《故事海》。全书以优填王父子的故事为主干，插入许多中、小故事，题材较为广泛，不少故事歌颂了女性的聪明机智，谴责了上层社会贪婪好色，语言朴素生动，风格幽默诙谐。而寓言故事中的珍品，是印度梵文寓言故事

集《五卷书》。

《五卷书》是印度古代文学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寓言故事集，大约最初成书于公元1世纪，共包括80来个故事，分为5卷。故事中囊括了从奴隶社会末期到封建社会初期的生活内容。全书结构采用大故事套小故事、散文和格言诗相间的形式。其特点是动物形象占了一大半，人物形象只占一小部分。它主要反映的是城市平民的思想意识，其中不少故事闪烁着劳动人民的思想光辉。

《五卷书》开端的楔子部分，说明了该书编辑的目的。古代印度南方有位国王，他的3个儿子笨得要命，对经书毫无兴趣，国王为此十分苦恼。他和众大臣多方设法，也未能唤醒这三个蠢王子的智慧。后来，大臣推荐了一位婆罗门老师毗湿奴舍哩曼。这位婆罗门精通事理，享有盛名，他采用讲故事的方式，在6个月内把“修身处世的统治论”教会了这三个王子，王子变得聪明睿智，异于常人。“从此以后，这一部名叫《五卷书》的统治论就在地球上用来教育青年。”

《五卷书》故事的内容十分丰富。第1卷叫做《朋友的分裂》，引子讲某商人用牛车载珠宝到外地做生意，一条公牛陷入淤泥而受伤，商人弃之于森林王国。主干故事讲述这条公牛与百兽之王狮子结为亲密的朋友，狮子的两位贪婪、奸诈的豺狼大臣因而被疏远。豺狼出于忌恨，便施展离间术，唆使狮子杀死了公牛。其主旨是提醒和告诫君王如何处理好君臣关系，警惕奸佞之臣的挑唆。

第2卷叫做《朋友的获得》。引子叙述乌鸦看到一群鸽子被猎人网住，鸽王急中生智，让众鸽合力带网飞走，找到朋友老鼠，老鼠将网咬破，救出鸽子。乌鸦也跟老鼠交上朋友。主干故事讲述乌鸦、老鼠、乌龟和鹿结为朋友，同心协力，用智慧躲过猎人的捕杀。其主旨是弱者团结一致，用智谋战胜强者。弱者战胜强者也是《五卷书》所反复宣扬的中心思想。作者通过对这个故事的描写，总结出“朋友反正总是要结交”的教训，告诫人们要珍视友谊，用智慧战胜恶运，靠朋友度过难关。

第3卷叫做《乌鸦和猫头鹰从事于和平与战争等六种策略》。主干故事讲述百鸟选猫头鹰为王，却因乌鸦的反对而加冕未成，猫头鹰因此对乌鸦一族大肆杀戮。乌鸦族的一位老臣施展苦肉计，打入猫头鹰族巢穴，里应外合，全歼猫头鹰族。其主旨是要善识权谋机变，不要轻信原来是敌人的朋友。第4卷叫做《已经得到的东西的丧失》。主干故事讲述猴子与海怪结为朋友，海怪之妻贪婪残忍，纵恿海怪将猴子杀死，吞下其心，好成正果。猴子施计脱险，从此与海怪绝交。这一卷的主旨是变心之友不可再交。第5卷叫做《不思而行》。主干故事讲述理发师贪图钱财，谋害婆罗门，结果被处死。其主旨是遇事应多思、贪梦必遭灾祸。以上5个主干故事中，通过主人公之间的对话，插入各种故事，显得自然亲切，引人入胜。

《五卷书》中的故事主要出自人民之手，思想内容包括着许多进步的民主性成份。它通过对各类动物的描写，体现了弱小者、被欺压者只要团结协力、运用智慧就能战胜暴虐强敌的思想，颂扬了普通人的智慧和斗争精神，辛辣地抨击和讽刺了奸诈凶残的权势者和奸佞之徒，而且还宣扬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处世做人的道理。

《五卷书》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东方古代名著，形象地再现了古代印度民族卓越的艺术创造才能。它最突出的一个特色，是全书的框架结构，故事中套故事，将互不关联的松散故事群贯串在一起，纳入东方文学所常见的一个大框架之内，使之和谐统一；它的又一特色是其趣味盎然的寓言童话形式，这类形式源于民间，为百姓喜闻乐见。故事中的主要角色大多是“人化”了的动物，可视为人间的百面图。它的想象大胆瑰奇，色调明朗质朴、健康乐观，表达了不少睿智而生动的思想和哲理，给读者以隽永的艺术享受；它的第三个特色是诗歌与散文的糅合，在讲述每个故事前，一般都以“常言道”作套语，引用一首诗歌。这首诗歌也可以说是故事标题，往往既概括故事内容，又总结经验教训。其它夹杂在散文中叙述的诗歌，大多用在人物的对话中，借以表达政治、社会和人生哲理。其中有些是优秀的格言诗，这些格言诗与形象生动的故事内容珠联璧合，强化了《五卷书》的艺术魅力。

《五卷书》是古代印度人民群众生活和斗争经验的艺术结晶，是一部“征服了世界的寓言童话集”，在世界寓言故事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先传至波斯，又经波斯语译成阿拉伯语，后传入欧洲。它对后世尤其是欧洲文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我们从后世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意大利薄伽丘的《十日谈》、英国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国王度的《古镜记》和安徒生、格林兄弟的童话中，都可以看到《五卷书》故事的痕迹和影响。

3. 迦梨陀娑

（1）生平和创作

迦梨陀娑，一般认为他生活于印度笈多王朝旃陀罗笈多二世（公元 380—413 年在位）在位前后，是印度古代杰出的诗人和剧作家。

关于迦梨陀娑的生平事迹，无确切的资料。传说他出身于婆罗门之家，早年父母双亡，被一个牧人收留养大。他虽容貌出众而资质愚钝，一位公主倾倒于他的英俊外貌与他结婚。婚后，发现他愚昧无知，把他赶出家门。他到迦梨女神庙中，祈求迦梨女神赐给他聪明和才智。女神被他的虔诚所感动，满足了他的愿望，赐给了他大智大慧。他的名字即“迦梨女神的奴仆”之意，以表示不忘女神的恩典。他终于获得了才华而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和学者，妻子这才同他言归于好。依据种种传说，特别是依据作品的有关内容，可以大致推断他出生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印度邬阇衍那（优禅尼）城的一个较贫寒的家庭，由于某种原因具有了丰富的学识和较高的文化修养。他接近和同情下层人民的生活，后来成为有特殊成就的宫廷诗人，被誉为笈多王朝的“宫廷九宝”之一。

迦梨陀娑知识渊博，感情充沛，才华横溢。他的创作，一方面把印度梵语古典文学推向了高峰，另一方面又使上古世界文学放射出最后的夺目的光彩。他一生写过很多作品，经专家学者考证，流传至今的有两部叙事诗——《罗怙世系》和《鸠摩罗出世》；一部抒情长诗——《云使》；一部抒情诗集——《时令之环》；三个剧本——《摩罗维迦和火友王》、《优哩婆湿》和《沙恭达罗》等七部作品。

《罗怙世系》共 19 章，取材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长诗叙述了罗怙王族 21 个帝王的故事。1—9 章，描述罗摩的高祖父迪利波王、曾祖父罗怙王、祖父阿迦王、父亲十车王的故事；10—15 章，讲述罗摩的生平事迹，主

要内容与史诗《罗摩衍那》基本相同；16—19章，叙述了罗摩的后裔俱舍王、阿底提王等人的故事。

《罗怙世系》采用帝王谱系的形式，不存在贯穿全诗的统一情节。但迦梨陀婆凭借他的卓越诗才，弥补了这一天然缺陷。他以诗人的眼光提炼和剪裁历史传说，着重描写了罗怙世系中每个帝王最典型的事迹，艺术而创新地写出了帝王作为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之中的思想感情。如阿迦王哭妻，是梵语诗歌中最动人的名篇之一。阿迦和英杜摩蒂是一对恩爱夫妻。一天，他们在花园游乐，那罗陀大仙途经花园上空，不料一阵狂风吹落大仙琵琶上的花环，恰好击中英杜摩蒂的胸口，英杜摩蒂倒地身亡。阿迦从昏厥中苏醒过来后，哀叹自己的不幸命运：

如果这花环能毁人性命，
放在我胸口，为何我不死？
一切按照自在天的意愿，
毒药变甘露，甘露变毒药。

或许由于我时运倒转，
创造主创造出这种雷电，
它没有击毁大树本身，
却击毁依附大树的藤蔓。

阿迦的哭诉“甚至连树木也挥泪如雨，沿着树枝流淌”。

《罗怙世系》语言优美和谐，富有音乐性，技巧成熟，是印度文学中的名篇，完全达到了印度古代诗学的一切标准，被誉为印度大诗（叙事诗）的典范，是学习梵语的基础读本。

《鸠摩罗出世》（鸠摩罗，意为童子），共17章。一般认为前8章是迦梨陀婆的原作，后9章是他人续作。它取材于印度古代的传说，叙述大神湿婆超凡脱俗，不为尘世间声色犬马引诱而动心，一心致力于苦心修炼。当美丽绝伦的喜马拉雅山女儿乌玛出现时，他目不斜视。他的诚心感动了乌玛，使她动情。她发现凭自己的美貌不能获得爱情，便决心用苦行来获取。她穿上树皮衣服跟着湿婆苦行。夏季，她坐在四个火堆中间，目不转睛地凝视太阳；冬季，她站在水中，任凭风吹雪扑。这一真诚举动终于感动了湿婆，两人终于结为夫妻。

《鸠摩罗出世》表现了爱情战胜苦行、入世战胜弃世的主题。题材来自神仙世界，实际上却表达了人间的苦乐，艺术上有不少成功之处。

《云使》是迦梨陀婆的一部抒情长诗，情节简单而离奇，写的是财神的奴仆药叉思念妻子的故事，是世界古典诗歌中脍炙人口的名篇，早在七八百年前我国就有藏文译本流传。

《时令之环》共收短诗144首。诗篇通过对印度6个时令（夏季、雨季、秋季、冬季、春季）自然景色的吟咏，抒发了诗人因景色变迁而引起的不同感情，热烈地赞美青年男女的爱情享受，表现了离人思妇的欢乐和忧郁的感情。诗中独特的东方风味，沁人心脾，给人以美好的艺术享受。但与迦梨陀婆的其它作品相比，在艺术上还有稚拙之处，一般认为是迦梨陀婆的早期作品。

迦梨陀娑有“印度的莎士比亚”的美称。五幕剧《摩罗维迦和火友王》，一般认为是迦梨陀娑的早期习作，取材于宫廷历史中的恋爱故事，剧情曲折多变，引人入胜，但缺乏对人物内心的深入刻画，显得有些粗糙。

《优哩婆湿》取材于印度一个古老的传说，在《梨俱吠陀》、《摩诃婆罗多》和许多“往世书”里都有这个故事，但情节和人物都有变化，直到创作此剧后才最后定型。

《优哩婆湿》是5幕剧，描写天国歌伎优哩婆湿和人间国王补卢罗婆娑相爱的故事。国王补卢罗婆娑礼拜太阳归来，途中遇见一个恶魔劫走天国歌伎优哩婆湿。他当即驱马追赶恶魔，救出优哩婆湿，两人一见倾心，互相爱慕。国王回宫后，感觉到自己的心象是莲梗中的纤维被天鹅啄到天上去一样，情思绵绵不断，得了相思病。优哩婆湿同样对补卢罗婆娑思念不已，她使用隐身术来到国王的后宫花园，偷听国王与弄臣的谈话，探明了国王热恋自己的心迹，便在贝叶上写了一首情诗赠送给国王。正当她显身与国王见面时，远处传来天使的话音，催促她回宫演戏，她只好与国王告别。她在天宫演戏时，由于心荡神迷，竟把剧中人物的名字补卢输陀摩错念成补卢罗婆娑。戏班师傅一怒之下，将她逐出天庭。天神因陀罗同情优哩婆湿，允许她下凡去和补卢罗婆娑结成良缘，一旦国王见到亲生儿子就返回天国。优哩婆湿终于和国王生活在一起，王后迫于无奈只好忍气吞声。一天，国王和优哩婆湿出外游玩，优哩婆湿发现国王老看一位仙女，心生妒忌，忘记了戒规，走进了不准妇女入内的鸠摩罗林。结果，脚刚迈入，她就变成了一株蔓藤。国王在树林里到处寻找优哩婆湿，失魂落魄，向森林里所有的植物、动物等一一倾诉自己心中的忧伤，打听优哩婆湿的下落。后来，国王拾到一位女神的红宝石，这块宝石具有魔力，它能使分离者相聚。国王觉得一株蔓藤很像优哩婆湿的身影，便走上前去搂抱。他手中的那块宝石一碰到蔓藤，优哩婆湿立即恢复了原形，两人重新团圆。后来，一个女苦行者给王宫送来一个男孩，告诉国王这是优哩婆湿托她抚养的孩子。这个男孩射杀了那只叼走团圆宝石的兀鹰，违反了净修林的戒规。原来，这个男孩是优哩婆湿所生，托她抚养，现因为犯戒，只好送还优哩婆湿。补卢罗婆娑终于见到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优哩婆湿又喜又悲，喜的是终于与亲生儿子会面，悲的是自己马上就要返回天国。她向国王吐露了真情：她是因为害怕与国王分离，才把儿子偷偷交给女苦行者抚养的，国王听后悲痛难忍。正当两人依依惜别时，天神因陀罗派人来传达命令：神魔之间要大战一场，要求补卢罗婆娑协助天兵征伐恶魔，恩准优哩婆湿留在人间与国王白头偕老。

戏剧中的优哩婆湿是一个聪慧多情的女性形象，作为一个天宫舞伎，她大胆追求爱情，表现了作者对世间爱情生活的歌颂。在迦梨陀娑的时代，妇女社会地位低下，优哩婆湿虽然是天女，但命运掌握在天帝手中。她敢于冲破天罗地网追求世俗幸福，表现出叛逆精神。剧作者把国王描绘成一个容易亲近的多情天子，从而表达作者的爱情观。

《优哩婆湿》的思想内涵是谴责奴隶式的爱情，歌颂自由恋爱，赞美了勇敢追求自由幸福的大胆行为。全剧富于浪漫色彩，情节曲折，结构紧凑，文字朴素生动、优美，诗情洋溢。其中以第四幕最为著名，在这一幕中，补卢罗婆娑向自然界各种动物、植物和无生物探问优哩婆湿的下落，并伴以幕后的唱诗，将补卢罗婆娑失魂落魄的情形表现得淋漓尽致，动人心弦，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剧作想像力丰富而奇妙，艺术风格爽健明朗，抒情趣味

浓郁，表现了迦梨陀娑娴熟的艺术技巧。

七幕诗剧《沙恭达罗》，是迦梨陀娑最成功的作品，也是诗人获得世界声誉的力作，是印度古典戏剧的典范。

在迦梨陀娑丰富的作品中，《云使》和《沙恭达罗》被认为是最优秀的代表作。

（2）《云使》

《云使》是迦梨陀娑的著名长篇抒情诗，金克木的译本共 115 节，每节两联，每联两行，分为“前云”和“后云”两部分。诗作用第一人称的写作手法，描写小神仙药叉被贬远离家乡，托雨云为使者，去给妻子传递他无恙的消息和对妻子的眷恋之情。

“前云”主要表现药叉被贬谪的缘由以及远离爱妻的痛苦，恳求雨云为他送信，并为云使指点行程路线。

小神仙药叉是财宝之神俱毗罗的侍从，因“怠忽职守”被主人贬谪到远离家乡的罗摩山居住一年。在这期间，药叉十分想念妻子：

这位多情人在山中住了几个月，
离别了娇妻，退落了臂上的金钏；
七月初他看到一片云飘上峰顶，
像一头巨象俯身用牙戏触土山。

在这令人生情爱的雨云的面前，
他忍住眼泪，勉强站立，意动神驰；
看到云时连幸福的人也会感情激动，
更何况恋缱绻而遭远别的多情种子？

雨季将临，他为了维护爱人的生命，
便想到托云带去自己的平安消息；
他满心欢喜，献上野茉莉的鲜花为礼，
向云说一些甜蜜言语，表示欢迎之意。

药叉动情地恳请雨云为使给他妻子送信，并细致地描述了从罗摩山到其妻留居地阿罗迦去的路程：

云啊！你是焦灼者的救星，请为我带信，
带给我那由俱毗罗发怒而分离的爱人；
请到药叉主人所住的阿罗迦地方去，

那儿郊园中湿婆以头上的新月照耀宫城。从罗摩山往北，“前面蚊蛭峰头出现了一道彩虹”，“不懂挤眉弄眼而眼光充满爱意的农妇凝神望你，因为庄稼要靠你收成”。再经玛罗高原、芒果山、毗地沙城、优禅尼城，然后又到了尼文底耶河、信度河等等许多地方：

过河后，美丽的云啊！信度河缺水瘦成发辫，
岸上树木枯叶飘零衬托出她苍白的形影；
她那为相思所苦恼的情形指示了你的幸运，

《云使》每节 68 音，以两个 34 音构成一联，其中 17 音相当于现在诗的一行。

《云使》引文均为金克木译《印度古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唯有你能够设法使她由消瘦转为丰盈。诗人对每一处的秀丽景色和旖旎风光都作了富于感情的生动描绘，有些简直成了药叉朝思暮想的爱妻的化身。最后，便到了阿罗迦城：

逍遥自在的云啊！当你看到阿罗迦城
在山上如倚爱人怀中，有恒河如绸衣滑下，
你不会不认识她：她在你到时以高缕承雨，
像美女头上承着密结珠络的乌云辮发。

“前云”部分设想新奇，笔调华丽生动。作者赋予雨云以人的品格，将它视为挚友，向它详细地描绘了由印度中南部向北至喜马拉雅山一带雄伟秀丽的山河和富庶繁华的城市，对它的旅途劳顿表示无限关心，寓情于景，情文并茂，表现了药叉对妻子的眷恋、怀念之情。

“后云”主要写了药叉的故乡阿罗迦城及其妻子的住地，想象雨云会见自己妻子传达信息的情景。诗人先写阿罗迦城的富丽尊荣：

你有闪电，有虹彩，有殷殷隆隆的可爱低音，
那儿的宫殿有美女，有画图，有伴音乐的鼓声，
它上触云霄，珠宝铺地；你地位崇高，内含净水，
凭这种种特色阿罗迦城足可与你抗衡。

后写小庭院以及他爱妻的容貌：

在那儿，俱毗罗仙宫的北面就是我家，
像虹彩一般美丽的大门远远就可认出；
近旁有我妻种的看作养子的小小曼陀罗树，
树上有累累下垂伸手可得的鲜花簇簇。

……

那儿有一位多娇，正青春年少，皓齿尖尖，
唇似熟频婆，腰肢窈窕，眼如惊鹿，脐窝深陷，
因乳重而微微前俯，以臂丰而行路姗姗，
大概是神明创造女人时将她首先挑选。

咏物思人，情真意切。他想象爱妻满怀离愁的种种情状：

她因忧思而消瘦，侧身躺在独宿的床上，
像东方天际只剩下一弯的纤纤月亮；
和我在一起寻欢取乐时良宵如一瞬，
在热泪中度过的孤眠之夜却分外悠长。

他托雨云向他爱妻倾诉他的炽热相思，娓娓动人，如泣如诉：

长寿的云啊！因我的恳求也为了造福自己，
请告诉她：“你的伴侣在罗摩山依然康健；
他问你安好；女郎啊！他不能和你在一起。”
这便是易遭不幸的人首先要说的语言。

“他为厄运阻隔在远方，怀着心心相印的愿望，
他只有凭清癯消瘦，凄怆悲痛，频频叹息，
热泪纵横和焦灼不安，来配你的瘦弱可怜，
凄凉伤感，长吁短叹，珠泪盈腮和满怀焦急。”

药叉请雨云安慰他爱妻，说他的谪期将满，不久便可团圆。最后，他盼望云使早日带回妻子平安的音讯以宽解他的思念，并祝愿云：

你应我的不情之请，肯对我施此恩惠，

不论是出于友情还是对我独居感到怜悯；
云啊！雨季为你增加光彩，此后请任意遨游，
但愿你一刹那也不和你的闪电夫人离分。

在《云使》里，迦梨陀娑用朴素无华但却美丽淳厚的诗句，饱和着温柔的感情，描绘出印度大自然的千姿万态以及与妻子的互相思念和深厚的爱情，颂扬了忠贞不渝的爱情，表现了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批评态度，寄托了人民的理想和愿望。这是人类所能创造的美好的情歌的一部分，具有永不衰竭的艺术魅力。

（3）《沙恭达罗》

《沙恭达罗》是迦梨陀娑最杰出的作品，代表梵语古典戏剧的最高成就。它共分7幕，基本题材取自《摩诃婆罗多》和《莲花往世书》，基本情节是净修女沙恭达罗和国王豆扇陀之间的爱情纠葛构成的。

第1至3幕，是戏剧情节发展的第一阶段，写国王豆扇陀与沙恭达罗邂逅相遇，彼此钟情，自由结合。国王豆扇陀和随从到郊外狩猎，追赶着一只鹿，正要弯弓搭箭，却被净修林的两个苦行者阻止。国王立即放下弓箭，苦行者赞美国王道：“真不愧是补卢的后裔，真不愧是国王中的明灯。”豆扇陀应邀访问净修林。他走进净修林中，发现净修林大师干婆的义女沙恭达罗正在浇水。她虽然身穿树皮衣裳，可仍然显得美丽异常。豆扇陀一见倾心，不禁赞美“这女子真正是秀色天成”。“下唇像蓓蕾一样鲜艳，两臂像嫩枝一般柔软，迷人的青春洋溢在四肢上，像花朵一般”。沙恭达罗正值怀春妙龄，也对豆扇陀一见钟情。当两个女友向国王告别时，她不愿就此离去，假装嫩拘草刺伤了脚，树枝子挂住了树皮衣服，回眸给豆扇陀一个多情的秋波。国王更加恋恋不舍，叹口气说：“沙恭达罗的秋波这一转，我简直无意再回城去。我下令让我的随从们在离开净修林不远的地方驻扎下。我简直忘不了沙恭达罗。我的身体走了，我那颗不安的心却跑回来。正如逆风竖起来的旗竿上的丝旗在风中摇摆。”国王把他对沙恭达罗的爱告诉了一个随从，随从却说：“啊，正如一个厌恶了枣子的人想得到罗望子一般，万岁爷享受过了后宫的美女，现在又来打她的主意。”

豆扇陀陷入情网，为了追求沙恭达罗，他违抗母命，不肯回宫。他在净修林驻扎下来，并借口保护净修林不受罗刹扰乱。沙恭达罗从看到国王起就精神恍惚，郁郁寡欢，最后终于向女友吐露真情，并咏诗表白心中的激情：“你的心我猜不透，但是狠心的人呀！日里夜里爱情在剧烈地燃烧着我的四肢，我心里只有你。”一直躲在树后的豆扇陀听到后喜不自禁，也向沙恭达罗倾诉了自己的相思之苦：“爱情只使你发热，细腰的美人呀！但却在不停地燃烧着我，白日使夜莲凋萎，但更厉害的却是使月亮的光彩褪落。”沙恭达罗的两个女友愿意成全这件好事，但要求国王不要最终抛弃沙恭达罗。豆扇陀发誓说：“尽管我后宫佳丽甚多，我家里只有两宝可守，一个是四周环海的大地，一个是你们的朋友。”听到国王作了保证，女友放心地离开了。豆扇陀拼命追求沙恭达罗，沙恭达罗想离开国王，又舍不得走开。最后，他们终于用干闥婆（自由恋爱）的方式结为眷属。

在前3幕中，诗人以净修林清幽和谐、超凡脱俗的自然美，来烘托男女

主角的爱情美，喜剧气氛浓郁。第3幕的结婚场面，构成了剧情的第一次转折。

第4至6幕是戏剧情节发展的第二阶段。第4幕表现的是沙恭达罗离开净修林赴京寻找豆扇陀。婚后不久，豆扇陀启程回京城。临别时，他把一只刻有自己名字的戒指作为信物交给沙恭达罗，说不日将迎她回宫。国王走后，沙恭达罗终日相思绵绵。一天，她心不在焉，怠慢了一位脾气暴躁的大仙人达罗婆娑。大仙人便诅咒她说：“你心里只有你那个人，别的什么都不想念，我这样一个有道的高人来到，你竟然看不见。你那个人决不会再想起你来，即使有人提醒他，正如一个喝醉了的人想不起自己作过的诺言。”沙恭达罗的女友跪求仙人发点慈心，饶恕沙恭达罗的失敬，大仙终于发了点慈悲，减轻了对她的诅咒：“我的话既然说出去，就不能不算数。但是只要她的情人看到他给她的作为纪念的饰品，我对她的诅咒就会失掉力量。”这时，干婆巡礼圣地回来，他祝贺沙恭达罗已同国王结婚，并派徒弟陪送已经怀孕在身的沙恭达罗赴京投奔国王。临别时，女友告诉沙恭达罗说：“假如那位国王迟迟疑疑一时想不起你来的话，那么你就将镌着他自己名字的戒指拿给他看。”沙恭达罗依依不舍地与家人亲友、净修林的花草树木及弱小生灵告别。这一幕充满哀婉动人的离情别意，一向被认为是《沙恭达罗》中最美的一幕。正如印度流行的谚语所说：《沙恭达罗》的第4幕在全剧里好得出奇。

古代印度人真的相信是有诅咒的。这里，大仙人的诅咒象征着当时社会保守势力对自由爱情的阻挠，构成了戏剧的基本冲突。剧中沙恭达罗女友的疑虑，预示着沙恭达罗将面临被拒认的波折。

第5至6幕写沙恭达罗寻夫被拒绝和遗弃。沙恭达罗来到京城，见到了国王豆扇陀。但是，由于仙人诅咒的作用，沙恭达罗在途中失落了豆扇陀给她作为信物的戒指。这样，豆扇陀完全忘却了沙恭达罗，不肯相认。沙恭达罗悲痛欲绝，不禁发怒道：“补卢的子孙呀，以前在净修林里，你引诱我这个天真无邪的人，一切都讲好了，现在却用这些话来拒绝，这难道合理吗？”豆扇陀怀疑沙恭达罗是在瞎编，沙恭达罗指斥道：“卑鄙无耻的人！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谁还能像你这样披上一件道德的外衣实在是一口盖着草的井？”沙恭达罗向天求告，空中闪起一道金光，她的生母——天女弥诺迦将她高高举起，接回了天国。一位渔夫从鱼腹中发现了豆扇陀送给沙恭达罗的那枚戒指。巡检和看守从渔夫那里发现了国王的戒指，以为是渔夫偷来的，便把渔夫抓起来。豆扇陀看到订情信物后，恢复了记忆，悔恨不止，说道：“那一只戒指带回了我的记忆，我竟毫无理由把最亲爱的人儿遗弃。我现在真后悔不迭，我痛苦流涕，虽然现在春光明媚的好天气。”国王不仅痛悔自己的薄情，而且想到膝下无子，遗弃了怀孕的沙恭达罗也就遗弃了自己的儿子，不禁陷入昏迷状态。正在这时，天帝因陀罗的御者摩多梨带来了天帝的命令，派国王前去消灭天神的敌人，国王立即登上神车出发。

第5幕形成了剧情的第二次突变性的转折，是全剧的高潮。沙恭达罗面对豆扇陀的忘情进行了大胆的抗争。第6幕国王去天国为戏剧的团圆结局埋下了伏笔。这两幕笼罩着悲剧气氛。

第7幕是戏剧情节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写豆扇陀与沙恭达罗及其儿子团聚。国王遵照因陀罗的命令战胜了天神的敌人后，途经天帝父母居住的仙境，便下车礼拜。在神仙的净修林里，他看到一个长有王者之相的小男孩，得知是沙恭达罗的儿子，惊喜万分。恰好此时沙恭达罗来了，豆扇陀上前相认，

请求沙恭达罗的原谅。沙恭达罗认识到“我的丈夫不是有意遗弃我。他没有真忘记我”。于是，夫妻团圆，国王带上沙恭达罗和他们的儿子返回都城。在这最后一幕中，男女主角终于获得美满幸福团圆的喜剧结局，戏剧冲突最终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沙恭达罗》成功地塑造了沙恭达罗和豆扇陀的形象。沙恭达罗天生丽质，纯净无华。她穿着用树皮做的衣裳，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可谓秀色天成。她身上不仅洋溢着迷人的青春，还有一颗善良美好的心灵。单纯、质朴是她最鲜明的性格特征。她在净修林中，对义父母尊敬，与两个女友感情深厚。她热爱大自然，对山水草木鸟兽都充满情意。她感情丰富，在爱情上单纯、热烈、忠贞。她未经世事，当爱情来到她身边时，她敢于冲破净修林的清规禁律，把全部爱情献给豆扇陀，勇敢地追求自己所向往的幸福。她温柔和顺，但也不乏刚强。当她来到宫廷遭到拒绝和遗弃时，她对豆扇陀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谴责，却又不失矜持和庄重。最后，她凭着坚贞执着的爱情，终于和豆扇陀破镜重圆。沙恭达罗是古代印度理想妇女的典型。

豆扇陀的形象比较复杂，具有明显的两重性。一方面，他是一个理想的国王，古代的英雄和“情种”。他体恤民情，“关心臣民像关心自己的儿女一样”。他英勇骁战。他始终对沙恭达罗一往情深。他的爱情是忠贞不渝、可以信赖的。特别是当他恢复记忆后的追悔，表达了对沙恭达罗深沉、真挚的感情。另一方面，他是现实生活中的国王，作者又对他有所揭露。他追求沙恭达罗，意识中不无玩弄和占有的成分。但这种揭露是较含蓄、温和的，而对他的赞颂和理想化则是主要的。

《沙恭达罗》通过沙恭达罗和豆扇陀的悲欢离合，多侧面地描绘了从城市到乡村、由净修林到宫廷的广阔的艺术画面，歌颂了沙恭达罗和豆扇陀追求爱情幸福，也间接地反映了当时上层统治者遗弃民女的罪恶，揭示了当时妇女的悲苦命运，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沙恭达罗》在印度梵语文学史上达到了最高、最完美的境界。它是一曲清新的爱情恋歌，自始至终带有浓郁的抒情性，而且情景交融，充满诗情画意。它情节结构复杂曲折，戏剧矛盾奇突多变，但它那深厚的人情味，又显得自然和谐。它对人物的心理刻画细致入微，如第4幕通过沙恭达罗的言行表现了她依依不舍地离开净修林时的复杂微妙的心态。它将自然景物人格化，使之富有人的品性。如当御车惊起的一只大象闯进法林造成混乱，使得如胶似漆的沙恭达罗与豆扇陀不得不分手时，沙恭达罗仿佛感到“嫩拘舍草刺伤了我的脚。拘卢婆迦树的枝子挂住了我的树皮衣服”，就好像是在挽留她自己那依依不舍的脚步。尤其是第4幕沙恭达罗告别净修林时，弥漫在净修林里的离别情绪显得非常浓郁。小鹿把嘴里吃着的草也吐了出来，用嘴牵住她的衣襟，很不忍心与她别离。蔓藤落下了褪色的叶子，人与树林的别离竟是那样的伤感动人。它语言技巧高超，充满了诗意，生动优美，淳朴典雅，又饱含哲理。人物语言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感情色彩，具有很强烈艺术感染力。

《沙恭达罗》不仅在世界上已经有几十种译本，并且被广泛地搬上了舞台，在世界上有着很大的影响。鲁迅先生称之为“绝唱”，评价很高。赫德、歌德、席勒等更是予以极高的赞美。《沙恭达罗》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千古名剧之一。

